

15 277

# 北京大学学报

## 人文科学

1

1958

# 目 录

- 关于尚鉞同志为“明清社会經濟形态的研究”一書  
所写的序言.....刘大年 (1)
- 略論欧洲資產階級文学里的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 .....馮 至 (15)
- 基督教与西方文化  
——一种重新估价的尝试.....朱光潛 (27)
- 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在西方邏輯發展历史中的  
作用.....何兆清 (41)
- “孙子”十三篇校箋举要 .....楊炳安 (55)
- 关于阿Q性格 .....蔡 健 (73)
- 試論当前我国經濟發展中的矛盾与發展工業和發展  
农業同时并举的指导方針 .....牟甲寅 (87)

## 学 术 消 息

- 中央文字改革委员会常委章懋同志来校作“关于文字改革的問題”的报告...和 年 (14)
- 何其芳同志批駁右派分子在党领导文艺問題方面的謬論.....經 之 (26)
- 世界近代現代史教研室一年来的科学活动.....  
世界近代現代史  
教 研 室 通 訊 (72)
- 記兩次法律工作者的国际會議.....陈守一 (109)
- 新聞学專業開設“文学艺术講座”.....張步洲 (110)

# 关于尙钺同志为“明清社会經濟形态的研究”一書所写的序言

——北京大学“历史問題講座”第七講——

刘大年

上海人民出版社去年三月間出版的“明清社会經濟形态的研究”一書上有尙钺同志写的一篇“序言”。作者在“序言”中認為有关中国封建社会的長期性、十九世紀中叶中国仍是小农業与家庭手工業相結合的社会經濟結構和鴉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历史的起点等，这些在学术界已成定論了的想法，是不正确的，明白否定了这些看法。这是历史研究中一个值得注意的問題。因为它直接涉及馬克思主义关于中国历史的若干基本問題的論断、涉及中国革命斗争的一些重要問題。我觉得有必要提出来加以討論，以求得認識的一致。

中国历史有許多特点。这些特点經過科学的观点考察、研究以后，表現得極为显著。

無数的文物和史籍証明，中国历史上有很長的封建社会时期。至少自秦汉至十九世紀中期的社会生产中，人們对于生产資料的佔有关系，主要是地主佔有土地，剝削压迫农民。社会生活中最根本的矛盾是农民和地主在土地所有权上的矛盾。十九世紀外国資本主义侵入后，旧的社会經濟發生了重大变化，但是地主佔有土地和集中土地的情况并没有改变。近年来全国土地改革运动的材料足以充分証明这一点。据 1952 年的資料，約有三万万本来無地和少地的农民，經過土地改革，分得了約七万万亩土地，获得經濟利益的农民約佔农業人口的百分之六十到七十。長期以来，詩人所描写的社会生产中的“男耕女織”，即小农業和家庭手工業相結合的社会經濟結構，一直是中国封建經濟的突出特点。1840 年中英鴉片战争以后，中国开始由一个古代的独立的封建社会，逐步地改变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所謂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基本內容，是外国資本主义在中国社会生活中，从經濟基础到上層建筑，各方面佔有控制地位。虽然外国資本主义是一种外部力量，但是它侵入中国內部以后成了阻碍中国社会發展的一种最惡毒的势力。这种势力只是在鴉片战争以后才形成的。鴉片战争以前，中国和西方資本主义国家有通商交往，也有过早期的冲突，但是那时外国决沒有在中国建立起这种半殖民地的控制。鴉片战争固然不像一把快刀，將中国历史这束乱麻一刀斬为兩断，但是也决不能抹煞这以前和以后的根本区别。这就是我們把鴉片战争看做中国近代历史起点的根本原因。我們通常所說的中国近代史，也就是指的从鴉片战争开始的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制度的历史。

自馬克思本人起，包括毛澤东同志在內的經典作家們根据上述事实，对中国历史作了許多重要的、科学的論断。在这些論断中有：（一）封建制度在中国历史上經歷的时间很長，在封建制度下社会發展很迟緩，甚至呈現某种停滯的状态。馬克思在“貿易还是鴉片”、“中国事件”等專門論述中国問題的文章中，指出中国社会不管时事如何变迁，却仍停滯不前；在“資本論”中叙述“分工与手工制造業”时，也表示出同样的意思。毛澤东同志在“中国革

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論”等著作中，更一再說到中国封建制度延續的时间很長，陷在發展滯緩的状态中。(二)小农業和家庭手工業結合的自然經濟是中国封建社会經濟結構的特点，直到鴉片战争以后的一个时期里，这种社会經濟結構仍在發生某些作用。1858年、1859年馬克思写的“貿易与条約”、“对华貿易”等專論中，指出“当前”的中国社会經濟結構是小农業与家庭手工業相結合。1858年馬克思“給恩格斯的信”和“資本論”上“关于商人資本的史的考察”中有同样的叙述。1892年恩格斯“給达尼爱松的信”，1894年給“佐尔的信”也都連續講到中国小农經濟的这个特点。毛澤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指出：中国封建时代的自然經濟，是农民不但生产自己需要的农产品，而且也生产自己需要的大部分手工業品。(三)1840年中英鴉片战争是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制度的起点。馬克思几次講到太平天国革命时，都認為它是鴉片战争的产物，在“中国事件”中着重指出，对于这个国家，“鴉片不曾發生催眠的作用，而倒發生了惊醒的作用，这是很矛盾的”。全部毛澤东同志的著作，凡是論及中国近代历史的地方，有的是直接指出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制度是从鴉片战争开始的，有的則是以此为背景来叙述事件的發展。这些馬克思主义的著名观点，差不多为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人所熟知。

当然，馬克思主义的經典作家也諄諄告誡人們，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是行动的指南。恩格斯更具体的指出：“我們的历史見解主要是研究的响导，而不是黑格尔学派式的構造的槓桿。”<sup>①</sup> 我們坚持运用馬克思主义来研究中国历史，不是說人們研究問題可以不从客觀事实出發，而去从理論、从个别的結論出發；我們是說要拿馬克思主义作为响导，进行創造性的研究。那种随便列举几条材料、生按硬套馬克思主义公式或者食古不化、不根据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的做法，都是和馬克思主义的研究背道而馳的。上述馬克思主义經典作家們对中国历史的論断，却不是只涉及个别具体問題的个别詞句，而是馬克思主义解釋中国历史的根本观点。这些观点，第一，不仅如上文叙述过的，它是以大量的材料、最基本的事实为基础的，有充分根据。还有第二，有关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質、階級矛盾和革命力量等一系列的中国革命的基本問題，正是依据这些历史观点来分析、認識和确定的。中国革命的全部实践，檢驗了这些观点的正确性，証明了它們合乎历史發展的实际。

因此我們研究中国历史，尤其是研究中国近代史，應該以这些观点作为指針，来深入研究，提出問題和解决問題。离开这些观点，就必然要違反历史的客觀存在，并使許多中国革命实践已經解决了的問題無法得到合理的解釋，以致錯誤百出。尙鉞同志为了树立起他自己的关于中国历史的見解，拒絕以这些观点作为研究的指針，直接了当推翻了这些观点。他在“序言”中写道：“关于明清兩代社会性質的討論，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問題。這個問題的解决，不仅將影响到史学界对中国历史的某些傳統看法，如中国封建社会長期性或中国社会停滯論，乃至中国社会一直到1840年外国資本主义侵入以后，中国社会基础还是小农業与家庭手工業相結合的自然經濟等等，而且也將影响到中国近代史究竟以什么时期作为起点的問題。因为，不拘从社会經濟的發展上，或从上層建筑的意識形态發展綫索上，以及从中国社会內部的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的繼續和發展上，以1840年外国資本主义侵入的时间划一个分界綫，都是不很妥当的，而且有着斬断历史發展綫索的

<sup>①</sup> “給斯密特的信”。

毛病。”这段話是很清楚的說明兩件事：一，这里的所謂“史学界”的“某些傳統看法”，完全不是別的，正是前面举出的馬克思主义关于中国历史的一些根本論断，是从馬克思本人起的經典作家們多次申述过的論断。二，这些論断無論是从基础和上層建筑来查考，都証明其不正确，是斬断了历史的發展，不能成立。馬克思主义指出的中国封建制度的長期性，小农業与家庭手工業相結合的社会經濟結構和从鴉片战争起中国开始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这几点是互有关联的。尙钺同志所要树立的关于中国历史的奇異見解，是要極力夸張明末清初中国社会生产中的資本主义关系或資本主义萌芽，把中国資本主义的历史大大提前，改变明清之际的社会性質。为了这个目的，就不仅要否定鴉片战争是近代中国历史的开始，也必須一併否定中国封建社会的長期性和在明清以后，特別是在鴉片战争以后，中国还存在着小农業与家庭手工業相結合的社会經濟結構这个特点。

这里要指出：当尙钺同志明白否定馬克思主义关于中国历史的根本观点时，是和他表示在进行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的資本主义萌芽的研究这件事联系在一起的。我們指出他推翻了馬克思主义观点，却不是認为資本主义萌芽問題不需要或不可以研究。事情完全不是这样。

研究資本主义关系在中国封建制度内部、在鴉片战争以前究竟处于何种状态，产生了哪些作用等等，是个很有意义的題目。商品生产在中国出現很早。进入封建社会以后商品經濟有了發展。毛澤东同志說：“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經濟的發展，已經孕育着資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沒有外国資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將緩慢地發展到資本主义社会。”<sup>①</sup>这是完全正确的。研究这个問題，至少有下列意义：（一）有助于用中国的实际材料，具体闡明馬克思主义的历史發展观点，說明封建制度必然發展为資本主义制度的一般規律。目前我国抱有資產階級观点的历史研究者，仍在用各种方法歪曲历史發展的規律，为資本主义制度招魂。譬如雷海宗之流，否認五种生产方式的存在，就是这样一个例子。（二）可以揭示出中国历史的全貌和特点。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規律，表現在不同的国度里会各有特色，中国社会經濟生活中的特点尤其显著。（三）直接駁斥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散播的所謂中国如果沒有外国資本主义“開發”，社会就要永远停滯下去等关于中国历史發展的謬論。1953年“紅樓夢”的討論中強調这个問題以来，报刊上發表了不少有关的論著。虽然在解釋史料、判断萌芽大小、時間早晚等方面分歧很大，而收集材料、进行初步研究，却有其成績。如果講到缺点，我以为主要的是我們有些研究中国資本主义萌芽的人，把古代历史加以現代化了。所有这些作者的一个特点，就是把資本主义因素和資本主义以前的因素混淆在一起，并把現代資本主义的諸范疇和特征搬到在封建主义内部孕育着的資本主义早期阶段。同时从現有的論著中还可以看出，許多研究者的目的不明。他們只是这样那样証明在中国封建社会内部有資本主义关系，而不是着重研究这种关系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起了什么作用、有何特点等等。証明封建社会内部有資本主义关系，显然只是研究的开始，不是研究的最終目的。这些缺点要在研究中注意克服，也是可以克服的。

尙钺同志在“序言”中提出的問題，根本不是这些。他的研究对象本来是封建社会内部的資本主义萌芽，而他所作的結論則改变了封建社会的性質。因此，“序言”上一面推翻了

<sup>①</sup> “毛澤东选集”，596頁。

馬克思主義關於中國歷史的根本觀點，一面又提出了作者自己的與馬克思主義相對立的正面主張，並對中國近代歷史作出了一系列的新奇解釋，直接牽涉到中國革命鬥爭的一些重要問題。

讓我們先看看“序言”作者否定了鴉片戰爭是近代中國歷史的起點以後，他自己的關於近代史起點的答案是怎樣的吧！儘管猛然看起來這個答案有點含糊其詞，並且自相矛盾，但是在作者一而再、再而三地論述過之後，他的基本主張仍然是很明確的。

一種回答，是明末清初開始了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时代。作者寫道：太平天國“本身所具有的特點，如天朝田畝制度，平等和平均觀念的發揮，以及政治和軍事組織及其內容，如果不與明清之際的市民鬥爭及其參加農民鬥爭的現象聯繫起來，特別是不把它作為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起義所建立的政治制度與政策的一個發展來看，就無法解決。同時如果不把太平天國的政治制度與政治理想，作為從明末清初經濟思想上的均田、政治思想上的民主政治，和社會思想上的平等平均的觀念（由地主與農民平等、男女平等、追求個性解放、反對儒釋道封建宗教的束縛）等等反封建特權及反封建大地產鬥爭在意識形態上的反映的繼續和發展，並將它在人民大眾的革命綱領和實踐行動中具體化，也是無法理解的。”再寫道：“實質上太平天國所提出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理想，與產生於明清之際一直到太平天國時始終不停、繼續發展着的社會矛盾之上的新的社會思想與社會理論，乃至社會問題，如市民運動，特別是其中的資產者與無產者的鬥爭，在蘇州開始以階級的集團的形式出現，以及民主的和民族的思想的發展，都有着不可分割的聯繫。”這兩段話的要點是：（一）明清之際的时代，基本上就是鴉片戰爭以後的时代，這個时代特有的社會矛盾是“產生於明清之際一直到太平天國時始終不停”地發展着。（二）鴉片戰爭以後的舊民主主義革命时期的太平天國革命運動，實際上就是明末農民革命運動。它們不可分割的聯繫在一起。“序言”作者既否定了鴉片戰爭是近代中國歷史的起點，又從社會經濟、革命運動、上層建築等方面把明末清初和舊民主主義革命时期的太平天國直接聯繫起來，他是主張明末清初的时代，就是中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时代，這是很明顯的。再一種回答，明末清初是資本主義佔優勢的封建社會。“序言”上寫着：“明清之際的中國社會顯然還未達到質變的程度，所以仍然是封建社會。”“我們肯定明清之際中國社會仍然是封建社會。而封建社會內部，也有它發展不同的階段。”同時，那上面又寫着，中國的資本主義萌芽在“十六世紀前期開始”，“到十六世紀中葉以後，漸漸發展成比較有力的社會勢力”。（在“中國資本主義關係發生及其演變的初步研究”上，作者又說：“特別是明末三五十年間，中國社會已在開始起着本質的變化。”明末三五十年是十六世紀末、十七世紀初，比“十六世紀前期”晚幾十年。）“在十六世紀以前，中國社會雖然基本上還是自然經濟佔統治地位，但是由於商品經濟有了某些發展，在中國東南沿海商品經濟比較發展的地區，如蘇、松、杭的三角地區等城市手工業中已經稀疏地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再又寫着：“自明代中葉以後，中國封建社會已經是解體過程中的封建社會，不再是什麼自然經濟整體的‘完整的封建社會’，或‘原封未動的封建社會’。就是說，封建的生產關係已經逐漸變成了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嚴重阻礙，封建制度已經愈益成為要被推翻的東西了。……這就是在1840年隨着外國資本主義的侵入，引起了舊民主主義革命的開始，到1851年太平天國運動展開的反封建的民主的和民族的革命運動的歷史事變的關鍵。”這是明白地說，中國資本主義萌芽開

始于十六世紀以前,这种資本主义关系的向前發展,到十六世紀末十七世紀初,資本主义萌芽已經变成了資本主义优势,中国从此再也不是什么“完整的封建社会”,而是資本主义佔优势的封建社会了。因此,明清之际的这种变化,就成了后来历史事变的决定关键——主要是“反封建的、民主的”革命运动的关键。

稍微分析一下这两种說法,就立刻可以看出还有第三种回答:明末清初由封建社会变成了資本主义社会。这个回答从作者的思想邏輯上表現得很清楚。要是果真作者不認為明清之际的中国社会达到了質变的程度,那么“序言”上几乎用全部篇幅論述的下列各点就全都是無法解釋的和是無的放矢。(一)一再肯定了明末清初的社会变化是近代中国“历史事变的关键”;明末三五十年間“中国社会已在开始起着本質的变化”,又一再声明这种变化“未达到質变的程度”,無論如何这两个断語不是同义語,是針鋒相对的意思。究竟以哪个为准呢?不会是都对又都不对吧!(二)指摘以鴉片战争作为一个标志划分历史时期的不当,則正是認為明清之际已經开始了資本主义社会,要从此划分历史才是适当的。这完全推翻了明清之际仍是封建社会的論点,声明显然是一句空話而已,并無真实的內容。(三)只有認為明末清初的社会变化相当于鴉片战争以后的社会变化,才需要从社会經濟、革命运动、思想意識形态等各方面把明末清初和太平天国直接联系起来,虽然这种联系并無根据。要是果然認為明清的变化与后者不同,那时还是封建社会,这种直接联系就成了毫無意义的事体。(四)特别是馬克思主义著作中指出中国封建社会的長期性、指出小农業和家庭手工業相結合的社会經濟結構这个特点、指出鴉片战争以后,中国由一个封建社会逐渐改变为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这絲毫不排除鴉片战争以前,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孕育着資本主义萌芽、中国封建社会有不同的發展阶段,有它的前期和后期这个事实。这两者完全是一致的,并不矛盾。唯有認為明清之际發生了从封建社会进到資本主义社会的变化、鴉片战争以前有的不是資本主义萌芽,而是資本主义佔統治地位的社会制度,才需要根本推翻馬克思主义关于中国历史的观点。事情非常明显:或者是承認馬克思主义的觀點,正确地肯定鴉片战争以前中国社会内部已經有資本主义关系的發生;或者是否定馬克思主义觀點,認為从明清之际开始了資本主义制度,二者必居其一。“序言”上否定了馬克思主义的觀點,正是拒絕了前者,肯定了后者,这是很清楚的。举此四端,“序言”上声明承認明清之际仍是封建社会云云,其虛假而沒有內容,該是何等明显!

这几种說法,尽管表面上有分歧,但是有一个根本之点,貫穿着所有这些說法。那就是主張明清之际开始了中国从封建制度到資本主义制度的变化,明末清初是近代历史事变的关键、是中国近代历史的起点;而不是鴉片战争是近代历史事变的关键、是中国近代历史的起点。不管我們贊成还是反对这个主張,必須承認这就是尙鉞同志否定了馬克思主义觀點以后的正面主張。所以我說“序言”上的答案,乍看起来虽然有矛盾,实际上仍是很一致、很明确的。然而作者在叙述中又沒有公然的,直接了当的宣佈自己的結論。叙述中表現为吞吞吐吐,表現出一种欲語还羞,“脈脈此情誰訴”的神情。这不是别的,乃是充分暴露了作者的根据薄弱,邏輯上、論据上处处混乱,自相矛盾;并且对于所以要作某些声明的原意,正是欲蓋弥彰!

“序言”上还写着:作者的意圖很簡單,是根据“毛澤东同志的指示”来进行研究的。这表示作者認為自己的答案并不違反馬克思主义,有理論“指示”作为根据。只須核对一下原

文，就可以識破這是似是而非的。毛澤東同志所說的中国封建社会內部存在着資本主義萌芽，沒有外国的影响，也將發展到資本主義社会这段話只有兩層意思。一是沒有外国資本主義侵入，中国也是會走到資本主義社会去的；一是在封建社会內部孕育着的，還只是資本主義萌芽。此外再沒有別的意思。在这段話里絕對找不出彷彿鴉片戰爭以前的某个时期里，中国已經有了資本主義制度这个意思，而可以成为断定明清之际开始了資本主義制度的根据。

無論从事实、从理論上講，既然尚鉞同志否定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的主張都是站不住脚、不正确的，如是，他在有关中国近代历史的一系列重要問題的解釋上，就必然要違反事实、牽强附会；或者說，他在下面一系列重要問題的解釋上，既然違反历史事实，就必定要得出否定馬克思主義觀點的結論。

这些問題中首先是近代中国历史是不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制度历史的問題。前面指出过，我們通常說的中国近代史是指的1840年以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制度的历史。半封建半殖民地主要是外国資本主義在中国的控制。“序言”上主張明清之际就开始了中国近代历史，但是誰也不会相信，从那时起，就有了外国資本主義控制中国这个事实。这样，作者就只能認為中国近代史不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制度的历史；或是認為起先是資本主義、后来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再或者認為半封建半殖民地是指本国資本主義的發展，不是指外国資本主義的控制。無論哪样解釋，总之和我們的理解是根本不同的。第二是近代中国社会矛盾的性質問題。“序言”上写着“不拘从社会經濟的發展上，或从上層建筑的意識形态發展綫索上，以及从中国社会內部的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的繼續和發展上，以1840年外国資本主義侵入的时间划一个分界綫，都是不很妥当的。”又写着：不闡明1840年以前資本主義萌芽、發展、演進的过程，“就不可能了解1840年的鴉片戰爭中，东南沿海一帶中国人民自發的反侵略斗争之成为資產階級性的民主的和民族的旧民主主義革命开始的历史原因和物質基础”。这两段話里的“中国社会內部的主要矛盾”、“东南沿海一帶中国人民自發的反侵略斗争之成为資產階級性”的革命等，是一些恍兮忽兮、含糊混乱的概念。中国人民与帝国主义、封建勢力的矛盾，都是中国社会生活中的矛盾，沒有哪一种是中国社会“外部”的矛盾。鴉片戰爭則是有清政府在內的反侵略战争，不是只有“东南沿海一帶人民”参加的其他什么战争。并且有外国侵略就有反抗，不是要有資本主義萌芽才有反抗。这两段話的中心意思是：从明末清初起，直至鴉片戰爭以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是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的矛盾，封建勢力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这和大家的認識又是根本不相同的。毛澤東同志指出，帝国主义国家的資產階級和本国的地主階級“二者互相勾結以压迫中国人民，而以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为最大的压迫，因而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第一个和最兇惡的敌人”。<sup>①</sup>又指出：“帝国主义处在形成半殖民地这种矛盾的主要地位，压迫中国人民，中国則由独立国变成半殖民地。”<sup>②</sup>要是照“序言”上的說法，帝国主义与中国民族的矛盾，即令不是若有若無、不关痛痒，也只是在近代历史的半路上加进去的。中国人民的反帝国主义斗争，只有次等的重要性。第三是中国資產階級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的問題。我們說，中国資本主義發生和發展的过程，就是中国資產階級和無产

<sup>①</sup>“毛澤東選集”，604頁。

<sup>②</sup>同上書，790頁。



階級發生發展的过程。由于我国民族資本主义發生于外国資本主义侵入之后，所以民族資產階級有兩面性。他們的力量很軟弱，不能領導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取得胜利。“序言”上断定早在清朝初年已經有“資產者与無产者的斗争，在苏州开始以階級的集团的形式出現”。毛澤东同志論及中国無产階級的特点时指出：“中国無产階級的發生和发展，不但是伴随中国民族資產階級的發生和发展而来，而且是伴随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地經營企業而来。所以中国無产階級的很大一部分較之中国資產階級的年齡和資格更老些，因而它的社会力量和社会基础也更广些。”<sup>①</sup>这完全合乎历史的实际。“序言”作者在“中国資本主义关系發生及演变的初步研究”中反駁道：“在雍正年間，至少在中国江南苏、松、杭三角地区，資產階級和無产階級已在形成中，而且随着兩個階級的形成，也出現了这种新的階級矛盾和斗争。……如果認為近代無产階級只有在大机器工業出現之后才会出現，就未免切断資產階級和無产階級發展的历史，因而就不可避免地要得出中国無产階級产生于外国資本主义的侵入的錯誤結論。……我們不能以‘有大机器就有無产階級；沒有大机器就沒有無产階級’的形式主义公式，来簡單地概括中国社会的复杂和变化多端的发展历史。”<sup>②</sup>这除了肯定中国資本主义的發生、发展是在明清之际，是認為中国資產階級資格很老，不是那么軟弱無力。这是不認為中国資產階級是在半殖民地的条件下成長起来的，不是一开始就和外国資本主义有联系。第四是太平天国运动的性質問題。“序言”上不仅断定太平天国运动就是李自成运动的繼續，而且一再說它們的性質都是和所謂“市民斗争”、“市民运动”相联系的。虽然沒有直接肯定这种运动就是資產階級革命运动，但是却从反面否定了李自成起义和太平天国运动是不同时代的农民战争。从事实上和理論上都無法証明这一点。

諸如此类的問題和謬誤，都發生于一个根源：否定馬克思主义关于中国历史的根本观点，大大提前和“創造”了中国資本主义的历史。“認清中国社会的性質，就是說認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認清一切革命基本問題的根据”。<sup>③</sup>尙鉞同志对“国情”的認識与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絕然迥異，因此对中国革命的基本問題的看法，也必定要和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分道揚鑣、愈去愈远。其源不清，其流必濁，此乃理之所当然，勢之所必至啊！

翻开尙鉞同志的其他作品，我們可以知道，“序言”上的主張并不是孤立的。在作者本人看来这还很是合乎邏輯。他早在“中国資本主义关系發生及演变的初步研究”上充分發揮过这些論点，“序言”只是更加集中、更加明确起来了。在“資本主义关系研究”这本书里虽然沒有公然宣佈馬克思主义关于中国历史的若干基本論断是不适用的，而事实上却是全部推翻了馬克思主义的观点。書上的論述不止涉及鴉片战争以后中国历史上的一些根本問題，也涉及这以前的許多重要問題，很值得仔細加以研究。我現在只从这本书上照頁碼順序摘录若干段，看和“序言”有什么联系。

六七頁：“不拘在經濟上、政治上、以及社会矛盾和斗争的內容上与形式上，我們都可以看見明代，特別是明末三五十年間，中国封建社会已在开始起着本質的变化。”八九頁：“所以在商品經濟統治的地区，如工商業城市附近，水陆交通便利的地方，特別是資本主义

① “毛澤东选集”，579頁。

② “中国資本主义关系發生及演变的初步研究”，277—8頁。

③ “毛澤东选集”，603頁。

因素萌芽比較增長的蘇、松、嘉、湖、杭一帶及東南沿海地區，由於自然經濟與中農的衰落，農民向兩極分化的程度很大，工役制就逐漸為資本主義制所排擠。”九一頁：“從這種經營方式上，我們可以看到這個經營地主，已在把農業生產上，不論是主業和副業的生產物，都在當做商品，更正確一點說，當做佔有剩餘價值的手段來生產，而不是當做自己的消費品來生產。在這裡，我們明顯地看見，資本主義制度及經營方式的存在。因為，這種現象，只有由封建生產方式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過渡的國家或社會才會有的現象。”一一五頁：“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萌芽，就我們所涉及到的史料說，在明代如果還是集中在東南沿海地區，到清中葉則已經遍及於各地；如果在明代還只限於絲織業、陶瓷業、煤礦和東南的商業性農業等等，到清代中葉，則差不多遍及於各行業、各地區。……因此，我們認為在農業上，農民和地主的關係，在工商業繁盛的地帶，基本上已是契約的關係，在礦業、紡織業、陶瓷業、制茶業等等，就其結構來說，已經是資本主義的經營。它們與巨大機器工業的區別，只在它們的技術不發展，工人的工資低得僅能維持最起碼的生活。但是它們是資本主義的經營，是沒有疑問的。”一一八頁：“到清代……由於大量的農民被排擠出農村流向城市，而城市工商業由於統治階級的剝削、限制不能發展，無力容納，因之就再度形成以農民反對封建特權及大地產（“序言”上也有“反封建特權及反封建大地產鬥爭……”的話）為主体的新的中國社會危機，即第二次中國封建社會大危機。”一一九頁：“從上述的僱傭上萬人、上千人、或數十百人的手工業工廠相當普遍存在說，從商業資本組織家庭手工業的普遍現象說，這些已經具有一定社會性質的生產事業，除了技術比較不發達的情況以外，一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需要的物質條件都具備着。不僅如此，而且就它們的規模和結構來說，如果沒有強大政治上的壓力和阻礙，轉化為巨大的機器工業的物質基礎是存在的。”一四一——一四三頁：“所有這些現象都說明了中國社會，從經濟觀點看，已是資本主義的‘所謂原始積累’時期。……在這個場合，中國社會便不可避免地又走上了大革命的道路上。……明末和清代中葉，中國封建社會的兩次危機和大革命，不拘從形式和內容上看，都證明了馬克思和恩格斯論斷的正確。……在清代前期的生產事業中……封建制度向資本主義轉化的要求和鬥爭十分劇烈，但卻長期沒有完成這個轉化過程。這雖然由於生產事業內部，正確一點說，中國社會內部所保留的落后殘余的影響，但主要的却是清朝落后的統治助長着這些落后殘余影響作用的延長，阻礙了社會的發展。……因之，中國的生產事業拖着濃厚的封建尾巴，走上世界歷史舞台時，已經在外國的資本主義高壓之下，無力抗衡了。”不必再抄錄下去，歸納一下是：一、明末三五十年間，中國社會發生了由封建社會變為資本主義社會的本質變化。二、至清代前期，中國已是一個資本主義工業高度發展的国家。僱傭上萬人、上千人、數十百人的手工工場相當普遍存在。與後來擁有巨大機器工業的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相比，只是技術條件上有差別。三、農業方面，經營地主的生產是資本主義的農業生產、封建的租佃關係是資本主義的契約關係，地主集中土地和農民失掉土地的分化是農民變成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兩極分化。凡是農村中的反封建，都不是反封建，是反資本主義。四、中國革命的反封建任務不是反封建土地所有制，而是反封建特權及大地產。五、李自成運動是近代反封建特權及大地產的第一次大革命，嘉慶年間的白蓮教、天理教起事，是這種性質的第二次大革命。六、明清之際，是資本主義的原始積累時期，又是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過渡的階段。七、清代前期，中國社會內部只剩下封

建的落后残余影响。太平天国时期,中国的生产事業只是拖着濃厚的封建尾巴!書上这許多論断,早已徹底、全部、干淨地推翻了馬克思主义关于中国历史的根本观点。“序言”中明确提出否定馬克思主义根本观点,不过是这些論断的必不可少的画龙点睛之笔。

十六世紀末、十七世紀初年以后的中国历史,經過尙钺同志的描繪,是一个工业相当發达农村資本主义势力很强大的近代国家的历史。同一个时代里,即使在欧洲,也只有資本主义最先进的英国或者差堪媲美,这当然是一幅很壯丽的圖景。但可惜这只是出于想像,而不是历史的本来面目。

历史研究最怕碰見主觀性、片面性和表面性这些致命的敌人。尙钺同志否定馬克思主义观点,对中国近代历史作出許多新奇的論断,是和他的非常主觀片面的理解历史事件,甚至任意歪曲历史的反科学态度与随手抓来一些表面現象作为根据或任意解釋材料的不科学的研究方法是分不开的。在此不准备詳細討論这方面的問題,只举几个例子証明这一点。

曲解历史事件的例子:反鴉片战争是清政府組織的有广大人民参加的中国民族反侵略战争,为人所共知。鴉片战争是表明从此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把中国变为一个独立、富强国家的路綫,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把中国变为殖民地的路綫这两条道路的斗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們說鴉片战争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如前面提到过的,尙钺同志曲解了这个战争的性質。他說:“不闡明 1840 年以前,封建社会胞胎内部孕育的資本主义萌芽的發生、發展和演進的过程,及其到 1840 年以前,所达到的水平,就不可能了解 1840 年的鴉片战争中,东南沿海一带中国人民自發的反侵略斗争之成为資产階級性的民主的和民族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开始的历史原因和物質基础。”这就是說,不是反鴉片战争成为中国旧民主主义的革命开始,而是“东南沿海一带中国人民”自發的斗争才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这是为什么呢?是作者为了硬要把鴉片战争和“1840 年以前,封建社会胞胎内部孕育的資本主义萌芽的發生、發展和演進的过程,及其到 1840 年以前,所达到的水平”直接联系起来,也就是要把鴉片战争和这以前的“市民斗争”、“市民运动”直接联系起来。不管道光皇帝、林則徐,还是清政府的几万兵勇,显然都和“市民”毫不相干,就只有在“东南沿海一带中国人民”身上打主意。如是,中国民族反侵略战争的性質,就彷彿变成了“市民”反封建的性質。这是明显的歪曲历史。其次,就那时“市民”的作用來說,东南沿海自發参加反侵略斗争的主力并不是“市民”羣众。如三元里、新安、鎮海、升平社学等各次著名的斗争中,参加的多是农民羣众,领导的是有爱国心的地方士紳。相反的在禁煙过程中,那些与走私販毒吸毒生意有联系的市民羣众和流氓帮会,一直是一种破坏势力。他們在广州反对林則徐禁煙,并在云南、湖南、江西等地結队成羣公开打着旗子,兜售煙土,破坏禁煙措施。他們的活动成了清政府中妥协投降分子的有力借口。可是这些人一到“序言”作者的眼里都搖身一变,成了体现資本主义因素的先进人物。不科学的研究方法的例子: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学批評”“序言”上所写的关于基础与上層建筑变革的著名观点中告訴我們,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須时刻把經濟生产条件方面所發生的那些可用自然科学精确眼光指明出来的物質变革,与人們的意識形态分別开来。“正如我們評判一个人时不能以他对于自己的揣度为根据一样,我們評判这样一个变革时代时也不能以它的意識为根据”。尙钺同志相反。他在文章里一再強調要“把太平天国的政治

制度与政治理想,作为从明末清初經濟思想上的均田、政治思想上的民主政治和社会思想上的平等平均的观念(由地主与农民的平等、男女平等、追求个性解放、反对儒释道封建宗教的束縛)等等反封建特权及反封建大地产斗争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的繼續和發展”来看待。这正是要以意识形态作根据来判定明末清初的时代,就是太平天国革命的时代。不仅如此,在这里还是把一些不属于明末清初特有的意識指为这个时代特有的意識。“均田”在北魏、隋、唐就在某些地区施行过(虽然实际上只是“均賦”),不限于是一种經濟“思想”。所謂政治上的民主思想历代都可找到某种材料,最早的要算是孟子“民貴君輕”的思想。据孙中山自己說,他的民权主义思想是受了孟子思想的影响。这些显然都是随手抓来的浮泛材料、表面現象,又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們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上說过这样一段話:“不言而喻,家庭手工制的大生产乃是資本主义工業:这里已具备有資本主义工業的一切标志——即已經高度發展的商品經濟、生产資料集中于單个私人掌握,工人大众遭受剝夺,他們既沒有自己的生产資料,也就只好把自己的劳动用在別人的生产資料上,不是为自己工作,而是为資本家工作。显然,这种手工業按其結構說来,純粹是資本主义;它与巨大机器工業相較的特点就是技术不發展(主要是因工資低得不成样子),以及工人們保存有很小一点点耕作經濟。”<sup>①</sup>列宁这一段話是分析1883年俄国司法要聞上的一个統計材料时說的,是講的1861年俄国廢除农奴制,作了有利于資本主义的改革以后二十几年的情况。尙鉞同志不加分別把它搬来套在清代前期的社会生产上,作出結論說:清代前期上万人、上千人的手工工場普遍存在,“就其結構來說,已經是資本主义的經營。它們与巨大机器工業的區別,只在它們的技术不發展,工人的工資低得仅能維持最起碼的生活。但是它們是資本主义的經營,是沒有疑問的”。这样十七世紀末、十八世紀初的中国,就变成了十九世紀80年代的俄国,中国的資本主义就这么大大發展起来了。任意解釋材料的例子:苏州“奉各宪永禁机匠叫歇碑”是說明早期的手工業工人和工場主的矛盾和斗争的材料,被作者解釋成了近代“資產階級和無产階級两个階級对立的 存在”。云南采銅業和四川制鹽業都是封建性很大的一种特殊形式的作業,被作者解釋成了上万人、上千人的資本主义的工場手工業。这些材料本来很有价值,經過这么任意解釋反而湮沒了原有价值。

正因为尙鉞同志的“序言”和書上的主要观点并不是作了認真的研究而后提出的,其主要的論据,都和他研究問題的主觀性、片面性和表面性結合在一起,所以他的主張、他的論据就必然是站不穩、靠不住的。但是尙鉞同志的否定馬克思主义关于中国历史的根本观点,大大提前中国資本主义历史的主張却不是偶然的、有他的来历。照我看来,这个来历主要是国外某些早期的掛着馬克思主义招牌的历史研究者的錯誤見解在尙鉞同志的思想中根深蒂固,再加上早年国内若干出版物中錯誤观点的影响,是这二者的結合。因此他的这一套主張实际上是翻开了二十几年以前的一本陈賬。

二十年以前,那时中国正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間。先从国外起,很快發展到国内,形成了一股研究討論中国社会經濟生活和中国历史的風气。1930年以后馬吉亞尔的“中国农村經濟研究”、“中国經濟大綱”和沙發諾夫的“中国社会發展史”等先后被当做“世界名著”譯

<sup>①</sup> “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們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 外国文書籍出版局本, 100頁。

成中文出版，風行一時。1931年起國內以“讀書雜誌”為中心有過一場關於中國歷史和中國社會史的爭論。往後又有自稱為“中國社會史專攻刊物”的“食貨”半月刊和新生生命書店出版的一些有關中國歷史和中國社會史的作品，繼續傳布他們的主張。其中以“讀書雜誌”的影響為最大。參加討論的，有誠心企圖用馬克思主義觀點探討中國社會歷史的人，有不少的托派分子和黃色文人。後面這類人的作品涉及的范围很廣，他們要論證的主要問題却只是這樣兩個：一是把中國社會歷史特殊化的問題，所謂“亞細亞生產方式”是這個問題的中心。一是把中國封建社會半封建社會資本主義化的問題。如馬吉亞爾在論述“帝國主義侵入前的中國社會結構之特征”時寫道：“土地在這裡並不是血族的世襲財產，與封建主的一代傳授一代不同，土地自由買賣，其所有權的交替，完全和在資本主義之下一樣。當然，在中國存在着大農業，但沒有封建的所有權。在那裡存在着專靠地租生活的階級。雖然這些地租純粹以實物交納，但不是基於統治權利之封建的地租；這是‘資本主義的’高利貸的地租……。”<sup>①</sup>又如陶希聖、李立中等人主張秦漢至鴉片戰爭以前的中國，是“商業資本主義社會”、“前資本主義社會”；任曙、嚴靈峰等則宣傳中國農村早已是資本主義的農村；中國封建經濟早已崩潰而成為“殘余的力量”等等。這次爭論，是當時一場尖銳複雜的鬥爭。經過爭論，有許多荒唐錯誤的觀點得到了澄清，特別是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土地革命的實踐，證明了把中國資本主義化的一切論點是毫無根據的。現在尙鉞同志的主張是把我們引回到二十多年前的爭論中去了。雖然他採用的材料、問題的提法等有所區別，而問題的實質却並無二致。看來有的論點即使並非從那些觀點錯誤的作品中摘取來的，也是受了它們的強烈影響。我相信尙鉞同志是想到過要把他自己的主張和陶希聖等人的主張劃一條界綫的。“資本主義關係研究”這本書上寫的“作者的話”里特別痛斥陶希聖之流，就表明他意識到了這一點。但是作者怎麼想過是一回事，黑字印在白紙上擺在讀者面前的又是一回事。正如作者根據自己的看法來決定寫什麼和不寫什麼一樣，讀者只能根據作品來決定接受哪些和反對哪些。這即使和作者設想過的事情不盡相吻合，那又能怪誰呢！

也還要指出：如果認為尙鉞同志提出的問題，僅僅限於否定馬克思主義關於中國歷史的根本觀點，提前了中國資本主義的歷史，就未免估計不足。“序言”上還涉及到修改馬克思主義某些基本原理的問題。例如遵照馬克思主義，每個經濟基礎有適合於它的上層建築。隨着基礎的變更，上層建築或遲或速也要發生變更。新的基礎形成以後，就會隨着產生適合於新基礎的新上層建築。尙鉞同志斷定：明末清初封建的基礎已經發生了本質的變化，這以後的封建經濟只是個“尾巴”和殘余影響，可是明清之際以後的上層建築，仍不是資本主義勢力的統治而是封建落后勢力的統治。因之革命鬥爭不是反封建的基礎，而是“反封建特權”，即反封建的上層建築。照此說來，每一個基礎不一定會有相適應的上層建築，或者基礎改變了，上層建築如直接聯繫基礎的統治勢力、政權性質等，不一定就要改變，或者可以長期不改變。如是，馬克思主義關於基礎與上層建築的理論就最少是成了不大正確、不大適用的東西。再例如遵照馬克思主義，生產關係的變更，由舊生產關係進到新生產關係的過程，通常是表現為用暴力或經過階級鬥爭推翻舊生產關係，奠定新的生產關係。馬克思說“強力是每一個舊社會在懷孕着新社會時的產婆”。尙鉞同志主張明末清初由舊生

<sup>①</sup> “中國經濟大綱”，416頁。

产关系进到了新生产关系,其主要的內容是說那时資本主义經濟和上層建筑如何如何,而沒有能够証明那时也經過了代表新生力的資產阶级的社会革命。即令如作者那样,把李自成这种在中国历史上重复过無數次的、很快失敗了的农民战争,解釋为“市民运动”或反封建的大革命,但是畢竟也不能断定从此推翻了旧的生产关系,确立了新的生产关系。我們知道世界許多国家由封建制度进到資本主义制度,是經歷着不同的道路。英国、法国走的是經過資產阶级革命,推翻封建制度的古典道路;美国則沒有經過封建制度进入了資本主义;德国又走的是用改良办法进入資本主义的所謂“普魯士道路”。俄国、日本也都是經過改良主义进入資本主义的。其中美国沒有經過封建制度,姑不具論。像德国、俄国和日本的改良主义,絕不能說是沒有經過推翻旧生产关系的过程,或沒有經過阶级斗争。1850年以后的德国农业改革和德意志再統一运动、1861年俄国廢除农奴制、1868年日本的明治維新运动等,不但是表示出新制度战胜了旧制度,并且也是复杂的阶级斗争的結局。試問明末清初几时有过这种改良运动呢? 所以照尙钺同志的說法,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和革命的学說,也就不無問題。

附帶說到一下,在这里,我發覺尙钺同志的主張倒是提出来了封建社会进到資本主义社会的标志是什么——这样一个值得研究的題目。要确定封建社会进到了資本主义社会,是只根据經濟成份来区分呢,还是要依据在一定經濟基础上所發生的阶级斗争和反映阶级力量对比的政权性质的变化来划分? 从封建社会进到資本主义社会和从資本主义进到社会主义的根本不同之处,是資本主义为社会主义准备了物質条件,但是在資本主义社会内部沒有社会主义的生产資料所有制,而在封建社会内部則早就存在着資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以英国为例,早在十六世紀資本主义的所有制已經佔有很大的比重,但是直到十七世紀資產阶级革命,并参加掌握政权以后,英国才是一个資本主义国家。所以資產阶级革命,夺取政权,其作用在于保护和發展資本主义經濟,而不在于“創造”这种經濟。斯大林分析資產阶级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时說:“資產阶级革命底基本任务就是夺取政权,并使这政权适合于現有的資產阶级的經濟,而無产阶级革命底基本任务,却是要在夺取政权以后来建設新的社会主义的經濟。”<sup>①</sup> 这个道理是很清楚的。因此,要区分封建社会和資本主义社会的界綫,仅从經濟成分着眼是不行的;而建立起保护資本主义利益的資產阶级的政权,則是推翻旧的制度,建立起新的制度的一种根本的标志。中国历史上沒有資本主义社会,也沒有建立过代表民族資產阶级利益的政权。但是1840年鴉片战争失敗,清朝政府与外国簽訂了一系列的有利于外国資本主义侵入中国的条約以后,这个政权的性质即开始發生变化,中国从此喪失了作为一个独立国的地位。以后这个政权更日益加深地成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統治中国的工具。正因为如此,我們才把鴉片战争看做中国开始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一个标志。如果只看中外貿易关系,第一次鴉片战争显然沒有立刻引起大的变化。尙钺同志的論述中沒有直接指出以什么作为封建社会进入資本主义社会的标志問題,不过按照他的分期主張,实际上是以經濟成分变化作为标志的。大家不妨討論一下,弄清楚这件事,对于研究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的資本主义萌芽也許有点好处。

<sup>①</sup> “列宁主义問題”, 166 頁。

如上所述,这篇“序言”虽小,那上面提出的問題确实滿多,并且是历史研究中的大問題。

沒有人怀疑馬克思主义將不断向前發展,也沒有人怀疑学术研究中要有百家爭鳴、百花齐放。問題在于这种爭鳴、这种拒絕馬克思主义、标新立異的作法,到底有几分道理、有多少根据? 我的意見是:(一)前述馬克思主义关于中国历史的根本論断是正确的,經過時間的考驗,这些論断愈益增加了光輝。(二)中国近代历史,即半封建半殖民地制度的历史要从1840年鴉片战争算起。明清之际,中国封建社会內部的資本主义因素有了增長,但此时仍是封建社会,并不是中国資本主义或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起点。(三)尙鉞同志提出的推翻馬克思主义关于中国历史的根本論断,大大提前中国資本主义历史的主張,違反科学、違反中国历史的实际,是不能成立的。这种主張不仅几乎涉及中国近代历史上的所有的重要問題,而且还是反映出来了近来某些研究者的一种思想傾向。因此,我覺得历史学家們特別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人,有必要注意一下這個問題,不要等閑視之。

我自己在这方面知識淺陋,馬克思主义水平很低。本文目的在于提出問題。看法可能有不少錯誤,願意得到尙鉞同志和讀者的指正。

## 学术消息

### 中央文字改革委员会常委章懋

#### 同志来校作“关于文字改革的问题”的报告

1957年12月4日中文系语言学、汉语两教研室举行了本学期第一次科学报告会，请教育部付部长、中央文字改革委员会常务委员章懋同志作了“关于文字改革的问题”的报告。到会的有中文系师生三百余人。

章懋付部长是由汉字演变的历史与文字改革拼音化运动和文字改革的方针步骤两方面来谈文字改革问题的。

他首先指出了汉字是走着由繁而简，由表形、表义而趋向表音的过程的。由甲骨金文到篆书到隶书到草书、楷书、行书这一汉字衍变的历史事实以及简体字在人民的创作中应用了近千年和近百年来的由于与西方语言的接触而由先进的语言学家们所倡导的拼音化运动，也说明了人民和汉字发展本身都要求走简化和拼音化的道路。而这条正确的道路只有党才给以支持，只有在今天才可能在这条道路上大步前进。章付部长特别强调了文字改革是关系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关系成亿的尚未认字的劳动者和我们的后代的切身利益的大事；在这件事上眼光短浅和不由实际情况着眼都是错误的。

文改的道路是先实行汉字简化，同时大力推广普通话，研究制定一套拼音方案为汉字注音以助普通话的推行，然后再逐步地推行拼音化。文改的总的方针是逐步推行的方针，也就是要经过长时间的讨论、研究、实验，经过一个汉字与拼音

文字的交互运用的过渡时期，逐步扩大拼音文字的使用范围，最后拼音文字必然会取得正式文字的地位。

章付部长用无可争辩的事实论述了汉字的优缺点特别是汉字在学习和使用上的极大不便和拼音文字的优越性。并且着重地解决了知识分子所存在的两大问题：实行拼音化，知识分子会不会成为文盲？如何接受文化遗产？关于第一个问题，他说：实行拼音化不是一朝一夕可能完成的；一方面汉字与拼音文字并行，一方面知识分子也要努力学习新文字，这就不成为问题了。而关于第二个问题，他认为，就实际情况看，既使在文改之前的现在，这也只是少数专家向群众如何介绍的问题，群众根本不能看懂那么多深奥的文学遗产。将来，我们会有更多的专家来从事文学遗产的研究，整理与翻译的工作，通过他们，人民在掌握了比旧文字方便得多的新文字以后，将能更好地享受文化果实。“就我个人看来，”最后他说，“实不实行文字改革已经不应是争论的问题了；这是利于社会主义建设，利于人民掌握文化科学知识的问题。人民掌握了文化科学，就能推进社会主义建设，更快地向着共产主义的大道前进！”

与会的师生都认为这次报告解决了他们关于文改所存在的许多重要问题。

（和年）



# 略論歐洲資產階級文學里的 人道主義和個人主義

馮 至

五四運動以來的新文學是在黨的領導下，繼承祖國的文學傳統，向蘇聯文學學習而發展起來的，但是歐洲資產階級文學也給了它不少的影響。在將及四十年的歲月內我們曾經大量地翻譯歐洲各國的文學作品——在這以前林紓、蘇曼殊等人的譯述還不計算在內——這些作品在知識分子中擁有相當廣泛的讀者，成為藝術工作者精神食糧中的一部分。對於外國的文化，毛主席在十七年前就這樣明確地指示過我們：“把它分解為精華和糟粕兩部分，然後排洩其糟粕，吸收其精華，才能對我們的身體有益，決不能生吞活剝地毫無批判地吸收。”<sup>①</sup> 這句話經常被人引用，但在實踐中卻做得很不夠；文學遺產，不管是祖國的，或是外國的，我們都很少進行具體的分析批判，指出什麼是有益的，什麼是有害的。過去胡風反革命集團披着馬克思主義的外衣，私販資產階級藝術思想，以反對黨所領導的藝術方向，曾迷惑過一些青年；今年右派分子向黨、向社會主義猖狂進攻，里边有一部分人摘取歐洲資產階級文學遺產中的文句，或是宣揚其中一些過了時的思想，作為他們的“武器”，也起了一定的混亂作用。在我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時代，我們從事文學研究的人對於怎樣對待歐洲資產階級文學遺產這個問題是再也不容忽視了。

這裡說的歐洲資產階級文學遺產，是從十六世紀到二十世紀初期四百年內一些有成就的作家和詩人遺留下來的作品。在資本主義上升時期，正如斯大林在蘇共第十九次代表大會會議上的演說里所說的，“資產階級高唱自由主義，維護資產階級民主的自由，從而在人民中間為它自己樹立了威望”；也就是這時期內，資產階級藝術有了輝煌的成績，豐富了世界的文學寶庫。如今的資產階級，它的“民主的自由這種旗幟已經被拋在一邊了”，本身到了日薄西山、氣息奄奄的境地，它的藝術也充滿了混亂和陰郁、變態和墮落，沒有前途，沒有希望。至於歐美的一些優秀的共產主義作家，是和資產階級根本沒有關係或是斷絕了關係的，不能屬於這個範疇以內。

資產階級是雙手染滿了血腥通過殘酷的剝削起家的，它一開始，就暴露了它本身帶來的缺陷。它和封建社會的關係是錯綜複雜的，時而鬥爭，時而妥協，直到它最後全面地掌握了政權和經濟命脈，中間延續了三百年之久。當它一方面摧毀封建制度，改變生產關係，一方面依靠冒險性格和企業精神來積累它的財富時，這個階級的詩人和思想家們卻對於人類的將來抱有相當遠大的理想。他們對當前的社會表示不滿，攻擊、諷刺，同時也樹立了人道主義的目標。人道主義重視人的個性和尊嚴，倡導以“人”為中心，是針對中世紀

<sup>①</sup> “毛澤東選集”，第二卷，678頁。

否定人的价值和現世生活的基督教道德而提出的；这种思想是过去不曾有过的、属于未来的一个理想。可是人道主义者在进行宣傳时，却求助于过去，說希臘羅馬时代是他們的榜样。以人道主义为主要成分的“文艺复兴”也是因此而得名的。資產階級的史学家从表面上看問題，認為“文艺复兴”是当真地在恢复希臘羅馬的生活方式和艺术形式，“复兴”古典文化，資產階級文学史家对于后来文学里的古典主义也是这样看法。当然这也是事实，“在拜占庭复灭时被拯救出来的手抄本中，在从羅馬廢墟里發掘出来的古代雕塑像上，驚訝的西欧忽然看見了一个新世界——希臘古代”<sup>①</sup>；这个古典时代的文化对于新的时代起了很大的激發和鼓舞的作用。但究竟“这种資產階級文化与古典文化有性質上的不同，它是在封建制度內部形成的新的資本主义关系的产物”。<sup>②</sup>这种求助于过去，和中国历史上从王莽到康有为的“託古改制”有許多类似的地方。关于这个問題，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政变記”里作了精辟的分析。馬克思說，“恰好在人們彷彿是一味从事于改造自己和周圍事物，并創造前所未聞的事物时，恰好在这样的革命危机时代，他們怯懦地运用魔法，求助于过去的亡灵，借用他們的名字、战斗口号和服裝，以便穿着这种古代的神聖服裝，說着这种借用的語言，来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場面。例如，路德換上了傳教徒保罗的服裝，1789年至1814年的革命依次借用了羅馬共和国的服裝和羅馬帝国的衣裳……”又說，“不管資產階級社会怎样缺少英雄精神，然而它的誕生是曾需要过英勇行为、自我牺牲、恐怖手段，內战以及民族战斗的。在羅馬共和国典型般严肃的傳說中，資產階級社会的斗士找到了必需的理想、艺术形式和幻想，为的是不讓自己看見自己斗争的資產階級的狹隘內容，为的是要把自己的热情保持在偉大历史悲剧的高度上。”<sup>③</sup>这段话經常被欧洲馬克思主义的文学史家引用<sup>④</sup>，因为它精透地說明了文艺复兴以及古典主义和一部分浪漫主义的本質。但是等到新的社会形态形成，資產階級在政治上和經濟上获得了胜利，不顧一切把金錢財富作为它奋斗的目标时，它就“忘記古代羅馬的幽灵曾經守护过它的搖籃”了。这时“远古的巨人連同所有复活一时的羅馬古董……就消失不見了。……它的真正的統帥已是那些商务帳房里的办事人員，它的政治首領已是头肥如猪的路易十八了。”<sup>⑤</sup>在这时期，也就是十九世紀三十年代以后，人道主义的理想幻灭了，古典主义或浪漫主义的庄严的或燦爛的外衣再也穿不住了，因而产生了批判的現實主义。这些批判的現實主义者被高尔基称为資產階級的“浪子”，他們具有銳利的眼光和高度的艺术手腕，对于資產階級社会的冷酷無情和假仁假义給以揭發批判，可是自己面对着这些現象却感到沒有出路，不是悲觀失望，就是个人的孤軍奋斗，法国的和俄国的一些十九世紀的作家最能够作为他們的代表。到了二十世紀，经历了兩次世界大战以后，“現代資產階級西方的作家”，正如爱倫堡所說的，“不知道明天他們的人物、甚至他們自己將碰到怎样的遭遇。当听到朋友說再过一年就有原子彈掉下来，当一条街上走过大队美国兵，另一条街上走过大队罢工工人的时候，是很难草拟一部小說的大綱的。因此有的文学家在報紙上作歇斯特里的号叫，有的

① “馬克思恩格斯文选”，1954年莫斯科外国文書籍出版局版，第二卷，62頁。

② “文艺复兴”（苏联大百科全書选譯），1955年人民出版社版，第3頁。

③ “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一卷，223頁及224頁。

④ 如德国維康·基尔奴斯（Wilhelm Girmus）在他編纂的“歌德論文学与艺术”（Goethe, Über Kunst und Literatur）的导言里；波蘭文学史家揚·郭特（Jan Kott）在他的“論古典作家”（Szkola Klasyków）里。

⑤ “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一卷，224頁。

勉强描写一些只能引起精神病医生和刑法学家的兴趣的咄咄怪事。”<sup>①</sup> 資產階級文艺到了这种地步,也正和它所隶属的階級一样,到了瀕于死亡的时刻了。代替它的自然是如日之初升的、前途有無限远景的社会主义文学,这是毫無疑問的。

前边只是給欧洲資產階級文学一般的發展作一个粗淺的描述,以便于进行討論。欧洲資產階級文学在它从兴起到衰落的四百年內产生过許多偉大的作家和詩人,他們遺留給我們許多不朽的作品,这些作品感动着、教育着广大的人民,对于人类进步事業起了不少的推动作用。現在的資產階級像是墮落的子孙一般,已經沒有能力承受这笔丰富的遺產;它过去不曾、將來更不可能实现那些人道主義者的理想,至于那些“浪子們”对它的批判和揭發只成为它眼目中的針刺。只有無產階級,“是世界文学宝庫中全部优秀东西的惟一繼承者”。1934年,日丹諾夫在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上的講演里这样說过,“資產階級浪費了文学遺產,我們必須把它仔細地收集起来,加以研究,而且批判地接受下来,向前推进。”<sup>②</sup> 我們为了建設社会主义文化,这笔遺產和我們祖國的文学遺產一样,必須接受下来。接受,并不是不加選擇地全部接受,而是要用历史唯物主義的觀點方法加以分析批判;否則其中一些对于社会主义相敌对的东西就会在我們中間造成危害。但我們也不能因为这些东西在精神上是和社会主义相敌对的而否定它們在当时起过的積極作用。这个工作是复杂的、艰巨的。因为一部文学作品写得越成功,感人的力量也越大,讀者在受它感动的时候,就容易縮短和它的距离,失却客觀的分析批判的态度;有时会更进一步,起了共鳴,沉溺在書的世界里,脫离现实,甚至盲目地接受了它的指导。并且中国現在的知識分子絕大多数还是从剝削階級出身的,过去一向受的是資產階級教育,在思想感情上,他們对于欧洲資產階級文学比对于祖國長期封建时代遺留下来的古典文学还要更接近些。例如唐宋的詩詞、元代的戏曲、明清的小說,以及京剧和地方剧,我們尽可能欣賞它們,受到感动,但是很少接受它們作为行动的指导,因为大家都意識到其中的悲欢离合,是封建社会中的反映,和我們現在的思想情感有了一定的距离。但是欧洲資產階級文学里的一些主題思想,在中国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發生过不少的影响,在知識分子中間是容易引起共鳴的;如今,当資產階級思想和無產階級思想在許多人的頭腦里还在爭奪地位的时候,它們对于我們的思想情感有着比中国过去的封建时代文学更为复杂錯綜的关系。也就是这个原故,胡風反革命集团为了破坏文艺上的工农兵方向,是那样处心积虑地推崇欧洲資產階級文学,而否定中国的古典文学;也就是这个原故,右派分子向党、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有些人大量地从欧洲資產階級文学中窃取文句,而很少从中国古典文学中窃取。这就是因为資產階級文学中一些主題思想可以被他們用来起迷惑作用,当作一种“武器”。其中他們狂妄地認為最能得心应手的是人道主義思想和個人主義的人生觀。

人道主義又譯作人文主義或人本主義<sup>③</sup>,是資本主義初期和上升時期哲學界、文學界和艺术界中的一个主要思想內容。人道主義者在“復興”古典文化的号召下提倡对于人的

① 引自爱倫堡的“談作家的工作”,見“論写作”,195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250頁。

② “苏联文学艺术問題”,195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28頁。

③ 这三种譯法各自可以代表“Humanism”这个字的含义一方面,不能概括它的整个意义;为了方便起見,这里用了含义較為廣泛的“人道主義”的譯法。

关怀,对于人的爱,对于人的尊重。中世紀的教會否定人的价值和現世生活的意义,倡導禁慾主义,他們为了把人类从它的束縛中解放出来,主張保护个人的权利和人格,恢复健康的情感,肯定生活的欢悅。早在十四世紀,意大利的薄迦丘在“十日談”里就尖銳地諷刺了虛偽而淫蕩的天主教僧侶和封建貴族,讚美銳敏的理性,歌頌市民对于生活的热烈追求。在十六世紀初期,鹿特丹的爱拉斯慕斯(Erasmus von Rotterdam)的“愚蠢頌”、德国人封·胡騰(von Hutten)和其他人道主义者合著的“蒙昧者書簡”都充滿了对于当时种种缺陷和經院哲学偏狹的世界觀的嘲笑和攻击。这时的人道主义者代表着进步势力,勇于論战,但是缺乏广泛的羣众基础。他們多半是沒落的貴族或市民出身,局限在少数知識分子的圈子里,他們使用的文字还是一般人民不能理解的拉丁語。封·胡騰比較注意广大羣众,把他一些著作譯成德語,后来也直接用德語写作,并且参加1522年弗蘭次·封·吉庆根的騎士起义。但他的目标和当时托馬斯·明采尔领导的农民战争是不同的,他希望組成貴族的民主,对农民階級仍然是繼續压迫<sup>①</sup>。当时的劳动人民,尤其是农民,受着殘酷剝削,他們不只沒有注意到,而且認為是應該的。他們在攻击和揭發社会上种种愚昧和不合理現象上起了積極作用,但是所謂重視人的人格和尊嚴,只不过是一个空幻的理想而已。

人道主义理想和現實社会罪惡的鮮明的对照,在莎士比亚的著作里我們处处可以讀到。我們听得到哈姆雷特說出人的尊嚴,并且也决心为此而战斗,(虽然归終是一場悲劇),“人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件作品!理想是多么高貴!力量是多么無穷!仪表和举止是多么端整,多么出色!論行动,多么像天使!論了解,多么像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長!”<sup>②</sup>同时却也听到泰門在“雅典人泰門”第四幕里那种对全人类的絕望的詛咒。崇高理想和現實罪惡的尖銳矛盾,莎士比亚在他第六十六首十四行詩里写得最为沉痛:

这一切叫我厭倦,我求死、求安息:

眼看着美德生下来就成乞丐,  
不足道的人却穿起华貴的衣飾,  
純潔的盟誓遭受背信的災害,  
燦爛的荣誉屈居卑下的地位,  
处女的貞节遭到粗暴的蹂躪,  
正直的完人蒙受了可耻的冤罪,  
跛脚的淫威把精壯打成廢人,  
权势把文艺嚇得結舌無語,  
愚昧冒充博雅摆佈賢能,  
朴素的真理被人錯叫成痴愚,  
善良当囚虜听从惡將的命令:

这一切叫我厭倦,我要离去,

只是,我一死,我的爱就将孤寂。<sup>③</sup>

<sup>①</sup> 参看弗蘭次·梅林“德国历史”,(Franz Mehring, Deutsche Geschichte) 1947年柏林狄次出版社版,46頁。

<sup>②</sup> 根据卞之琳譯文,莎士比亚“哈姆雷特”,1956年作家出版社版,61頁。

<sup>③</sup> 根据楊周翰譯文,見“文学研究集刊”第二册,195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255頁。

這裡，所有的美德、純潔的盟誓、燦爛的榮譽、處女的貞節、正直的完人、精壯、文藝、賢能、朴素的真理、善良等崇高的道德和美好的事物都被現實罪惡給摧殘踐踏了。這些罪惡是腐朽的封建社會和資本主義在它一降生就帶來的種種缺陷給組成的。這種矛盾是難以解決的，封建社會的腐朽還沒有掃除，資產階級又隨身帶來了血腥的污穢，致使詩人絕望地祈求死，祈求安息。

西班牙偉大的小說家塞萬提斯在“堂·吉訶德”里無情地嘲諷了封建騎士制度，它的主人公到處救助被壓迫者和被侮辱者，保護弱小者，反抗不合理的現象，雖然得到的結果和他所預期的往往適得其反，但是讀者對於他的“義舉”是寄予同情的。並且塞萬提斯跟他較早的和與他同時代的德國農民領袖托馬斯·明采爾、英國“烏托邦”的作者托馬斯·摩爾、意大利“太陽國”的作者康柏內拉(Campanella)一樣，認為罪惡的根源是財產私有制了。他說，“古代的人叫做黃金時代的那個時候是幸福的，這並不是因為被我們這個鐵器時代看得非常珍貴的金子在那愉快的日子裡可以毫不費力就得到，而是因為那時的人還不知道什麼叫‘你的’，什麼叫‘我的’。在那些神聖的日子裡，一切都是人們共同所有的。”<sup>①</sup>只有廢除私有制才能實現“黃金時代”，這是正確的；不過塞萬提斯並沒有把它放在將來，而是放在“古代”了。

總之，從文藝復興以來，人道主義不過是一些詩人和思想家對人類的一種理想，他們面前的現實和這個理想是有很大的距離的，他們在這中間，有的把這理想放在遼遠的未來，有的放在過去，有的抱有無限的希望，有的感到絕望。在啓蒙運動的世紀——十八世紀——啓蒙運動者推崇理智，相信人類的進步，他們為人道主義的理想而奮鬥，比較具有信心。在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交替時期，以歌德為首的德國古典文學，對於人道主義理想提出更為具體的內容：只有在自由和法則、個人和集體的結合中，這個理想才能實現。歌德在一首十四行詩的末兩句這樣說：

在限制中才顯出來能手，  
只有法則能給我們自由。

他在他的小說“維廉·麥斯特的漫遊時代”里提出來他的教育理想，對於兒童要有計劃地、集體地進行教育，每個人要到處為人為己都有用處，人人要有一技之長而又有益於集體。歌德名著“浮士德”的主人公經過了一生艱苦的奮鬥，追求知識，追求愛，追求為統治階級服務，追求美，都不能得到滿足，最後在率領人民征服自然中体会到“智慧的最後的結論”——

要每天每日去開拓生活和自由，  
然後才能够作自由與生活的享受。

他最感到滿足的是——

我願意看見這樣熙熙攘攘的人羣，  
在自由的土地上住着自由的國民。<sup>②</sup>

歌德寫這樣的詩句時，是十九世紀的二十年代，是無產階級起始形成的時期，他把這樣一個人類的遠景作為他的人道主義的目標，這目標只有在二十世紀工人階級政黨領導的社

① 參看米羅波爾斯卡亞“塞萬提斯和他的‘堂·吉訶德’”，見“譯文”，1955年9月號，70頁。

② 根據郭沫若譯文。歌德“浮士德”，1955年人民文學出版社版，第二部，356頁。

會主義國家里才真實地達到了。

也就是在這個時期，資產階級全面進軍，在政治上和經濟上獲得決定性的勝利，“它的真正的統帥已是那些商務帳房里的辦事人員”，唯利是圖的猙獰面貌越來越顯露，再也不“需要對過去事物作世界歷史的回顧，為的是要向自己隱瞞自己的內容”<sup>①</sup>了。在文藝界里，古典主義和浪漫主義讓位給批判的現實主義，希臘羅馬再也不引起詩人和作家們的热情嚮往，代之而起的是像巴爾扎克那樣的作家揮起他的如椽之筆在“人間喜劇”里來寫資產階級命運的史詩。在這“史詩”里到處鳴響着金錢的聲音，奧地利的傳記作家史推芳·茨威格有過一段生動的敘述，他說，巴爾扎克“描寫的不只是巨大財產的增長和倒塌，交易所里猖狂的投機，不只是那些巨大的戰爭，這里邊要支付同樣多的精力像在萊比錫和滑鐵盧的戰場上一樣，不只是被吝嗇、憎恨、浪費、野心所趨使的二十個抓錢手的典型，不只是那些為了錢的原故而愛錢和那些為了象征的原故而愛錢的人們，還有把錢當作達到他們的目的的手段的人們，而且巴爾扎克是第一個最大膽的作家用成千的例子指出來，金錢本身是怎樣滲透了最高貴的、最纖細的、非物質的情感。……巴爾扎克和他們走在一起。他給浪費者計算他們的支出，給高利貸者計算他們的利率，給商人計算他們的獲利，給花花公子們計算他們的負債，給政客們計算他們的賄賂。……”<sup>②</sup> 在這樣的史詩里，誠如恩格斯所說，“給予了我們一部法國‘社會’的極堪驚異的現實主義的歷史”<sup>③</sup>。在這樣的社會里，我們可以想像，人道主義的理想註定是不可能實現了。事實上十九世紀三十年代以後的資產階級的思想家和作家們也很少從正面談論人道主義了。人道主義這個名詞從此在資本主義社會里變得十分可憐，蒼白無力，它已經失卻了它那以人為本的豐富內容，也放棄了那名義上是嚮往“古代”而實際上是對於將來的遠大理想，只不過是成為假仁假義的牧師們和偽善者庸俗的說教，成為帝國主義者和壟斷資本家們的點綴品，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以後，成為一些御用奴才在他們主子的指使下嚮着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狂吠中的一句口頭禪。蘇聯放射出來第二個人造衛星，衛星里裝着一條狗作試驗，為了這個原故，華盛頓竟有人向蘇聯駐美大使館遞抗議書，倫敦竟有人號召為這條狗靜默誌哀，這足以說明資產階級社會中假仁假義的虛偽道德墮落到什麼程度。

當資產階級放棄了人道主義的理想，人道主義這個名詞成為一切兇神和偽善者用以遮蓋他們猙獰面貌的假面具時，根本消滅剝削制度、消滅私有財產權的共產主義的偉大理想在無產階級中建立起來了。只有在共產主義社會中才能實現真正的人道主義。1901年，高爾基讓流浪漢沙金在一些窮困的人們聚集的夜店里說出這樣的話：“人——是偉大的！人有創造一切的力量……萬事——都在乎人，萬事都是為着人啊！只有人才是实实在在的，人以外的東西——都是他的雙手跟大腦創造出來的，人——呀！這名字好極了！這名字……真光榮！人——呀！應該尊重人！不要你去憐恤……不要你拿憐恤去傷了人的尊嚴……”<sup>④</sup> 這對於人的讚頌和前邊引過的哈姆雷特那段話是同樣有力、先後媲美的。但是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的話說完了以後，世界仍然長期地像“是一所監獄”；高爾基

① 引自“馬克思恩格斯文選”，第一卷，226頁。

② 史推芳·茨威格：“三個大作家”(Stefan Zweig, Drei Meister), 1929年萊比錫島嶼出版社版，48頁。

③ 馬恩列斯：“論文藝”，1951年人民文學出版社版，24頁。

④ 根據陸風譯文。高爾基“在底層”，1955年人民文學出版社版，125頁。

沙金的話說完了以後，僅僅十六年，就爆發了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世界上出現了有史以來的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1928年高爾基關於“在底層”這個劇本回答庫爾斯克紅軍的戰士們：“同志們！你們向我提問：‘劇本在底層里為什麼沒有發動起義的信號？’這種信號可以在沙金的講話里，在沙金對人的評價里聽到。……我當時曾經想，現在還是想使全體人民都成為創造性勞動的英雄、新的自由生活制度的建設者。我們應該使每一個個性不同的人，能覺悟到自己和別的任何人都同樣有價值的人。只有把促使人間相互敵視、並造成一切災難和罪惡的根源——私有財產制度完全消滅時，才能達到這點。換句話說，只有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才能達到這點。”<sup>①</sup>如今這一點，已經在擁有近十億人口的巨大的社會主義世界裡由於共產黨和工人黨的領導、由於無產階級專政而達到了。資本主義上升時期一些進步的思想家和詩人的夢想如今在被工人階級領導的一片廣大的區域裡實現了。

右派分子由於他們與社會主義為敵的反動的階級本質，無視於這個真理和鐵一般的事實，提出一個空洞的“人道主義”名詞要堵塞通向真正的人道主義的道路——黨的領導和無產階級專政——以達到資產階級復辟的願望。例如張明權的所謂哲理詩“更相信人吧！”<sup>②</sup>、李又然“人有最高的價值”的“歌頌”<sup>③</sup>、錢谷融用人道主義“原則”來代替人民性、愛國主義、現實主義等等評價標準的“理論”<sup>④</sup>，都是擺出一付“大慈大悲”的面孔，用一個超階級、超現實的抽象的“人”來反對黨的領導，反對社會主義制度。他們堆積了一大批自以為很美麗、而實際上腐朽不堪的浮辭濫調，什麼“良心”呀、“平凡的靈魂”呀、“真善美”呀、“良知良能”呀；什麼“最高的價值”呀、“人多么高貴、多么美、多么善良”呀，“發現更多有價值的人”呀；什麼“尊重人”呀、“同情人”呀、“把人當作人”呀——其目的無非是給人一種假象，好像我們的社會既不能領會人的“最高的價值”，也不懂得“尊重人”、“把人當作人”似的。事實上，在我們社會主義國家，廣大的勞動人民從剝削制度的枷鎖裡解放出來，享用著有史以來不曾有過的公民權利，這是眾所周知的。他們更惡毒的是常常直接或間接引用高爾基關於人的價值名句。高爾基是世界文學史中第一個最傑出的偉大的無產階級作家，他通過沙金的口說出人的光榮和尊嚴，是在沙皇殘酷的黑暗統治時代，他在“在底層”這個劇本裡發出“對於害人的、使千百萬人變成殘廢癡狂和死亡的整個資產階級社會，發出了強烈、憤怒的控訴”<sup>⑤</sup>。1930年前後，當西方的一部分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打着“人道主義”的幌子向蘇聯進行誣蔑時，高爾基寫過非常有力的文字揭破他們的“人道主義”的虛偽的本質，像“給人道主義者”、“答復知識分子”這些名文，在中國不是沒有翻譯的，都收在“瞿秋白文集”第四冊裡，這些右派先生們就置若罔聞，不加理睬了。他們的用心何在，不是很顯然嗎？

人道主義在歐洲資本主義上升時期起過什麼作用，自從十九世紀資產階級的本來面貌徹底暴露以來又變得怎樣蒼白無力，它過去的遠大理想只有在社會主義社會裡才能實

① “在底層”，191頁。

② “北京文藝”，1957年5月號。

③ 見公木“在虛偽的後面”，“文藝報”，1957年第24期。

④ 錢谷融：“論‘文學是人學’”，見“文藝月報”，1957年5月號。

⑤ “在底層”，148頁。

現，這些關係，我們必須具體地分析清楚，才不至被一個抽象的“人道主義”名詞所迷惑。

至於資產階級文學里的個人主義，它和人道主義可以說是一對孿生兄弟。從文藝復興時代起始，資產階級的作家和詩人們就經常給個人主義唱着頌歌。資本主義在它的初期，形成了經濟發展的新法則，資產者為了爭取勝利，強調依靠自己的力量和智巧、個人的企業精神和毅力；當然，他們中間個別的人的勝利也意味着千千萬萬人的破產。在肯定財產私有制的前提下，通過自由競爭不斷地擴充資本，是個人主義人生觀的物質基礎。當時的人道主義者主張尊重個人的人格和尊嚴，借以摧毀中世紀否定個人價值的封建道德和教會統治，同時對於資產階級自身內種種無止境的追求利潤、厚顏無恥的現象也進行了反抗，所以在精神方面給個人主義以鼓舞。在資本主義社會里，個人和社會幾乎永久是處於對立的地位，個人在努力奮鬥中，不管是勝利了或是失敗了，都容易引起人們的興趣，因此怎樣處理個人和社會的關係，永久是資產階級文學里的一個主要問題。而且一般看來，個人對社會的反抗，往往總是代表進步的方面，而不合理的社會是經常在阻礙着各種進步力量的發展。其中雖然也有人倡導個人與集體的結合，像前邊提到的歌德那樣，但究竟不過是一個對於將來的想望，在現實生活里是難以實現的。可是在社會主義社會里，個人主義卻成為一個可恥的名詞。因為社會主義制度和資本主義制度正相反，它是為絕大多數的人民謀利益的，個人和社會的關係是基本上得到了解決——這並不是說二者中間已經沒有矛盾。誰若是強調個人的意志，不顧集體的利害，這就等於與絕大多數的人民為敵，是不會獲得人們的同情的。我們閱讀西方資產階級文學作品，若是受到了其中歌頌個人主義的地方的“感動”，甚至接受了它的指導，就會犯看錯了時代的錯誤，給我們的社會主義帶來危害。關於這一點，我想通過個人主義在資產階級文學里各種各樣的反映加以解釋。

個人主義首先體現在孤軍奮鬥和個人反抗上。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的“導言”里說過，文藝復興是一個需要而且產生了巨人的時代。這些“巨人”大都是多才多藝，學識淵博；儘管他們的才藝學識是無數過去的和同時代的勞動人民奮鬥的成果，但他們是以孤軍作戰的姿態出現的。像米凱基羅的藝術、伽利略對於太陽中心說的宣傳、布魯諾對於唯物主義思想的堅持，都顯示出個人的英勇，樹立了個人堅苦奮鬥的榜樣。在十八世紀末期十九世紀初期，法蘭西資產階級革命前後，歷史上許多的叛逆者都被革命的浪漫主義者所歌頌。希臘神話里的普羅米修斯成為他們最喜愛的形象，有反抗，也有受難，具有豐富的代表意義，青年歌德、拜倫、雪萊都採用這個傳說寫過不朽的詩歌或詩劇。這種孤軍奮鬥、個人反抗的精神在當時是有積極意義的，它一方面摧毀腐朽的封建殘余，一方面對於庸俗的資產階級社會給以無情的攻擊。它鼓舞着人們不要向腐朽的、庸俗的社會屈服，要對它反抗。直到二十世紀初期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羅曼·羅蘭還通過他的英雄傳記和小說“約翰·克利斯朵夫”進行堅苦的个人奮鬥的說教。

這種個人奮鬥和反抗的精神在那些作家和詩人的筆下也的確寫得神采煥發，光芒四射，但是我們現在讀起來，會感到這是屬於過去的時代。因為偉大的十月革命开辟了人類歷史的新紀元，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是亘古未有的大轉變。我們消滅剝削制度，把社會組織得一天比一天更為合理，給每個勞動人民都創造了好的條件，不是阻礙而是處處幫助個人的發展。我們的集體，只有在每個人都充分發揮他的作用時才能以完美鞏固；



個人也只有集體中才能更好地發揮他的作用。個人和集體的關係，若處在正確的地位上，則雙方都得到發展，若發生矛盾，不得解決，則彼此都受到損失。由於這個原故，蘇聯在四十年內各個戰綫上才有了這樣驚人的成就；也只有這個原故，新中國自從成立以來勞動人民里才涌現出這麼多新的人物。這是一種過去不曾有過的、個人與社會的新的關係，假如有人不認識這種根本的轉變，還以普羅米修斯自命，對我們欣欣向榮、面前有無限遠景的社會進行反抗，那麼他必定是或者將會是反動分子、社會主義的敵人。在過去，胡風宣傳“自我擴張”、“主觀戰鬥精神”，今年初春，流沙河在“草木篇”里讚頌那“縱使死了吧，她的腰也不肯向誰彎一彎！”的“白楊”<sup>①</sup>，都是竊用這過了時的個人反抗的幌子來進行他們反動的宣傳的。——沒有接觸到工人運動和無產階級革命的羅曼·羅蘭在第一次大戰前寫出他強調個人英雄主義的“約翰·克利斯朵夫”，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以後，他經過一個較長時期的內心鬥爭，最後從巴黎轉向莫斯科，就是另一種態度了，他在一篇“我走向革命的道路”的短文里說：“在我所寫的一批長篇小說‘欣悅的靈魂’的最後幾卷當中，我企圖反映出內心鬥爭的演變——從狹隘的個人主義一直發展到無產階級革命。”<sup>②</sup>

其次，個人的孤立無援和人的脆弱無力是個人主義另一方面的表現。如前所述，在資產階級上升時期，它的思想家和詩人對於人類的將來抱有遠大的理想，對於面前不合理社會表示英勇的反抗，但等到資產階級掌握了政權，商務帳房里的辦事人員成為它的真正統帥，現實社會的發展和一切美好的理想更為背道而馳時，個人在其中感到的往往是孤獨寂寞、脆弱無力。所以悲觀主義的哲學、“世界苦”的詩歌、揭發缺陷而看不出人類前途的批判的現實主義的小說主管着十九世紀中葉以後的歐洲的文化界。像莫泊桑和契訶夫一部分的小說，常常使讀者心情沉重，覺得生活是這樣不合理，而又不知如何改造。在俄羅斯文學里所謂的“多餘的人”，從普希金“奧尼金”和萊芒托夫“當代英雄”里的主人公一直到屠格涅夫筆下的羅亭，都是與庸俗的社會落落寡合，自己又沒有出路，歸終演成無可奈何的悲劇。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的“地下室手記”里說得更為沉痛：“十九世紀的人，應該是，並且在道德上必須多半是一個意志薄弱的人；而性格剛強的人、活動家，則多半是淺薄的人。”<sup>③</sup>——這足以說明，十九世紀資產階級全面勝利後的社會是多麼不正常、是多麼變態，資產階級文學里的主人公也就從英勇的普羅米修斯轉變為一些畸零的意志薄弱的人物了。

在中國，從前舊社會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對於那些“多餘的人”是很容易寄予同情、發生共鳴的，因為他們同樣是對社會感到不滿，同樣是看不出自己的出路。但是我們現在的社會與過去不同了，我們現在讀着那些作品，只有感謝它們的作者給我們描畫出過去的苦難的圖像，使我們更深刻地認識資本主義社會是怎樣黑暗，怎樣戕殺人的正常發展，因而更熱愛我們的美好的今天。我們的今天在工人階級政黨的領導下，社會里的一切安排都為廣大人民的利益着想，哪里還會有莫泊桑、契訶夫所寫的那些小人物的悲哀、平凡的悲劇，以及一些畸形怪狀的現象呢？人人面前都有許多事情要做，而且總是做不完，誰還

① “星星”詩歌月刊，1957年1月創刊號。

② 根據戈寶權譯文。見“譯文”，1955年1月號。

③ 轉錄自叶爾米洛夫“陀思妥耶夫斯基論”，滿濤譯，1957年新文藝出版社版。

會覺得自己是“多余的人”呢？過去被壓迫、被剝削的工人農民，如今翻了身，當家作主，其中有不少人發揮出從勞動中積累起來的智慧，充滿信心地從事建設，誰還會感到脆弱無力呢？但是在我們社會主義大革命時期，文藝界里有些不肯放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人感到孤獨寂寞了，這反映在近一年來個別的小說和詩歌里。其中還有人自以為很巧妙地在“詠史”的外衣下來發洩他難以告人的沒落情緒，例如公劉的“懷古”二首<sup>①</sup>，艾青的“景山古槐”<sup>②</sup>，這些詩不能說明旁的，只表明了作者內心里的空虛和對於社會主義的抵觸。

第三，個人主義在文學里的又一種表現是鼓勵欺詐，玩世不恭。在舊社會里有一部分人看到統治階級的自私、愚蠢和詭詐，既感到沒有能力向它反抗，也不甘心向它屈服，卻用一種开玩笑或欺騙的態度向它挑戰，以達到個人在精神上或物質上的滿足。這類人往往認為世界上的一切不過如此，爾虞我詐，那些高高在上和春風得意的人們都是虛偽的、冷酷無情的，於是他們也用狡詐的手段給他們挖掘陷阱。這類人的目光是狹窄的，只看到他們的周圍，看不見人類的將來。但是在向虛偽的統治階級挑戰和揭開封建社會的假面具上邊，他們是有進步意義的，例如十六世紀西班牙第一部的流氓小說“小癩子”(Lazarillo)，德國的“厄倫史皮格爾”(Eulenspiegel)傳說，都是寫窮苦無告的人怎樣通過他們的狡獪戰勝了一些居于統治地位的公侯、地主、教士們，並且顯示出這些小人物是如何聰明智慧，而那些社會上有地位的人們又是如何愚蠢。到了偉大的作家和詩人的筆下，就產生了像莎士比亞劇本里的福斯塔夫、歌德“浮士德”里的靡非斯托非雷斯、巴爾扎克“高老头”里的伏脫冷那樣的複雜人物，他們都自以為看破世情，給社會以無情的揭發，而自己則玩世不恭，為非作歹。在他們揭發世情時，也的確說出一些真理，大快人心，在他們為非作歹時，則與他們所看不起的高高在上的人們沒有兩樣。這種人物的言行有時使人感到痛快淋漓，有時使人感到可厭可憎。我們應該採取分析批判的態度來研究這類人物之所以產生，進而認識他們當時社會的本質。但是如果有人向他們“學習”，養成一種市儈氣的玩世不恭的態度來對待我們社會主義的社會，像吳祖光“二流堂”里的伙伴們那樣，這是不能容忍的。我們的社會里廣大的勞動人民在大公無私的共產黨的領導下從事嚴肅的工作，忠誠老實是我們的道德，欺詐和假面具騙不了任何人，那種人物的積極意義已經不存在了。至於他們的消極方面，早就應該跟着舊社會一起消逝。——附帶聲明，這裡並不是否定諷刺文學，因為我們還有國內國外的敵人、舊思想的殘余和不良的工作作風，我們還要向這些進行鬥爭，在鬥爭中諷刺文學是有力的武器中的一種。

最後，談一談歐洲資產階級文學里所謂的“永恒的主題”問題。歐洲資產階級文藝批評家常說，文學史里從古到今貫串着一些“永恒的”主題，不管人類歷史怎樣演變，這些主題是不變的，例如“愛情”和“死亡”。誠然，圍繞着這類的主題在過去的文學里產生過不少的名著，一個人或一類人的愛和死也引起過讀者的同情和關懷。“少年維特之煩惱”在歐洲十八世紀七十年代曾經轟動一時，熱情奔放的嘉爾曼無論是在梅里美的小說里或是在彼塞(Bizet)的歌劇里都曾經使許多青年陶醉。如果抽掉這些主題，資產階級文學會失去很寶貴的一部分。但是在我們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中，大家有了更崇高的共同的問題，個人的遭遇或者是僅僅代表少數人的命運事件，是不會引起人們的普遍注意

① 見“新觀察”1956年第22期。

② 艾青：“海岬上”，1957年作家出版社版，29頁。

的。當然這並不是說維特和嘉爾曼在歷史上沒有積極的典型意義，也不是說我們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里從此不再談到愛情和死亡，這只是說，時代變了，對於這些主題的看法也變了，像卓婭的死、劉胡蘭的死、黃繼光的死，能感動千千萬萬的人，但是假如有一個人為失戀而死，是沒有人寄予同情的。我們再也不會像資產階級文學里那樣把愛情絕對化、把死亡神秘化了。高爾基在“和青年作家談話”里說得好：“在無階級的社會主義社會產生的條件下，文學的‘永恆的’題材，一部分正在消逝，另一部分正在改變他們原來的意義。不管個人的社會價值多高，我們的時代提供的題材，比個人的死亡具有更無可比擬的重要性和悲劇性。這事實不會使個人主義者獲得安慰，然而歷史判決了個人主義的死刑。”<sup>①</sup>

這裡提到的四點，不能包括個人主義在資產階級藝術作品中各種各樣的反映，但是這四點在過去的以及現在的知識分子中發生的影響是相當普遍的。今年反右派鬥爭，從一部分青年學生里暴露出的問題來看，和這些影響有着千絲萬縷的關連，我們不能不予以重視。至於自從十九世紀末期以來，隨着資本主義走進帝國主義階段，個人主義發展為成為法西斯主義哲學基礎的尼采的超人主義以及其他一切損人利己、頹廢變態的學說，則沒有絲毫的進步意義，只是徹頭徹尾的反動了。由於它們的毒害性是顯然的，不容易起迷惑作用，所以過去的胡風反革命集團也罷，現在的右派分子也罷，儘管在思想和它們有許多相同的地方，但是為了隱蔽他們陰險的目的，他們是不肯明目張膽地從它們那裡搬運貨色的。總之，我們對待資產階級文學里的一些問題，應該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方法來分析，更重要的是要站在無產階級立場上，意識到自己是社會主義的人，我們和過去資產階級的作家們是處在兩個截然不同的社會里。只有這樣，才能較為正確地進行分析批判，也只有這樣，才能更好地承受過去的文學遺產，來豐富我們社會主義的文化。

1957年12月22日。

<sup>①</sup> “論寫作”，第6頁。

## 学术消息

### 何其芳同志批駁右派分子在党領導文艺問題方面的謬論

北京大学中文系全体同学以及部分俄語、西語、东語系同学,在1957年11月8日,听取了何其芳同志以“就党領導文艺問題駁右派”为題的报告。何其芳同志严厉批駁了文艺界右派分子吳祖光、馮雪峯、陈涌、刘紹棠、姚雪垠等人反党文艺思想和修正主义理論。

首先,何其芳同志指出文艺界右派分子的共同論調和公式。那就是:現在的文艺狀況糟得很,而原因就在于党的領導。这共同的實質就是要取消党对文艺的領導,按照資產阶级的方向發展文艺。他們的基本論調一致,只有个别环节不同。基本上有兩类:一是以吳祖光为代表的、直接、公开否定党的領導的論調,公开宣揚現在的文艺不如北洋軍閥、蔣介石时代,这是因为有了党的組織力量,就必然与以“个人才能”为特点的艺术相矛盾,因而,根本办法必須取消党对文艺的領導。另一类是馮雪峯、陈涌、刘紹棠等間接地、比較曲折地反对党的領導的論調,他們宣揚党对文艺的領導思想是教条主义,因而只有改变党的文艺思想及理論,文艺才能發展。例如,刘紹棠認為教条主义的根源在于:一、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談会上的講話中的所謂“策略性的綱領”;二、苏联的文艺理論;而教条主义的内容就是:強調政治性、正面人物等;其次,又否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強調写新社会的“陰暗面”、“落后面”。馮雪峯、陈涌等等也是同一論調。

其次,何其芳同志严厉地批駁右派論調。第一,对于目前文艺狀況的估計。他說,我們并不否認文艺工作有缺点,但是和右派的根本区别在于:成績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而且是在前进中的缺点。在党的領導下的文艺,具有了新的特点和性質:一、文艺运动和工作的根本方向明确了;二、在新的文艺方向下产生了新的性質的文艺;三、文艺工作队伍扩大了,其中有不少工农兵的作家;四、文艺的普及,文艺与人民的結合,在很大的程度上實現了。当然,一般文艺作品的思想深度还落后于现实和人民的要求,但就整个水平說,目前比1942年以前大大地前进了。第二,文艺水平落后

于现实要求的根源,有历史条件的以及作家本人条件的兩方面因素。就历史条件言,新文学由五四以来,時間还不長,我們整个社会的文化水平还不高,这必須接受古典文学及外国文学的傳統,經一定時間才可能提高;就作家本人条件言,一般的水平也还不高。因此,絕不能說党的領導是文艺水平不高的根源。第三,右派所謂文艺与党的組織、領導矛盾的論調,是沒有事实根据,也無理論根据的。魯迅在党的影响下才走向正确的道路。曹雪芹等偉大作家是站在他那个时代的思想最高水平才有巨大的成就。党的組織与个人才能是不矛盾的,但必須統一于一个方向,那就是社会主义利益。第四,公式化、概念化的根源决不归咎于党的領導,它有多种多样的因素,或是教条主义地理解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或是作家本人的限制(生活經驗、思想水平等),也可能还有其他原因。公式化、概念化在任何时代的作家身上都可能产生,只有在社会主义时代才可能逐漸減少,那正是因为我們有正确的文艺政策和方向。党的文艺路綫是正确的,个别文艺干部可能有缺点,可能有教条主义,但作为党的文艺思想,絕不是教条主义。右派分子宣揚要反教条主义,其真实目的在于反对党的領導。

最后,何其芳同志批判了几个具体的右派論点:第一,关于现实主义,右派分子企圖以现实主义为幌子而宣揚写现实中的“落后”、“黑暗面”,根本立場、态度是反对社会主义。他們所說的“陰暗面”,实际上是他們戴上有色眼鏡看到的。他們的所謂现实主义,实际上就是要歪曲现实,并不是真正的现实主义。第二,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右派分子反对,实际是否定馬列主义世界觀的指导作用,反对思想改造,反对文艺用社会主义精神教育人民的作用。第三,关于艺术的特性問題,右派分子有意把艺术神秘化,其实他們并不理解艺术,目的是在否定艺术的思想性、政治作用。

何其芳同志在报告結束的时候,还強調必須彻底消除資產阶级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在文艺中的影响,使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經之)

# 基督教与西方文化

## 一种重新估价的尝试

朱光潜

宗教是一种反映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在落后的社会里，它是意识形态中的最重要的一种，带有极顽强的保守性，其它意识形态往往以宗教为中心。基督教就是如此。就时间而论，基督教从罗马帝国时代奴隶社会起，经过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一直统治了西方将近二千年，其中约莫有一千年——从四世纪到十四世纪——它是欧洲的最高的统治力量。就空间而论，基督教起源于巴勒斯坦，由中东传到近东，蔓延到罗马帝国的全部领土，征服了所谓“野蛮”部族，很早就传到非洲北部。它的东教会一个支派——景教——在唐初就传到中国。在近代，随着帝国主义的殖民侵略的发展，它流传到美洲、澳洲、印度，以至渗透了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从来还没有另一种宗教拥有过像基督教的那样大的势力。就范围而论，基督教在欧洲长期佔住统治的地位，与政治接成紧密的联系，文化教育，文学艺术，哲学思想等等没有哪一个生活领域没有受到基督教的深刻影响。我们可以说，不了解基督教，就不能彻底了解西方文化的整体或是其中任何一个部门。

承认基督教影响的悠久，广大与深刻，并不是说这个影响一定就是好的。过去资产阶级历史学者大半是基督教徒，在估价基督教对于西方文化的作用方面，往往把西方文化上的许多成就都归功于基督教，彷彿以为没有基督教，就没有西方近代文化，而西方人之所以是“文明”人，就因为他们都是基督教徒。这种歪曲历史的见解之所以逐渐形成，是与帝国主义殖民政策分不开的。我们在这里想替基督教的功过算一笔总账，对西方文化求得一种较正确的理解。由于作者能力的薄弱与篇幅的限制，所谈到的方面只能是很粗略的，有些地方也难免是错误的。

### 一 基督教的起源与发展

基督教是怎样起来的呢？总的来说，它是犹太旧教的继承和革命，是奴隶和其他被压迫的人民对罗马帝国残酷统治的反抗，而在它的形成中，它吸收了中东埃及各部族的宗教信仰，以及希腊哲学思想（特别是斯多噶派和新柏拉图派）的影响。

要了解基督教，先要了解它所继承和改革的犹太教。这不仅是因为基督教把犹太教所信奉的“旧约”作为它的“圣经”的一部分，尤其是因为不了解犹太教的基础，就无从了解基督教对于犹太教在哪方面是继承，在哪方面是改革。犹太民族在古代叫做希伯来民族，有很悠久的历史。在希腊民族佔住了希腊半岛之前，希伯来民族就早已佔据了巴勒斯坦一带地方。巴勒斯坦西临地中海，东邻阿拉伯沙漠，是个狭长形地带，从古到今，这地方都很贫瘠，生产一向落后。但是它北邻腓尼基（古代一个极活跃的通商国家），南邻埃及（北非

一个古老的强大的帝国),是近中东一带与埃及陆路交通的咽喉要道,是周围一些国家必争之地。希伯来民族在古代长期处在大国的夹缝里,西边是希腊罗马,南边是埃及,东北一带经过一系列的帝国起伏,亚述,叙利亚,巴比伦,波斯,阿拉伯等。因此,希伯来民族不断地遭受外族的侵略和压迫。在公元前八世纪,他们被亚述帝国征服了,国内大部分人口被迫迁移到巴比伦,在那里住了五六十年,等到波斯帝国灭了亚述,波斯大帝达留斯才让他们回到巴勒斯坦。接着他们陆续受到波斯,希腊,埃及,叙利亚和罗马帝国的统治和奴役。外部是如此,就是在巴勒斯坦内部,希伯来民族也不断地和原来土著部族(迦南族)和其他外来佔住的部族(腓力斯丁族)进行着剧烈的斗争。在这长期内外夹攻的局势之中,希伯来民族不断地挫败,也不断地恢复势力,因而养成了一种强烈的狭隘的民族主义。这就体现在犹太教义上。犹太教有这几个基本要点:一,耶何华是世界唯一的上帝(犹太教是一个最早的一神教);二,希伯来民族是上帝特别宠爱的骄子(Chosen People),巴勒斯坦是上帝赐给他们的土地(Promised Land);三,通过犹太民族的祖先如阿伯拉罕,摩西等人,上帝和希伯来民族定过约(Testament),希伯来民族要永远效忠上帝,上帝也就永远保佑他们,将来还会派遣一位救世主(Messiah即希腊文的Christ),使他们统治全世界的一切民族。“旧约”大部分是希伯来民族的历史,其中贯穿着一个主要的思想:每逢希伯来民族效忠上帝时,他们就强盛;每逢他们背叛上帝时,他们就遭殃;但是他们对于他们的未来却充满着信心。犹太教的首都在耶路撒冷,在那里有一个大寺院。教权当然掌握在僧侣手里,由一些高级僧侣组成一种行使教权的机关(Sanhedrin)。像后来的基督教僧侣一样,犹太教僧侣逐渐世俗化,把他们宗教的基本精神丢开,在一些私人利益和教条仪式的繁文缛节上勾心斗角,因此他们不能满足群众的要求,失去群众的基础。大略说来,这就是犹太旧教在耶稣降生前一个时期的基本情况。当时犹太教需要改革。

在耶稣降生时代,希伯来民族是在罗马帝国统治之下的。当时罗马奥古斯都·凯撒执政,正当由共和国转入帝国的时期。它的疆域已包括地中海沿岸的地方,西抵大西洋,北抵莱茵河和多瑙河南岸,南抵埃及,东抵腓尼基和巴勒斯坦。它把征服的疆土划分为省,每省派一个行政长官或总督统治。当时巴勒斯坦就是罗马的一省,罗马委派了一个犹太民族的“汉奸”黑罗德(Herod)为总督。罗马帝国因为疆域广大,须维持大量的军队和漫长的交通线,加以不断的内战和外战,须耗费大量军费。此外,罗马公民(限制很大)拥有种种特权,例如有一个时期他们购粮,只须出市价的一半。他们一般都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这些费用都是由各省被征服的人民中压榨来的。各省税收大半由征收官吏承包,他们缴纳一定的款额给罗马,就买得在地方收税的权利,可以在所管区域肆无忌惮地勒索。当时罗马公民所进行的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生产大半靠贩卖来的或是捉来的奴隶。他们对奴隶的待遇一般是残酷的。有些奴隶被迫做角斗的把戏,这种角斗是要到有一方流血送命为止。罗马公民就喜欢从这种残酷的玩艺里寻开心。不难想像,当时在罗马帝国统治下的人民所过的生活是极端痛苦的。巴勒斯坦是个穷地方,所受的压迫当然更加残酷。

要说明罗马帝国的残酷与人民的痛苦,可以举一件与耶稣有关的事为例。巴勒斯坦总督黑罗德有一天举行宴会,他的妻子的前夫的女儿莎乐美(Salome)在宴会中跳舞,大得黑罗德的欢心,他允许莎乐美要什么就可以得到什么。当时希伯来民族中有一位约翰到处宣传天国快要到来,号召人懺悔罪过,在约旦河里受洗一次,作为洗心换面的表示。这

位約翰被羅馬政權逮捕下獄了。現在莎乐美說就要這位約翰的头。黑罗德馬上叫人把約翰杀死,把他的鮮血淋漓的头盛在一个盤子里送到宴会上来,獻給莎乐美。原来莎乐美的母女都是淫蕩的妇人,她們是仇恨約翰劝人悔罪那一套說法的。从这件事就可想見当时社会黑暗的一斑。

耶穌就是受过約翰洗礼的。他受洗之后不久,就听到約翰惨遭非刑杀害的消息,从此就下定决心,要献身于宗教事業,宣傳天国的教义。耶穌是从穷苦階級出身的。他家住巴勒斯坦北部加利利湖边的叫做拿撒勒的一个村落。父亲是个木匠,他从小也就跟父亲学木匠的行業。他跑到約旦河边去受約翰的洗礼时还是一个年輕人(大約二十七岁)<sup>①</sup>他開始傳教的地方就是他的家乡加利利湖边。他的傳教的对象都是些穷苦的人民,例如最大的門徒彼得就是一个漁夫。凡是在社会上被压迫被鄙視的人特別受到他的照顧,他的听众中有許多犯罪的人,害病的人,稅吏乃至妓女。后来他要清洗犹太旧教,帶些門徒到了耶露撒冷,把犹太大教寺里一些作买卖的人,兌換銀錢的人一齐赶走,在那里傳起教来。这当然受到犹太教僧侶的仇視,他們买通了他的門徒之一叫做犹大的帶人把他逮捕起来,交給当地的羅馬总督彼拉多审問,釘上十字架处死了,死时大約才三十岁左右。所以他总共只傳了三年教。

說耶穌有我們近代人所理解的革命觀念,未必符合事实,但是他看到犹太教的墮落和羅馬政权的荒淫殘暴,社会道德風紀敗坏,民不聊生,心里感到極大的痛苦与憐憫,想設法把这个局面变过来,这却是事实。他的基本教义是很簡單的。他接受了犹太教的一神教的觀念,而特別着重約翰授洗者所宣傳即將到来的“天国”。犹太教的上帝是偏爱希伯来民族的,耶穌的上帝却是一視同仁的,人不分种族和社会地位,在“天国”里,在上帝的面前,都是一律平等的。这个教义是新的,極端重要的,因为它把一个狹隘的民族主义的犹太教变成一个世界性的不分种族的宗教,尤其重要的是这种平等思想針對着奴隶制度和羅馬帝国的統治,耶穌可以說是在羅馬帝国里打了一針敗血剂。他似乎清楚地見到当时人民要脫离苦海,不只是希伯来一个民族的問題,而是当时世界範圍的問題,所以过去的犹太教已不能应付当时的局面,而平等这个理想不仅代表希伯来民族的希望,也代表着羅馬帝国一切被压迫被奴役的人民的希望。基督教所以能在羅馬帝国里得到迅速而广泛的發展,就因为他的平等教义在当时广大人民心理中有深广的基础。

如何實現这种天国呢?在这里耶穌把問題看得太簡單了。他說,“天国就在你自己的心里”,只要人懺悔罪过,把心改过来了,天国也就到来了。像許多过去的哲学家和宗教領袖一样,耶穌想把社会的基础建筑在善良人的善良願望上,不从社会制度根本上着眼。这当然是極端唯心的,反映着耶穌思想的落后的一方面。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耶穌用的是攻心战术,要从思想上瓦解当时的犹太教和羅馬政權,在当时条件下也不能說是一个完全無效的办法。因为羅馬政權还正当鼎盛时代,耶穌以一个穷苦的木匠,手無寸鉄,而当时民众的力量也还很难組織起来进行有效的武裝斗争。在耶穌降生前七十年左右,斯巴克特塔斯(Spartacus)就曾經領導过一次奴隶起义,其中大半是受羅馬帝国奴役的外族人,包括犹太人在內,尽管声势很浩大,却終于被羅馬政權鎮压下去了。这說明了当时反抗情

<sup>①</sup> 关于耶穌的年齡,甚至他有無其人,史学家中有很多的爭論。

緒的普遍,也說明了反抗條件的困難。耶穌不一定知道這次奴隸起義的經過,但是造成他宣傳平等教義的原因却是和奴隸起義的原因是一致的,所不同的他所採取的反抗方式是宗教宣傳<sup>①</sup>。

在哪些方面耶穌的宗教宣傳帶有革命的性質呢?我們不妨檢查一下他對於當時羅馬帝國一些制度的看法。我們上文已經指出,他的人類平等的教義就否定了奴隸制度。羅馬時代的奴隸制度還是以家庭為中心,家庭還是社會的基層單位,耶穌對家庭制度是反對的。“馬可福音”記載他有一次向門徒傳教的情形:

“當下耶穌的母親和弟兄來站在外面,打發人去叫他。有許多人在耶穌周圍坐着。他們就告訴他說,‘你母親和你弟兄在外邊找你。’耶穌回答說,‘誰是我的母親?誰是我的弟兄?’四面觀看那周圍坐着的人說,‘看哪,我的母親,我的弟兄!凡是遵行上帝意旨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親了。’”

在另一個場合,他還告訴他的門徒凡是跟隨他到天國的人不但要撇下房屋,還要撇下“弟兄,姐妹,父母,兒女,田地。”他的理想是人人都是上帝的兒女,在天國里人人都是弟兄姐妹,天國就是一個大家庭,這大家庭中不應再分什麼小家庭,小家庭可以成為進天國大家庭的累贅。

在有階級的社会里,財產私有制是一個基礎,一切經濟生活都以此為中心。耶穌是反對財產私有制的,我們從馬可第十章舉一個例子,看看耶穌對於私有財產的看法:

“耶穌出來行路的時候,有一個人跑來跪在他面前問他說,‘良善的夫子,我當作什麼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穌對他說‘……誡命你是曉得的,不可殺人,不可姦淫,不可偷盜,不可作假見證,不可虧負人,當孝敬父母。’他對耶穌說,‘夫子,這一切我從小都遵守了。’耶穌看着他,就愛他,對他說,你還缺少一件。去變賣你所有的,分給窮人’……他聽見這話,臉上就變了色,憂憂愁愁的走了,因為他的產業很多。”

耶穌對於當時政府機構以及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關係也覺得有徹底改變的必要,在馬可第十章里他對門徒說:

“外邦人有尊為君王的,治理他們,有大臣操權管束他們。只是在你們中間不是這樣,你們中間誰要為大,就必作你們的用人,在你們中間,誰願為首,就必作眾人的僕人。因為人子來,並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並且要捨命,作多人的贖價。”

我們必須承認:這種首領為人民服務的思想在奴隸社會里並不是平常的,耶穌所謂“外邦人”當然包括羅馬在內,他要把羅馬政權下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關係由壓迫者與被壓迫者的關係變成僕人與主人或服事者和被服事者的關係。他這種反對政權的說法宣揚開了,當然就會引起統治階級的注意,他們就派人“到耶穌那里,要就着他的話陷害他”,問他說“納稅給凱撒可以不可以?我們該不該納?”耶穌處在一個為難的境地,沒有正面回答他們,却首先揭穿他們的來意,然後用似乎承認凱撒而實在是否認凱撒的話回答他:

“耶穌知道他們的假意,就對他們說,‘你們為什麼試探我?拿一個銀錢來給我看。’他們就拿了來。耶穌說,‘這像和號是誰的?’他們說,‘是凱撒的,’耶穌說,‘凱撒的物當歸給凱撒,上帝的物當歸給上帝。’”(馬可十二章)

<sup>①</sup> 恩格斯在“關於原始基督教史”一文里也說“個別小部落或小城市對強大羅馬世界政權的反抗毫無希望”,當時受壓迫的人共同的出路“只能是一條宗教上的出路”。



这倒底是什么意思呢？应该归给凯撒的就只是印在钱币上的凯撒的名字和像，此外都不能归他。

耶稣既然又反对犹太教，又反对罗马政权，当然免不了迫害。于是在他三十岁左右传教刚三年之后，就被犹太教僧侣捉去送给罗马总督彼拉多，把他在十字架上钉死了。

像一切宗教一样，耶稣所宣传的教义之中当然有很多的落后的东西，不过这些落后的东西不能淹没他的平等博爱的基本教义在当时进步的革命的性質。基督教是由耶稣的门徒根据他们所理解的耶稣教义建立起来的。必须说明，耶稣教义在基督教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受到歪曲，首先是受到他的见识比较浅狭的门徒们的歪曲，其次是受到罗马政权与罗马教会的歪曲。我们如果把基督教会中所流行的一些教条和仪式和三个“对观”福音（马太、马可、路加）所记载的耶稣言行比较一下，就会见出这中间有很大的差别。耶稣的平等博爱的教义与反对私有财产的教义在基督教会中始终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而受到重视的是些什么呢？首先是耶稣神化了。据说他就是“旧约”所屡次预言的“救世主”，他就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固然这样自称过，但是他也说过他是“人的儿子”，而且尽人都是上帝的儿子），而站在“上帝的儿子”的地位，他是与上帝和圣灵（上帝显现给人看的灵魂）三身一体的，这个三身体（Trinity）说成了基督教的中心教义。据说人类从亚当夏娃偷食禁果时就已犯了“原始罪孽”，注定了要遭殃，上帝仁慈，才派了他的独子耶稣降生到人类中来，受流血的牺牲，来替全人类赎罪。耶稣本来竭力反对犹太教的仪式和僧侣制度，但是基督教却又回到繁琐的仪式和僧侣制度。有七种所谓“圣礼”（Sacrament），其中主要的是受洗和圣餐。受洗就是表示接受基督教，在出生不久就要举行。圣餐是教徒分食祭台上的面包，分饮祭台上的酒。据说这面包就是耶稣的肉，酒就是耶稣的血，吃过这面包，喝过这酒，就算分享了耶稣的血和肉，而变成具有耶稣生命的人。这些仪式由僧侣举行才有效，所以就形成了一套僧侣制度。此外，据说耶稣还有一天要回到人世来作最后审判，那时候就会见得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善报就是上天堂，恶报就是下地狱。天堂与地狱之外据说还有一种洗清罪孽的净界。耶稣既然是与上帝一体的，他自己既然反对家庭制度的，他的母亲当然就不重要，可是玛利也被尊为圣母，和上帝一样受崇拜。这些就是基督教会所尊奉的一些天经地义。后来在教会史上为着对于某一教条或仪式稍有不同的了解，就引起你死我活的斗争，造成一些派别的分裂（例如东西教会的分裂就从“圣灵从父亲出来”和“圣灵也从儿子出来”的争执起来的）；使许多人蒙上“异教徒”的罪名而被烧死。

必须指出，基督教会中所流行这些信条和仪式大半是在福音所记载的耶稣言行中找不到根据的，这就是说，它们大半都是后人附加上去的。它们的来源是复杂的，有些起源于中东埃及一带的宗教信仰，例如圣餐分享血肉的仪式近一点可以溯源到波斯的太阳神教，远一点可以溯源到图腾社会的分食图腾动物的仪式；有些起源于希腊的奥辅斯教，例如重灵轻肉的观念。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略而不谈，只消指出，基督教的真正奠基人是圣保罗<sup>①</sup>，基督教会中许多教条和仪式就是由他吸收外来影响而附加上去的。后来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以后，在几次教会会议中，在罗马皇帝主持之下，才把一些有利于罗马政权的教义明白规定下来。

<sup>①</sup> 这只是就基督教会发展来看，至于基督教义的真正来源，依鲍威尔的研究结果，是斐罗和辛尼加。参看恩格斯“论鲍威尔与原始基督教”。

由于保罗及其他門徒的傳播,基督教的發展一開始就很快。在第一世紀末,它就傳遍了巴力斯坦,叙利亞,小亞細亞,巴尔干半島和意大利,在第二世紀它就傳到埃及一帶以及西欧的高盧区域(羅馬帝國的一省,略当于法德兩國),到了第三世紀,它就傳播到羅馬帝國的全部疆域,連羅馬貴族中也漸漸開始有基督教的信徒了(例如君士但丁大帝的母亲)。基督教所以傳播得这样快,像恩格斯所說的,基督教是奴隶和穷苦人的宗教,当时这班人受羅馬帝國殘酷的压迫,生活非常痛苦,听說不久就有“救世主”来,未来世界会有美妙的生活,他們当然是欢迎的。这正如过去中国受压迫的老百姓希望有所謂“真明天子”来一样。

## 二 从羅馬教會的成立到宗教改革

早期基督教徒过着很穷困儉朴的生活,与当时驕奢荒淫的腐敗社会形成一种强烈的反称。他們提倡平等博爱,反对当时的統治压迫,特别是他們拒絕把羅馬皇帝当作神来崇拜(当时人民都要供羅馬皇帝的像,向他礼拜),这就使他們遭到了羅馬政权的仇視与迫害,公元六十年左右,羅馬遭过一次大火,羅馬皇帝尼罗(Nero)疑心是基督教徒放的,就杀了許多基督教徒,这可以說是迫害的开始。基督教的活动因此往往在地下进行。現在遊羅馬的人还可以看到当时基督教徒避难和秘密进行宗教活动的地下墓窖(Catacomb),那些墓窖就像現在的大矿坑,縱橫有几十里路長。里面还有受难者的墓和原始的教堂。迫害最殘酷的是在公元四世紀初达阿克利特皇帝(Diocletian)时代。凡是拒絕把皇帝当作神崇拜的人都一律处死。后来又下詔書通令全帝国毀坏一切教堂,焚燒一切基督教的經典,禁止一切基督教的集会。但是不到二十年之后,君士但丁大帝即位,就突然改变了政策,在公元325年他亲自領導了基督教在尼細亞(Nicea)召开的大会,明白規定了基督教的信条,承認了基督教在羅馬帝國的合法地位。此后不久,另一个羅馬皇帝又下令禁止基督教以外的一切宗教信仰。从此以后,基督教就成为羅馬帝國的国教了。

人們也許要問:羅馬政权对于基督教的政策何以有这样激烈的轉变呢?原因很簡單,当时基督教既已傳遍了羅馬帝國,拥有很大一部分羣众,羅馬政权就不能忽視这种力量。原先它企圖鎮压,但是經過二百多年的殘酷鎮压,基督教不但沒有消灭,而且还越来越强大。羅馬帝國本身自奥古斯都时代达到了强盛的高峰以后,北方各部族已開始南侵,它就日漸轉走下坡路,到了第四世紀,問題就逐漸多起来,羅馬政权漸有穷于应付之势,对基督教一味鎮压下去,只能引起更大的騷乱。所以君士但丁大帝放棄了鎮压,采取了利用的政策。基督教是很可以利用的。当时羅馬政权所感到的困难問題之一就是它所統治的各族是复杂的,思想信仰也是复杂的,要巩固政权,就須建立思想信仰的統一。現在基督教既已有那么广大的势力,就可以利用来使被統治的各族有一种思想信仰上的統一。<sup>①</sup>其次,一般宗教都是精神上的麻醉剂,麻痹人民的战斗意志,劝他們安分守己,是有利于統治階級的。基督教也不是例外,特别是它叫人看輕現世,把希望寄託在未来的天国,对于現世生活,它把謙卑退讓奉为崇高的美德,并且宣揚現世的痛苦是人类原始罪孽的懲罰,而不是統治階級的罪过,这样它就把人們馴养成为統治階級的忠順的奴僕。基督教的教义是不断地牽就統治階級利益而改变的。姑举基督教对于奴隶制的态度來說,耶穌本人提倡人人平等,“四海之內皆兄弟”,是反对奴隶制的,而且他的教义之所以起来,如上文所說

<sup>①</sup> 恩格斯在“費尔巴哈論”里也談到当时“須有一个世界宗教来应付世界帝国的需要”。

的,就是对奴隶制的反抗。可是到了罗马公民圣保罗手里,他便发出“奴隶们,服从你们的主子”的号召<sup>①</sup>。我们以后还可以看到,到了封建时代,基督教会变成封建制的支柱,它本身就是一个极大的封建主;到了资产阶级起来以后,它又成资产阶级的工具,宣扬私人所有制的神圣不可侵犯,宣扬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是文明人开化野蛮人和落后民族的德政。所以罗马政权由镇压基督教变到定基督教为唯一的合法的宗教,是丝毫不足为奇的。

从公元四世纪君士但丁大帝把基督教定为罗马帝国的合法的宗教以后,基督教便和欧洲政治结成的血肉的联系,此后欧洲史是和基督教发展史分不开的。这里不能详谈,只略谈一些较重大的事件,提醒大家的记忆。从公元三世纪中叶以后,北欧一些新兴部族(所谓“野蛮部族”)就已大举向欧洲进犯,他们的声势越来越大,陆续侵入德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和东欧一些区域。罗马帝国势已摇摇欲坠,为了统治和防御的方便,罗马帝国原已分成东西两部,到了395年,东西就完全分裂为二。西罗马帝国首都时而在罗马,时而迁其它城市,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在君士但丁。基督教会也就逐渐分成东西两个教会。东教会叫做“正教”,西教会叫做“天主教”(Catholic原义是“普遍”)。东教会的信徒大半是说希腊文的,西教会的信徒大半是说拉丁文的。特别同欧洲中世纪政局发生关系的是西教会。东西分裂以后,北欧各族南侵的势力更日加浩大,罗马曾经一再被攻佔,到了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便亡在条顿族的一个领袖奥多莎(Odoacer)的手里。此后西欧便转入几百年的“黑暗时代”,罗马教皇就由天主教的首领变成世俗政权的首领。此后几百年的天主教会的工作可以分为两大项,一项是巩固教皇的世俗政权,一项是劝化入侵的许多北方部族为基督教徒。欧洲的封建制度就是在罗马教皇统治时代逐渐形成的。这本是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变动<sup>②</sup>,但是在当时基督教会中却另有一种理论基础,那就是神权说(Divine Right)。按照这个说法,世俗政权都是上帝所授的权,教皇是上帝在人世间的代表人,所以一切政权都要由他授与。一个国王统治的土地是由教皇代理上帝授与他的,他底下的各等级的封建主也是由上一层递授与下一层的,一直到最下层的农奴。上文所说的北方入侵的各民族在罗马帝国的废墟上奠居了,每族霸佔一方,便形成了一种政权;同时他们又都逐渐信仰基督教了,所以在理论上都是罗马教皇的臣属,要受过教皇的“封”,才有合法的地位。这种“封”还有一套隆重的仪式,受封的人要跪在祭坛下,由教皇把摆在祭坛上的王冠取下来给他带上,从此他就成为上帝(最高的封建主)的封臣(Vassal)。著名的查理大帝就是在公元800年这样受教皇封过的。马克思在“教会的煽动”一文里曾把基督教会称作“封建贵族的孪生姊妹”。教会的等级就是按照封建等级制定的。“像公侯贵族之上有皇帝,高级和低级教士之上也有教皇”。“神职人员中的封建的高级职司组成贵族阶级,主教和总主教,修道院正副院长以及其他高级职司。这些教会显贵不是公侯,便是公侯管辖下的封建领主;他们佔有大量土地及众多农奴与奴僕。他们不仅像贵族和公侯同样毫无忌憚剝削他们的属下,而且他们的作法更加无耻”<sup>③</sup>。封建主收税,教会也收所谓什一税(Tithe);“像国税必须缴纳给皇帝,教会税也必须献给教皇”。封建主有军队,教会也有由修士和骑士组成的军队。总之,基督教会是中世纪欧洲封建制度中一

① 实际上基督教在罗马帝国里助长了奴隶制,参看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②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里有简要的分析。

③ 见恩格斯的“德国农民战争”。

个重要的組成部分。

查理大帝的受封是中世紀史的一件大事。第一，它象征着封建制度的正式奠定以及政治与宗教在中世紀的統一；其次，它是“神聖羅馬帝國”的开始，也就是近代国家的遙远的起源，近代法德等国就是从查理大帝的疆域中逐漸形成的；第三，“神聖羅馬帝國”的成立也標誌着世俗政权的重新抬头，此后六七百年的历史便成为教廷与世俗政权勾結和冲突的历史，最后，到了宗教改革时代，近代国家先后成立起来了，有些并且陸續强大起来了，世俗政权便战胜了教廷，促成基督教的逐漸沒落。

宗教改革对于欧洲史与基督教史都是一件大事。它標誌着封建貴族階級与新兴資產階級的激烈的階級斗争，和欧洲由封建社会过渡到資產階級社会的轉折点。一般历史家往往把宗教改革摆在文艺复兴之后，彷彿以为这个运动是馬丁路德和卡尔文等一两个人的成就。其实它是脫离中世紀黑暗时代进入近代的文艺复兴那个人类精神解放大运动中的一部分，早在十二三世紀就可以看出它的萌芽。这个大解放运动的原因最显而易见的是天主教会本身的腐敗，最深刻的是經濟基础与階級力量对比的逐漸变迁。

先說天主教会本身的腐敗。自从公元五世紀末西羅馬帝國灭亡以后，西方教会就天天忙于攫取政权和巩固政权，教皇的一切所作所为和一般專制皇帝完全一样，早已把耶穌的教义丢到腦后。耶穌本来提倡和平友爱，反对流血战争。但是中世紀几乎年年都有战争，处处都有战争，而这些战争有很大一部分都是教会發动的，例如七次的十字軍东征，鎮压異教徒的战争以及教廷与世俗政权的战争。由于这些連年不断的战争，許多生产因之停頓或破坏，到处鬧飢荒，許多人挺而走險，盜賊蜂起，整个社会成了弱肉强食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当然談不到公众衛生，所以瘟疫到处流行。在世界史上欧洲中世紀的瘟疫紀錄算是最高的，單是十四世紀中叶一次黑死病就死去了二千五百万人，佔当时欧洲人口三分之一左右。我們讀到关于当时瘟疫的記載，就可以想見人民大众生活痛苦到了如何严重的程度。但是教会标榜慈善，对此却漠不关心，这当然引起人民的痛恨。

其次，教廷生活是極端腐朽的。教廷在中世紀是極大的封建地主，在極盛时教会拥有欧洲全部土地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但是它对此还不滿足，还想尽一切方法橫征暴斂。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里曾这样描述过：

“为着榨取屬下的最后一文錢，为着增加教会的財產，殘酷的暴力以外，宗教的一切詭詐也被运用了，拷打的恐怖以外，革除教門和拒絕赦罪的一切恐怖，懺悔室的一切奸計也被运用了。文件伪造是这些显貴人物慣用的得意的敲詐手段。虽然一般封建賦稅和利息之外还另征什一稅，可是这一切收入还是不够用的，于是借助于制造灵異的聖像和聖物，借助于組織降福的祈禱站和赦罪符，以榨取人民更多的貢獻。”<sup>①</sup>

就是借这样压榨，教会，特别是教廷，就变成中世紀的最大的財主。既然有了錢，他們就过着驕奢淫逸的生活。有一位教皇說得很坦率，“上帝既然把教廷賜給我們，就讓我們来享受教廷吧。”教皇的宮殿是極其富丽堂皇的，他和大主教們的出巡仪式是金碧輝煌，前呼后拥的；教堂里一切宗教仪式也是摆闊綽，叫乡下人看得目瞪口呆的。天主教僧侶照例須持独身誠，但是教皇和大主教們养姘头是常事，不只一个教皇是私生子。姑举教皇中一个有名的坏蛋鮑尔基亞(Borgia)为例，他本是一个流氓，結了婚，生了子女，用金錢賄买了

① 引文見人民出版社的“馬克思恩格斯論宗教”76頁。

七大主教选他当了教皇，他和他的兒子用毒药毒死了許多政敌来巩固他的政权，为了政治的緣故，他强迫他的女兒改嫁过三次，尽管天主教不贊成离婚改嫁。教皇如此，他所統治的教会也就可想而知了。

教皇們不但荒淫無耻，而且是極端殘酷的。从他們身上找不到絲毫耶穌所提倡的博愛仁慈的精神。凡是違背教会利益的教会一律加以“異教”的罪名，加以殘酷的鎮压。这种鎮压是不断进行的。姑举瓦尔多派(Waldenses)所受的慘禍为例。瓦尔多是十二世紀法国里昂地方一个教徒。他認為耶穌是反对私有财产的，就把自己的財產分散給穷人，开始按照他所了解的耶穌教义去傳教，公开反对教廷的荒淫奢侈的生活，吸引了法国瑞士意大利等地的許多羣众。这就惹起了教皇(Innocent III)的大怒，他就發动了一次浩浩蕩蕩的“十字軍”，把这些瓦尔多派所佔住的地方杀得鷄犬不留。这是历史上一件最殘酷的宗教屠杀案。此外，教廷还組織了所謂宗教法廷(Inquisition)，抓住他們認為有異教嫌疑的人进行殘酷的拷打审問，如果不認罪，就把他用柴火活活的燒死(耶穌誠流血，他們就想出燒死的好办法)。这样被燒死的人不計其数。著名的捷克宗教改革运动家胡斯(Jan Hus)和意大利哲学家布魯諾(Bruno)都是这样燒死的。英国宗教改革运动家沃克里夫(Wycliffe)生前幸免于难，可死后三十一年，他的尸骨还被掘起来焚燒，連骨灰也抛到河里去了。在教会看，燒死还是寬大仁慈的处分，布魯諾被燒死时的宣判書里有这句话，“本着一切仁慈的精神，讓他受不流血的懲罰”。著名的天文学家伽里略也几乎受到这种“不流血的懲罰”。他宣傳哥白尼的地动說，教会就把他提到宗教法庭审問，逼他宣布放棄地动說，他玩了一个花招，当他跪着剛說完地不动之后，爬起来就輕声地找补了一句：“但是地究竟还在动。”这样他才逃脫了。这件事也可以見出教会極端仇視科学的态度。

教廷和教会的腐敗，这是当时情况的一方面。但是当时还有更深刻的一方面，就是封建經濟基础的崩潰，以及新兴資產階級的上升。經過上文所說的殘酷的榨压与頻繁的战争，欧洲封建基础的生产力大部分遭到了破坏，农奴受封建領主破产以及战时播迁流离的影响逐漸在摆脱膠着在某一块固定土地的状态。自从北方入侵各蛮族在各部分奠居以后，城市日漸兴起，城市的生产在中世紀主要的是手工業。随着手工業的發展，商業也逐漸繁榮起来。十二三世紀十字軍东征一方面打开了欧洲人的眼界，一方面也促进了貿易与交通的發达。行会或基尔特的兴起，特别是商会联盟的成立(例如日耳曼地区各城市在十三世紀所成立的 Hanseatic League)都標誌着一个新兴的階級——城市資產階級——在成長壯大起来了。这是一股新的力量，而这股新的力量的發展首先感到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縛，教皇的統一的压榨的專制統治以及財富集中于教会对新兴資產階級都是極大的障碍。其次，与城市資產階級的上升密切相联的是近代国家的兴起，例如西班牙，英国，法国，荷蘭，普魯士等等。圍繞着这些国家的君主身旁的有一种新型的資產階級的貴族。这批国王和貴族要巩固他們的政权，提高他們国家的地位，一方嫌惡教皇的統治与干涉，一方面也覬覦着教会的雄厚財富。这也是一股反对教廷的力量。此外，还有一股反对教廷的力量，就是城市貧民和广大的农民，他們受封建剝削的禍害最殘酷，仇恨教会与封建主也就最深。特別在日耳曼地区，他們的反抗活动最为积极，在閔澤尔領導之下，掀起了 1525 年的农民大起义。这三股力量都是反对封建制度因而也都是反天主教会的。但是資產階級的利益与城市貧民和农民的利益不相侔，结果是城市資產階級与国王和国族成立了

統一戰綫，對貧民農民則有時利用，有時扔到一邊。在宗教方面馬丁路德是代表國王貴族與城市資產階級這一聯合戰綫利益的。由於他的活動，宗教改革達到一種妥協的局面，基督教的基本內容未動，只是基督教會分裂為新舊兩派。舊派就是原來以羅馬教皇為首的天主教，新派是脫離教皇統治擺在各國政權之下的耶穌教。從此基督教分為兩大陣營，屬於舊教的大半是拉丁族國家，主要的是意大利，法國和西班牙；屬於新教的大半是日爾曼族的國家，主要的是德國，英國和荷蘭。舊教國家都是些較老的封建勢力比較佔上風的國家；新教國家則都是些新興資產階級比較佔上風的國家。<sup>①</sup>

舊教與新教有哪些重要的分別呢？第一，舊教是反映封建社會基礎的意識形態，它所堅持的理想是全世界要有一個統一的普遍的教會（Catholic，原文為“普遍”），以教皇為至上權威，教皇不但是各國天主教的首領，而且根據神權說，同時也是各國政權的首領；新教是反映資產階級社會基礎的，它代表新興國家獨立自主的要求，新教會是國家的教會，要受國家法律的約束，高級僧侶要受國王的任命，這樣就與羅馬教廷斷絕了關係。其次，與此密切相關的是教會所用的語言問題。舊教用的聖經是拉丁文的，教會里一切儀式和公文也都只能用拉丁文，到了中世紀後期，隨着新興國家的發展，各國語言也逐漸形成了，這種拉丁文已不是一般人民的語言，所以一般人自己不能讀聖經，必須通過僧侶講授，而僧侶講授是要按照他們自己的了解和利益，對聖經往往加以歪曲。現在新教卻主張各國教會的聖經都要用自己民族的語言，教會里一切活動也是如此。因此，宗教改革運動一開始，各國都在進行翻譯聖經的工作。既然譯成本國文，聖經就不是必經僧侶講授的書，而是人人可讀的書。這種翻譯聖經的工作對近代各國語言的發展起了極大的作用，近代德語是從馬丁路德的聖經基礎上發展出來的，近代英文也是從哲姆士時代譯的聖經（Authorized Version）的基礎上發展出來的。第三是對於僧侶的看法。依舊教，以教皇為首的僧侶是上帝的代言人，基督教義只能按照僧侶的解釋去了解，個別的教徒不能自己下獨立的判斷，有自己的了解，如果有不同於僧侶的了解，那就要背上異教徒的罪名，有被燒死的危險。因此，舊教僧侶擁有無上的威權，他們是神聖不可侵犯的，這顯然還是反映封建社會的意識形態。依新教，聖經是最後的權威，人人既然都可以讀聖經，就可以不通過僧侶的中介，而自己直接了解上帝的意旨。這也反映出資產階級提倡個性自由，獨立思考的主張。不過新教終究是一種妥協，各國教會還是各有一套僧侶機構，只是他們的權威不如天主教僧侶那麼大罷了。第四是對於宗教儀式的看法。舊教特別講究儀式，而舊教的儀式是按照封建朝廷大典的氣派來舉行的，不但繁文瑣節多，而且講究堂皇典麗；新教的號召是要回到原始基督的朴素和純潔，要把重點從儀式上回轉到基督教的精神實質上去，從外表的鋪張轉到內心的虔敬上去，所以廢除舊教的許多儀式。所以馬克思在“經濟學哲學手稿”里說路德“把宗教性弄成了人的內在的本質，他就揚棄了外在的宗教性”。此外新教的僧侶不須持獨身誡，可以自由結婚，我們只須到天主教堂參觀一次彌撒典禮，再到耶穌教堂參觀一次禮拜，就可以看出兩處的儀式和氣氛是迥然不同的。新教會所以有“廉價的教會”的稱號。這一點與新興資產階級提倡節約，以便積累資本有關。新教之中也有左右兩派，右派是國教派，對於天主教只是一種妥協，雖然割斷了對教皇的關係，還維持着一些天

<sup>①</sup>關於宗教改革中的階級關係，參看恩格斯的“社會主義由空想發展為科學”一書英文本導言。

主教的教条和仪式,例如三身一体說,授洗礼,聖餐礼之类,因此也就还維持着一套僧侶制度,如大主教,主教之类,英国国教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新教的左派受卡尔文的影响較大,不贊成国教的妥协,要改革得更徹底些,甚至廢除一切仪式和僧侶制度,教友会(Quakers)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凡是左派都和国教割断了关系,不在国教教堂里做礼拜。他們中間又有許多派別,这里不能詳談。

### 三 基督教对西方文化的影响——一种重新估价

必須承認,新教在初起时,和新兴的資產階級一样,有它的进步性,它对于摧毀西方的封建制度起了一定的作用。它在耶穌的教义中特殊着重符合他們的階級利益的那一部分,例如平等,博愛,自由,人权之类觀念,但是随着資產階級轉入帝国主义时期,基督教就成为帝国主义殖民的工具,文化侵略的急先鋒。他們根据羅馬教会劝化北欧入侵各蛮族的經驗,把傳教士送到世界各角落,說是把文明帶給野蛮人,实际上是为經濟侵略和軍事侵略鋪平道路。新教也已达到了它的反动阶段,这就是說,也已达到它的沒落阶段了。宗教究竟是迷信,是落后社会的产物,随着科学的进展,人类理性的伸張,它是必然要灭亡的。

現在我們回头看一看,基督教对于西方文化究竟起了什么影响呢。所謂影响当然包括好坏兩方面,問題在好多于坏,还是坏多于好?基督教鼎盛的时代是在中世紀,姑且从它成为羅馬帝国的国教时即公元四世紀算起,算到十四五世紀文艺复兴时代为止,它統治欧洲至少有一千年的左右。我們不妨拿这一千多年的西方文化成就一方面和以前一千左右的希臘羅馬的文化成就比一比,另一方面也和文艺复兴以后五六百年西方文化成就比一比,我們可以肯定地說,它前后都比不上,它既沒有希臘的文学艺术和哲学的成就,也沒有近代科学技术和政治經濟管理方面的成就。在历史进展过程中,中世紀这一千多年不能不說是一种長期的停滯和落后。这种停滯和落后的原因固然很多,天主教却要負主要的責任,因为它始終是頑強地支持封建制度,压迫人民大众,仇視文学艺术,仇視科学,仇視一切进步的思想,把人民的全部心思都集中在对上帝的信仰特别是对教会的盲目服从方面。中世紀当然也有些成就,过去資產階級学者把它們都記在基督教的賬上,但是如果細加分析,就可以見出基督教的功劳是过分夸大了的。

我們現在姑就資產階級学者讚揚基督教对于西方政治,文化教育和文学艺术几方面的貢獻来檢查一下。

第一是政治。資產階級学者們說,西羅馬帝国灭亡之后,羅馬教廷在將近一千年的时期里成为欧洲政局中一种統一的稳定的力量,基督教劝化了許多外来的蛮族,使他們由野蛮人变为文明的基督教徒,由分立对抗的部族变为一个欧洲的統一的大家庭,因而成功地抵抗住回教徒西从西班牙的侵入,东从君士但丁的侵入,挽救了欧洲文化。如果單从欧洲本位观点看,这番話确像有一部分道理,但是这部分道理是过于夸大了的。我們須提出以下兩点反駁。第一,到了西羅馬帝国灭亡时,欧洲大部分疆域都已被外来的蛮族侵入和佔領,現在日尔曼系和斯拉夫系的国家用不着說,都是外来的民族,就是拉丁系国家如法国,西班牙乃至意大利本身也都由外来民族侵佔过,成立过政权,落了戶,無論是羅馬帝国还是羅馬教会都始終沒有能把这些外来部族驅逐出境。在中世紀一千多年以內,欧洲始終处于分裂混乱状态,战争始終沒有停止过,所以所謂羅馬教廷的統一的完全是个神

話。只有在公元800左右，查理大帝獲得了短期的統一，而查理大帝卻是一個外來蠻族（佛蘭克族）的酋長，這筆功勞也不能記到羅馬教會的賬上去。其次，歐洲在黑暗時代的文化情況遠比當時的阿拉伯回教帝國落后得多，其原因即在天主教會對文化的仇視以及教會統治下教育的落后。到了十二世紀以後，由於十字軍東征，西方接觸到阿拉伯文化而且從阿拉伯文化那里間接地接觸到希臘古典文化。當時歐洲本身的文化可捍衛保存的就只是基督教，捍衛了基督教並不等於捍衛了西方文化。中世紀歐洲之所以能抵禦回教國家的侵入，功勞並不在羅馬教會而在外來的新興的各部族。即假定回教國家征服了歐洲，那對於西方文化和世界政局的影響究竟是好是壞，也還大成問題。所以基督教抵禦住回教國家的侵入，挽救了西方文化的說法仍是一種神話。

其次是文化教育。資產階級學者們說，在中世紀，基督教的僧侶是唯一的受教育有文化的階級，所以歐洲不絕如縷的文化傳統就靠他們維持住，而且當時沒有世俗的學校，唯一的學校是教寺學校（Cathedral Schools）和修道院以及教會所支持的大學，如巴黎，牛津，波倫亞等等；修道院的僧侶們一部分功課是鈔書，許多古代著作都借他們的手鈔本而流傳下來；教會中還出了一些大學者如阿比拉（Abelard），阿崑納斯（Thomas Aquinas），斯考塔斯（Duns Scotus），伊拉斯莫斯（Erasmus）等，接受了希臘哲學的影響，奠定了中世紀哲學基礎；因此，基督教對於西方文化教育和學術的貢獻是很大的。關於這一層，我們必須提出以下幾點。第一，在中世紀，僧侶是唯一的受教育有文化的階級，許多國王和貴族騎士都是文盲，至於平民更不消說，這是事實；但是這個事實只能說明僧侶壟斷了文化知識，使大多數人民被剝奪了受教育的机会，處於愚昧狀態，這只能說是基督教會的一宗罪過，決說不上是功勞。其次，羅馬教會在政策上是要愚民的，是反對世俗文化教育的。他們以為一切真理在聖經，就連聖經也還不敢讓一般人民自己去讀，須由僧侶按照他們自己的利益和自己的理解去解釋給教徒聽，怕的是如果一般人民自己去讀聖經，就會發見僧侶的話和聖經的話並不一致，影響到僧侶的威信。聖經尚且如此，其它文化知識可以想見。為着保衛宗教，他們就不得不反對科學，他們燒死了許多“異教徒”學者，要逼迫伽利略否認地動說，就是典型的例證。我們上文已提到中世紀許多著名學者如阿比拉，沃克里夫，布魯諾等等都受過教會的殘酷的迫害。在那種迫害的氣氛之下，文化學術難得發展，是理所當然的。第三，從十二三世紀以後，文藝復興運動漸開始，僧侶中逐漸有人研究希臘羅馬的哲學，特別是亞理斯多德，而且由於阿拉伯文化的影響，大學中也有人逐漸注意到科學，這是事實；但是這個事實，也只能說明人類理智和古典文化戰勝了基督教，不能說是基督教的功勞。而且中世紀僧侶要拿希臘哲學去勉強附會基督教義，使希臘哲學遭到極端的割裂和歪曲。中世紀哲學是以極端形而上學的繁瑣分析方法著名的。這種繁瑣哲學與神的信仰對西方近代唯心哲學發生了極深刻的影響。姑舉唯心派哲學兩個大師——康德和黑格爾——為例，他們都以神的信仰為他們的哲學的最后支柱，他們的著作都帶着極濃厚的中世紀經院哲學的繁瑣氣味。所以基督教對於哲學思想的影響雖是深刻的，卻不是很健康的<sup>①</sup>。

第三是文學藝術。資產階級學者們說：基督教會是近代西方文學藝術的搖籃和溫床。

<sup>①</sup> 馬克思恩格斯都指出過近代唯心哲學與基督教的關係。弄清了這一點，對於唯心哲學的認識會大大地提高。希望哲學史家在這方面作些專題研究。



一切都圍繞着“上帝的廟宇”——教堂。首先是建築，羅馬，佛羅倫斯，威尼斯，巴黎，冉斯，夏特爾，科倫，斯塔市堡一系列的大教寺奠定了羅馬式和高揚式兩大建築風格，在建築方面的成就，中世紀遠遠超過了希臘羅馬。其次是圖畫，教會為着裝飾教堂，為着向不識字的平民宣傳聖經故事，僱用了一些畫師替教堂畫壁畫和油畫，這就使意大利畫藝達到了文藝復興時代的高峰，開近代西方各國畫藝的先河。第三是雕刻，它是宗教宣傳與教堂裝飾的另一形式，與圖畫并駕齊驅，在中世紀有“石頭聖經”之稱，傑出的雕刻大師如端拿特羅（Donatello），安竺列（Andrea Della Robbia），瑪柯·安傑羅（Michaelangelo）等都趕上了希臘雕刻的最高成就。第四是音樂，近代音樂中的聲樂是由教會合唱隊歌唱頌聖詩篇發展出來的，弦樂是由教堂用的樂器發展出來的（例如主要樂器鋼琴就是教堂風琴的後身）。在文學方面也有同樣的情形。近代歐洲文學承繼希臘羅馬古典的傳統，是文藝復興以後的事，在中世紀古典傳統在歐洲几乎是斷絕了，近代歐洲文學是由教堂中發展出來的。例如近代詩歌起源于頌聖詩和宗教詩，戲劇起源于教會所扮演的“奇蹟劇”和“秘蹟劇”。根據這些事例，資產階級學者們就斷定基督教對於文藝的發展有很大的功勞。關於這一層，我們必須指出以下幾點。第一，羅馬教會對於文藝本來採取仇視的態度和壓制的政策。在基督教看，現世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是懺悔罪孽，為來世解脫作準備，而要做到這個準備，就要使靈魂戰勝肉體，克服一切肉體方面的慾望，因為罪孽都是由肉體慾望來的，這就叫做苦行主義或禁慾主義。文藝是現世的感官的享受，所以這種享受就是一種罪孽。因此，早期教會嚴禁一切世俗性的文藝。後來文藝復興那個人類精神大解放運動起來了，人民大眾對於文藝的愛好壓制不住了，教會迫於風氣的改變，才不得不改變它的政策，變壓制為利用，但是仍盡量把文藝禁錮在宗教範圍以內。它提倡文藝的功勞並不能抵償它壓制文藝的罪過。如果沒有教會的壓制和利用，中世紀歐洲文藝在人民大眾中間一定更迅速地朝比較健康的方向發展。其次，近代文學藝術的興起是和文藝復興運動分不開的，而文藝復興是現世主義戰勝了來世主義，人文主義戰勝了神權主義，全面發展主義戰勝了禁慾主義，古典文化戰勝了基督教，不能說是基督教的功勞。第三，資產階級學者們把歐洲近代文藝的成就歸功於基督教，也正猶如過去中國封建統治階級把長城歸功於秦始皇，頤和園歸功於西太后。其實統治階級下的文藝創造者是當時人民大眾，首先是人民大眾的血汗供應了文藝創造所必需的物力和財力，其次是人民大眾的智慧和辛勤努力成就了那些文藝作品。中世紀羅馬教會之所以能提倡文藝，因為它從人民搜刮了大量的財富，而創造文藝作品的藝術家大半是從人民中來的。大教寺的建築者連姓名都沒有留下，極出色的畫家和雕刻家如達文奇，瑪柯·安傑羅，拉斐爾等都隸屬於當時的手工業行會或基爾特，這就是說，他們是新興的工商階級的分子。在文學方面，現在所留傳下來的中世紀宗教詩和宗教劇都是很平凡的，除掉專門學者沒有人去讀它們，中世紀最大的文學成就是歌唱民族英雄的故事詩，如德國的“尼泊龍根歌”，英國的“伯阿沃夫”，法國的“羅蘭歌”，西班牙的“什德的詩篇”以及北歐的沙伽（Sagas）等。此外就是各國的民歌。這些作品中有許多不但沒有基督教的影响，而且是反教會和封建制度的，“列那狐”，“奧卡森和尼古涅特”，羅賓柯德系統的民歌都是著例。這些作品都是根據民間傳說或是由人民直接創造的，它們才是西方近代文學的真正的泉源。

資產階級學者還把十八九世紀西方文藝界乃至思想界的一個普泛運動——浪漫運動——

归功于基督教。他們說，浪漫精神基本上是基督教的精神。<sup>①</sup> 其实浪漫运动的来源是复杂的。就它的进步方面來說，它是文艺复兴的开花結果，代表新兴资产階級蓬勃發展的銳气，打破了淺狹理智与陈腐形式的束縛，把丰富的想像和深摯的情感帶到了文艺領域，这方面与沒落阶段的基督教並沒有多大的关系。就浪漫主义的反动方面來說，它确实从基督教吸收了很深的影響，我們只須举英国的沃茲華斯，法国的夏丕伯利安，德国的霍夫曼几人为例，就可以說明这种影响成为有才能的作者的絆脚石。基督教替浪漫运动帶來了神秘主义和感伤主义，把“自我”提高到主宰一切的地位，对“無限”加以神秘化与光荣化，由厭惡现实而逃脫现实，这样就使得一些反动的浪漫派作家留恋中世紀天主教統治下的生活方式，妄想把历史車輪轉回到封建时代去，甚至于轉回到原始社会去。这当然是死路一条，所以由反动的浪漫主义轉到近代西方文艺方面的頹廢主义乃是理所当然的事。說來說去，基督教本身是一种来世主义，是对于現世的遁逃，它之所以是“精神上的鴉片”，也正因为它使人習慣于在幻想中求安頓。正是基督教的这种精神在反动的浪漫主义和頹廢主义的文艺上得到了表現。

基督教究竟有沒有积极的一方面呢？我們應該說，有統治階級所崇奉的基督教，也有被統治階級所崇奉的基督教，这两种是不能混同的。統治階級只是利用基督教来施行他們的愚民政策，巩固他們的階級利益。被統治的一般人民大众从基督教中固然吸取了一些落后的东西，同时却也吸取了一些有益的东西。特别是从宗教改革以后，聖經譯到各国語言里，人民可以自己去看，可以从聖經里看到未經教会僧侶歪曲的原始的耶穌教义。从这里面他們学得了一些行为的标准，把善良正直作为一种人生理想。我們可以說，一般西方人民的倫理观念都是从基督教得来的。特别值得提起的原来耶穌所宣揚而为羅馬教会所抹煞的平等博爱的教义。这些教义在一般人民心里却扎下深固的根，在某些时期形成了推动社会前进的力量，英国十七世紀清教徒的革命是显著的例子。法国资产階級革命虽然提倡無神論，反对宗教，而它所标榜的“自由，平等，博爱”还是要溯源到基督教。耶穌是反对战争流血的，在西方一向有一部分人民把和平当为一种宗教信仰。就在目前，基督教的进步分子对于世界和平运动也还是有些貢獻。

总之，基督教是作为犹太旧教的改革和作为奴隶階級及被压迫人民反对羅馬政权的运动而起来的。就耶穌本人所宣傳的教义來說，其中很有些积极的进步的因素。作为一种意識形态，基督教是随社会基础变迁的，它經過了社会发展史中三个重要阶段——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資本主义社会。在奴隶社会中，基督教背叛了它的反抗羅馬政权的本旨，轉过来为羅馬政权服务，成为羅馬政权同化外来蛮族的工具；在封建社会中，基督教会成为最大的地主，教皇成为封建等級的最高威权，提倡所謂神权說，竭力維護封建的統治；在資本主义社会，基督教始而帮助新兴资产階級推翻了封建統治，繼而成为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工具。它对于西方政治，文化教育，文学艺术各方面的影响是深刻的，但是总的說来，这种影响是坏处多于好处。自从文艺复兴以来，西方思想史的發展是反基督教的，特别是十八世紀的啓蒙运动以及十九世紀以来馬克思主义的發展。宗教是久已过时的东西，它的影响随着科学的發展而逐漸縮小，最后終于是要消灭的。

<sup>①</sup> 黑格尔就是这一說的代表。

# 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

## 在西方逻辑发展历史中的作用

何兆清

### 一

逻辑是一门与哲学有着密切关系的科学。

因为全部哲学最重大的基本问题乃是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问题。而思维对存在的关系问题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究竟何者——精神或自然界——是第一性的问题”，另一个方面：“我们关于我们周围世界的思想对这个世界本身究竟处于怎样的一种关系呢？我们的思维能否认识现实呢？我们能否在我们关于现实世界的表象和概念中得出一个对现实的正确反映呢？”（恩格斯，“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第二章。）而逻辑这门科学所处理的，正是哲学基本问题中关于思维方面的问题。因为人的思维正是逻辑研究的对象。心理学亦研究人的思维。但心理学是把人的思维当作心理活动的自然过程来研究。逻辑研究思维则不同。逻辑研究正确思维的规律和方法。人们的思维、思想，其目的在于认识真理，在于认识自然界和社会历史的一般真理。逻辑所研究的，乃是那使人们可以得到真理的思维、思想。逻辑研究人们在认识真理时他们的思维思想所据以进行的一般规律和方法；这些规律和方法是人们认识世界和获得真理的必要条件。因此，逻辑尤其和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个方面有着更多、更密切的联系。因为哲学在这方面要解决的问题是：我们的思维能否认识现实呢？由我们的思维对于现实世界构成的概念和表象，能否可以正确地反映现实世界呢？这个问题是认识论的根本问题。而逻辑所研究的，是人的思维如何正确地认识现实世界的方法的问题。逻辑所研究的思维方法论是不能脱离认识世界的问题而独立发展的。逻辑的发生发展始终是和认识现实世界的问题结合在一起。哲学的基本任务在于认识世界（自然和社会）以便改变世界，而逻辑的主要任务即在说明用什么思维方法才能达到正确认识世界以便改变世界的目的。为了能够正确地认识世界，逻辑学者即须详细研究思维活动的规律，知识发展的法则，务使逻辑这门科学能够成为人们认识现实，研究现实的武器，成为科学认识的方法论。所以在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哲学时期，逻辑乃是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由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的斗争，是哲学在许多世纪以来全部发展的规律，而逻辑和哲学的关系如此密切，因此，在逻辑中即如同在全部哲学中一样，在过去和现在都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派的斗争。

### 二

究竟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派在逻辑领域内是怎样的进行斗争的呢？它们据以进行

斗争的原則究竟是些什么原則呢？它們兩派的斗争对于邏輯的發生發展會起什么样的作用呢？这一系列的問題都是关于邏輯的最根本的問題，在我国現時極需要邏輯家們对于這些問題加以热烈的研究和討論。

我們認為对于这一系列关于邏輯的根本問題的研究，最好還須由深入考察人們在哲學基本問題的解決上采取了什么样的原則和觀點來着手。因为邏輯是关于人的思維及其規律和形式的科學，它的主要任务在于提出和解決人的思維应当遵守什么样的規律和采取什么样的形式而進行活動，才能够达到正确地認識現實世界和獲得真理的方法与途徑的問題。但是要在邏輯中解決人的思維怎樣認識現實世界和獲得真理的方法与途徑的問題，就必得先要解決：思維是什么？現實世界的本質是什么？真理是什么？三個問題。這三個問題的解決，可以闡明邏輯中許多根本問題，如关于邏輯的本質是什么？人們的邏輯思維和客觀世界有什么關係？邏輯能否作為認識的工具和能否作為推廣世界觀的工具？人們是否需要採取一定的立場來制定邏輯理論的體系？等等問題。所以這三個問題是怎樣地獲得解決，乃是各種邏輯理論怎樣地形成的基礎。可是這三個問題都是屬於哲學的基本問題，即思維對存在，精神對自然界的關係問題。恩格斯曾指出哲學家對於哲學基本問題的解決方法是不相同的，他們可分成唯心主義哲學家 and 唯物主義哲學家兩大營壘。因此，在邏輯中，各種問題的解決和各種理論的建立，都無可避免地不是沿着唯物主義哲學的路綫，就是沿着唯心主義哲學的路綫，不能有何例外。

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對於上述關於邏輯的三個基礎性問題的解決是截然不相同的。第一，對於思維是什么？一問題，恩格斯曾寫道，“若進一步問：什麼是思維和意識，它們是從哪里得來的？那末我們明白看到它們是人的頭腦的產物，而人本身則是自然界的產物，……自然而然地，人的頭腦的產物，歸根到底也是自然界的產物，所以也就不是與自然界的其他聯繫相對立，而是與之相適應的。”（“反杜林論”，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5頁。）所以在馬克思主義的唯物主義者看來，思維不過是特殊組織的物質——腦——的最高產物。通過表象，概念，判斷等等來反映客觀現實的一種過程。人們要理解思維的本性，就必須承認思維對外部世界的依賴關係，承認外界條件對思維的決定作用。因此，他們斷言：思維不可能是第一性的，因為它不能在自然界以前產生出來；思維也不能脫離物質而獨立存在，因為它始終是和一定的物質運動的形式，即與人腦的活動聯繫着；思維更不能創造自然界的規律或給予自然現象以規律如康德所說的那樣，因為事實上思維是只能以通過感覺直觀對於外界事物所獲得的感性認識為基礎而概括地反映出自然界中事物現象的變化過程和發展規律來；最後，他們並指出，人類思維的認識作用並不是天生一成不變的，而是在人類的實踐活動中，在人類改變自然和改變社會的斗争中產生和發展的。思維的發展始終是取決於自然和社會的發展。但是唯心主義者對於思維的本性却作出截然相反的理解，斷言思維乃是某種獨立的不依賴物質而存在的超自然本原的產物，即絕對觀念，上帝等等的產物，而否認思維是物質的肉體器官——人的頭腦的產物。他們不承認人類思維的認識作用僅是對於外界事物的本質屬性，因果聯繫和發展規律等等的理解和反映，卻把思維認識看作是所謂“世界精神”的“自我認識”，並把思維內容看作僅僅是人們自己主觀的感覺和觀念。例如黑格爾就把思維看作外部世界的源泉和基礎，而不承認思維是物質的產物和反映。馬克思曾寫道：“在黑格爾看來，思維過程，即他所稱為觀念而甚至將其變成獨

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界的创造主,而现实界不过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在我看来,恰巧相反,观念现象不过是被移置于人类头脑并在人类头脑中改造过于物质现象而已。”(“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二版,跋言。)可见唯心主义者把思维的能动作用过于夸大了,甚至把它夸大成为一种脱离物质,脱离自然的神化的绝对体。

其次,对“现实世界的本质是什么?”一问题,唯物主义根据人类素朴的信念,把自然界看作唯一的现实。列宁曾写道:“唯物主义的基本前提是承认外界世界,承认物存在于我们意识之外并且不依存于我们的意识。”(“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08页。)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者并且根据科学知识发展的成果,考察得自然界中各种现象的本质乃是具有各种表现形式和运动形式的物质,自然界的统一性就在于它的物质性,并证明自然世界是可认识的,各种现象都是有规律可寻的,人在认识自然界的客观规律后,就可利用自然规律创造出种种生产工具去作用于自然界,迫使自然力为人类的目的服务。但是唯心主义者或则宣称自然界是不可认识的,或则宣称自然界是意识精神,或感觉的现象。例如,根据康德的先验主义与不可知主义,自然世界的本质即“自在之物”对于我们来说是不可认识的。他在“纯理性的批判”中谈道,现实世界在我们的感觉中,最初只是一团混乱的知觉,这些知觉借助于感觉固有的先验的直观形式即空间和时间,才得以整顿而形成感性现象,其后便是悟性起作用,悟性借助于它所固有的先验的逻辑范畴,把感性现象纳入可能性,必然性,因果性等概念之中,才使感性材料变成具有一定的秩序和规律。康德把空间,时间,因果性,自然规律说成不是自然本身的特性,而是人类认识能力先天的特性加于自然界的結果,并把自然界的统一性说成不是自然界的物质所造成的,而是由意识主体即自我的统一性所造成的。康德的这些论证,在指明自然世界本身原无任何规律性,所以它是不可认识的。又如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把自然界看作从精神派生出来的,看作绝对观念或精神在受限制的和有限形式的体现。恩格斯曾写道:“唯物主义把自然界看作唯一的现实,而在黑格尔体系中,自然界不过是观念的外化,好像是绝对观念的退化;无论如何,思维及其思想产物,即观念,在这个体系中被视为第一性的东西,而自然界则被视为派生的,只是由观念屈躬下降到这个地步才存在的东西。”(“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第一章。)再如马赫主义者主张:自然界是主观感觉的复合物,一切现象的基础是“经验的要素”;他们把感觉经验的起源问题取消不谈,而硬说感觉经验没有自己的物质源泉……等等。人们可以看到,唯心主义者是何等粗暴地歪曲了自然界的实际情况了。

最后,对于“真理是什么”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者回答说,真理是正确反映客观现实的知識,是观念,概念与客体的一致,它是客观世界及其规律在人的观念,概念,判断中的正确反映或复写。列宁即指出真理“是在反映自然界的意识与被反映的自然界之间的符合”。(“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人民出版社版,第164页。)唯物主义由于承认自然界及其规律完全可能认识,并看到我们对于自然界规律的那些已经由经验和实践考验过的知識是具有客观意义的确实知識,故认为真理永远具有不依存于主体,不依存于人或人类的客观内容,真理必须以客观事物为基础,真理的认识应是客观的。但是唯心主义哲学家否认有客观真理,否认世界及其规律的可知性,不相信人能认识外部世界的客观性,而认为真理只是主观的。例如康德本其世界不可知论,即不以基于经验的知識为真理,亦不以認

識与其对象相符合为真理。“真理，依照康德的意見說來，只是先天的(先經驗的)形式，人借助此先天的形式，把感覺世界的現象加以整理，使成為合乎真理的。”(蘇聯大百科全書選譯：“真理”，三聯書店版，第2頁。)又如黑格爾說，“從哲學觀點來看，概括地來講，真理乃是思想的內容与其自身的符合。”(“黑格爾的小邏輯”，賀麟譯，商務印書館1950年版，第43頁。)因為在黑格爾看來，認識的行為就是主觀理性領會物自身的客觀理性的行為，認識是精神同其自身的結合。“作為科學，真理是發展着的純粹的自我意識。”(引自“列寧哲學筆記”，中譯本，第71頁。)

由於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兩種世界觀之間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鴻溝，它們對於思維的本性，世界的本質和真理的意義三者，都抱着截然相反的看法，所以它們在進行邏輯研究時，就無可避免地各要按照自己的哲學觀點來處理邏輯的各種問題和建立邏輯的理論體系。唯物主義者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來講邏輯，唯心主義者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來講邏輯。當然，他們各按自己的世界觀講出來的邏輯理論是決不能彼此一致的，正如同他們各自的世界觀之彼此不能一致一樣。

邏輯研究者若是沿着唯物主義的傾向，贊同唯物主義的世界觀不過是對自然界本來面目的了解，而並不附加任何外來的成份(恩格斯語)，並贊同唯物主義認識論的基本原理，乃是主觀和客觀一致這個反映論原理，以及真理是我們的知識和客觀現實一致的原理，則當他們在把思維當作研究對象時，就必然會着重在研究思維和客觀現實的關係，會着重在將各種思維形式和認識世界的目的結合起來。例如，研究關於概念的問題，他們必然要求人們不是隨意按照主觀的意願去表達自己的概念，而是要按照客觀事物和現象間的相互關係和聯繫來表達自己的概念。當研究判斷和推理時，他們亦着重研究判斷，推理對存在的關係，而要求人們認識到，判斷和推理雖是由通過綜合各個概念而得到，但是在判斷和推理過程中所確定的概念間之關係，並不是任意的，而是反映着存在的聯繫，反映着事物的真實關係的。下節我們講到亞里士多德，培根，以及辯證唯物論經典作家等之研究邏輯，即是範例。

反之，邏輯研究者，若是採取唯心主義的立場，“認為世界是‘絕對觀念’，‘宇宙精神’，意識的體現，……硬說只有我們的意識才是真實存在着的，物質世界，存在或自然界只是在我們的意識中，只是在我們的感覺，觀念或概念中存在着，……否認世界及其規律底可知性，不相信我們知識底確實性，不承認客觀真理，並認為世界上充滿着科學永遠不能認識的‘自在之物’。”(斯大林：“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第二節。)則當他們研究邏輯時，就必然或者如康德把邏輯和自然完全隔離開來，把思維的形式和它的客觀內容完全脫離，而製造出一種完全形式主義的邏輯；或者如黑格爾的“邏輯學”只考察在純粹狀態中的“絕對觀念”從低級狀況到絕對完善狀況的邏輯發展過程，既神秘化了思維認識，也神秘化了邏輯。

由上面簡單的分析，即可看到對於哲學基本問題的不同解決，即決定着邏輯理論的不同體系。邏輯就是這樣地曾經在歷史發展過程中隨着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兩派環繞着哲學基本問題所作的鬥爭發展，而多次起着變化，並從而積累出許多著名的邏輯理論。在這些理論中，唯物主義的觀點，或唯心主義的觀點，是像一條紅綫似的，貫穿着邏輯的每一概念，每一範疇，或每一部份。

## 三

而且,在逻辑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所起的作用是不相同的。由思维发展的历史看来,逻辑的进步主要是在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的斗争中取得的。因为唯物主义根据人类的实践经验 and 科学发展的成果,建立了正确的世界观和认识论,确信人类认识的目的在于正确地反映自然,认识自然的客观规律。列宁正确地指出:“理性,理智,思想,意识,如果撇开自然,不适应于自然,就是虚妄。”(“哲学笔记”,第292页。)因此,抱有唯物主义观点的哲学家,经常认为真正科学的逻辑不是把人和自然分隔开来,而是要把两者联系起来,他们着重将逻辑研究和正确认识自然的目的密切结合,而反对脱离事实的纯粹思辨,反对把认识看作是纯粹逻辑的抽象过程,并反对一切唯心主义对外部世界作无稽的捏造;他们务使逻辑能够发展成为正确反映自然规律的有力武器,能够成为发现客观真理的方法,工具。如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培根的“新工具论”,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都是在坚持唯物主义倾向反对唯心主义观点的斗争中形成起来的。至于唯心主义,由于歪曲地解决哲学基本问题,认为世界是不可能被认识的,认为人们的思想内容并不是客观物质世界的反映,而仅是个人主观的感觉思想,除了自己的感觉,自己的思想外,什么也不能认识,于是在逻辑中,就无视于思维和存在的关系,而把思维的形式和规律看做是和客观世界完全脱离的东西。按照这种观点,人靠自己某些天生的特性,便可随意建立思维的规律和规则,而不管这些规律规则是否符合于客观实在。因此,唯心主义的逻辑不是把人和自然联系起来,而是把二者分隔开来,使二者互相对立。唯心主义的逻辑极不适宜作为认识的工具。诚然,在唯心主义中间,也有个别哲学家,尽管他们的哲学是唯心的,但是他们也对逻辑提供了一些有益的东西。例如黑格尔即为唯物辩证法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合理的内核;如关于矛盾发展的思想就是这种合理的内核。可是这些合理的内核是被唯心主义的体系所掩盖,它需用巨大的努力才能被发现。

所以由思维发展的历史来看,逻辑的进步乃是被唯物主义理论的进步所表示的,并且是只能在唯物主义理论和唯心主义理论之间的矛盾和斗争过程中表示出来。为了证明这点,我们从举亚里士多德的逻辑为例说起。亚里士多德是形式逻辑的真正建立者,他在许多主要问题上虽然动摇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但是在他的逻辑中,主要的基本倾向却是唯物主义。首先我们看到,亚里士多德对于认识世界的問題,一贯有着极高的兴趣。他曾经考察过当代知识的全部领域,遍探宇宙万物的变化及其成因,留下有天论,气象论,生灭论,动物分类论,动物史,动物分佈论等关于自然界的许多科学研究,又留有关于人类社会的政治学伦理学,以至诗学等著作。当诡辩派和怀疑论者认为科学知识不可能成立时,他却肯定在万有里面,只有我们人类是具有高度的智慧,能够认识万物的真理,能够获得科学的知識。列宁曾写道:“亚里士多德对于认识的客观性没有怀疑,对于真理的力量,对于认识的力量、能力和客观真理性,都抱着天真的信仰。”(“哲学笔记”,第334页。)因此,亚里士多德对于他的老师柏拉图把自然,物质世界看成不是真实的存在,而只是所谓存在于时间空间以外的理念的阴影,反光,和不完善的摹本的神秘说法,曾作了深刻的批评。他断言,物质世界并不是“理念的阴影”,而是不依赖于我们的意识而客观地存在着,并且是感觉,观念,概念的源泉。列宁曾认为,“亚里士多德对理念的批判,是对唯心主义,

即一般唯心主义的批判。”（“哲学笔记”，第288页。）由于亚里士多德热爱科学，热爱研究自然和社会，所以他能够大量地分析了当时在科学中已经形成的概念，判断，推论和认识的方法，详细地论述了人类思维的各种形式和各种格，从而奠定了形式逻辑这一科学的基础。他在逻辑方面最有价值的贡献，是在于他把逻辑形式和客观现实联系起来。一，如在解决一般和个别的关系问题上，柏拉图原采客观唯心主义的立场，将一般概念跟个别物体分割开来，认为只有一般概念，如人的概念，马的概念，才有真实的存在，至于对于个别的物体，如个别的人，个别的马，则否认其有真实的存在，而认为其只是一般概念的阴影。亚里士多德从事实经验出发，反对柏拉图的理论，断言一般的东西和个别的东西有联系，并认为个别的东西也是客观实在的。他说：“人和马等等都是一个一个地存在着的，普遍的东西本身不是以单一实体的形式存在着，而只是作为一定概念和一定物质所构成的整体存在着。”他认为，“离开单一的普遍是不存在的。”（转引自列宁“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一书摘要”，载“哲学笔记”，中译本，第333页和335页。）所以照亚里士多德看来，普遍观念，一般概念并不是独立存在的，它们在自然界中有自己的血和肉。二，如关于命题的理论，他认为命题是关于存在与非存在的陈述，判断的肯定与否定应与实在事物的联合或分离相适合，不同种类的命题应与事物真实存在的形式相适应。他曾写道：“对于现实中联合着的东西，如实地加以肯定，对现实中分离着的东西，如实地加以否定，即为真实判断；与此相反，即为错误判断。”又说：“谁把分离着的东西，如实地认为分离，把联合着的东西，如实地认为联合，谁就说出了真理；谁的见解若是与现实情况相违反，谁就处在错误之中。”（“亚里士多德全集”，1928年牛津英文版，第8卷“形而上学”，第6篇，第4节；第9篇，第10节。）可见亚里士多德认为真理不是别的而只是认识与客观现实的一致。三，在推论方面，他发明了三段论式的理论，制定出三段论式的基本规则。他认为任何推理和证明都可套上一种三段论式，只须三段论式的中名词能够和客观事物的真实原因相适合，则在正确的前提下遵守三段论式的基本规则，就必然会引导出正确的结论。所以在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中，思维形式和存在形式的一致是被强调着的。他表明人类思维的各种形式和各种格都是事物的不同方面和不同关系的反映。在推理的过程中，他认为我们思维的联系不是任意的，而是为事物本身的联系所决定的。四，他发现了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的思维规律。在“形而上学”第三章中，他明确地把矛盾律和排中律作出定式，并且也蕴涵地提出同一律。而他之所以能发现这些规律，则是由于批判诡辩派的相对论和怀疑论而作出来的。在批判他们的过程中，亚里士多德指出人类正确认识的最高原则是不能有矛盾。他曾详细论证了矛盾律和排中律，指明它们不仅是正确思维必须遵循的规律，而且也是在存在事物本身的联系中有着客观基础的规律。综上所述，可知列宁说：“亚里士多德处处都把客观的逻辑和主观的逻辑混合起来，而且混合得处处都显出客观的逻辑来。”（“哲学笔记”，第334页。）列宁的这一评定确很好地表达了亚里士多德逻辑的特点。

到中世纪时，宗教神学，为了宣扬天堂彼岸的信仰，认为自然界是丑恶的，是罪恶的渊藪，特别教导人们要鄙视自然界，要仇视人世间的现实生活，并要限制身体的欲望以拯救灵魂。所以当时充当神学奴仆的经院哲学，除专事研究圣经，论证教会的教义，并发展由这些教义推演出来作为人们行为标准的结论之外，并不研究自然界，也不研究历史，而且仇视科学，憎恨唯物主义。经院哲学家们为了维护和论证官方教会的思想体系，曾研究亚



里士多德逻辑。但是他们研究亚里士多德逻辑，并不注意思维跟存在的关系问题，而只是烦琐地制定一些形式的，和现实脱离，和实践无关的推理方法，企图用这种形式主义的抽象推理方法，来为既定的宗教教条进行烦琐空洞的论证。为了达到认识世界，亚里士多德表述了正确思维的主要规律，制定了从一些被当作最初命题的前提推出结论的规则，成立逻辑中所谓的演绎法。亚里士多德已经不是把逻辑看作单纯的辩论艺术，——虽然他也研究这些问题，——而是看作科学地认识现实，研究现实的武器。但是经院学者抛弃了亚里士多德逻辑中全部有价值的东西——即以认识世界为目的的方针，而将逻辑只应用于曲折烦琐的神学讨论中。并且中世纪学者们绝大多数只研究了逻辑形式，极少注意到思维的规律，而逻辑的形式主义化，正好是发生于把思维规律和现实的联系割断的倾向中。所以在中世纪宗教唯心主义者手中，逻辑被歪曲地抽空了一切内容，而变成形式的科学，变成一门枯燥死板的科学，完全不能有助于发明客观真理。诚然中世纪尚有一批唯名论者他们提出了事物先于一般概念而存在，和一般概念只是事物的名字，名称的论点，用以反对当时实在论派主张一般概念先于个别事物而存在的说法，从而限制了神干预自然界的范围。马克思曾指出唯名论是中世纪唯物主义的最初表现。但是唯名论者不懂得一般概念反映着客观存在的真实性质，不懂得个别事物不是和一般分开，而是包含着一般的，所以后来在贝克莱和休谟的哲学中以及现在的所谓语义的哲学中却起着反动的作用。

到十七世纪，在科学上出而反对中世纪烦琐哲学的是英国哲学家培根。培根的贡献在于他抱有正确的自然观和发展了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他在“新工具论”的开端写道：“人作为自然界的的管理者和解释者来说，他在事物上或思想上能够做多少或了解多少，完全取决于他在自然界的秩序上观察了多少而定，除此以外，他不能做更多的东西，也不能了解更多的东西。”我们在培根的书里可看到他鼓励着一种看法：即人类能够借求得知识和理解物质世界的规律而学会控制自然，从而能够成为他们自己命运的主宰。所以他强调：认识的对象是自然，认识的任务是研究自然，认识的目的是人对自然的统治。他大力宣扬正在成长中的自然科学的重要性，认为自然科学是真正的科学，而实验的物理学是自然科学的重要部门。“按照他的学说，感觉是完全可靠的，是一切知识的源泉。任何科学都是实验的科学，科学就是以理性的方法去整理感觉所供给的材料。归纳，分析，比较，观察，和实验，是理性方法的主要条件。”（马克思语，载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本序，人民出版社 1953 年版，第 9 页。）他反对被中世纪经院哲学歪曲了的亚里士多德逻辑，认为其不再是认识的工具。他在自己面前提出制定认识自然的“新逻辑”的任务，努力探讨了科学归纳法的诸问题。在“新工具论”中，他阐明新逻辑的目的是在于发现自然现象间的因果联系，并研究了确定现象间因果联系的各种方法。在逻辑史上，培根是第一次最完备的研究了科学归纳法。

在十七世纪前半期，代表着西欧新兴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起来反对中世纪哲学，保卫科学，并在逻辑领域内有着革新贡献的，除了英国的培根外，还有法国哲学家笛卡儿。但在解决哲学基本问题时，笛卡儿是二元论者。他断言存在着两种实体：具有广延属性的肉体实体和具有思维属性的灵魂实体。这样，他承认有两种互不依赖的本原，即物质的本原和精神的本质。他在物理学领域内，认为物质是唯一的实体，是存在和认识的唯一根源，这样，他就发挥了唯物主义的思想，他的这一思想曾促进了科学和哲学的发展。可是在认

識論上，他提倡天賦觀念的學說和“我思故我存在”的原理，却為以後主觀唯心論所利用。但是在邏輯方面，笛卡兒的“方法論”對經院哲學，特別是對中世紀經院哲學的邏輯，展開了堅決的鬥爭，這一鬥爭曾在歷史上起過極進步的作用。在此書中，他提出了作為一切科學研究所應當遵循的規則四條。在這些規則中，他指出在認識中要從那種被直觀為真或被證明為真的原理出發，而進到演繹階段；在研究過程中，要把對象加以分解，加以簡化，把複雜難明的東西化為簡單易明的東西，然後循序漸進地從簡單的和比較明顯的引導到複雜的和比較不明顯的東西的認識，最後，並須在全部細節上研究對象。笛卡兒企圖把科學研究的邏輯過程作出精確的說明。他的“方法論”對於數學科學和實證的科學在探求真理過程中有着指導性的作用。

培根和笛卡兒的思想後來為十八世紀的法國啓蒙學者和唯物主義者所發展。十八世紀法國唯物主義的情況，正如列寧寫道：“在歐洲近代史中，特別是十八世紀末時，在法蘭西發生了反對一切中世紀廢物，反對農奴制機關與農奴制思想的決戰的時期，唯物主義成了唯一徹底的哲學。它忠於一切自然科學的學說，仇視迷信與虛偽習氣等等。”（“馬克思主義的三個來源和三個組成部分”，第一節。）但是十八世紀末葉到十九世紀初期的德國唯心主義哲學的基本任務則在於反對法國革命，反對唯物主義和無神論，並與唯物主義的自然科學作鬥爭。德國唯心主義者們並曾以唯心主義的方式研究邏輯，改造邏輯。如康德和黑格爾即是代表。

康德看到法國唯物主義沉重地打擊了宗教和唯心主義，就竭力要把宗教和科學，把唯心主義和唯物主義調和起來，以保衛宗教和唯心主義，使其不受科學和唯物主義的打擊。他在“純理性的批判”中，詳述人的認識能力：感性，悟性，理性三者對於外在世界本身的認識都有限制，都不能通過事物的現象而認識到事物本身或“自在之物”的理論，即在於“限制知識的範圍，以便給信仰讓出地盤”。由於康德認為外部世界是不可認識的，人的感官知覺和悟性概念並不反映外部世界，其結果他就形而上學地把知識的範圍只限於對內部精神世界的認識，而認為精神世界以外的都是不可認識的，並把認識，思維和自然界隔離開來，對立起來，使認識思維完全脫離現實。因此，他在“邏輯導論”中寫道：“一般研究悟性和理性的必然規律的這種科學，或一般地單純研究思維的形式的這種科學，我們叫作邏輯。……邏輯不能作為科學的工具。……邏輯不能從任何科學或任何經驗中取得任何原則，邏輯除研究適用於悟性的先驗的必然規律外，不包含任何其他東西。”（英譯本，第3頁。）又寫道：“邏輯就其形式和內容來說，它是一種理性的科學，因為它的規則並不是從經驗中產生的，同時因為它是以理性為自己的對象。因此，邏輯只是悟性和理性的一種自我認識，但其權力也僅僅是關於思維的形式而不涉及任何外界的對象。在邏輯中，我不問悟性知道什麼，也不問悟性能夠知道多少，或者它的知識能夠達到多遠；因為這些是關涉到自我認識的實質運用，將屬於形而上學。在邏輯中，問題僅僅是：悟性如何認識其自身。”（同書，第4頁。）所以康德邏輯的特點，即在於他把邏輯和自然脫離開來，把思維的形式和它們的客觀內容割裂開來，而把邏輯局限於“研究悟性和理性如何認識其自身”，局限在悟性和理性的先天形式的範圍內兜圈子，而不能越出一步去和外部世界發生任何交涉。他局限於規定我們的判斷和推論在形式上的正確性的諸法則，而不從任何科學或經驗中取得任何原則，不討論我們的思維能反映現實到什麼程度的問題。

从康德起，逻辑就产生了在原则上不同的方向，逻辑被理解为形式主义的逻辑，被看作纯粹思维形式的科学。但是康德事实上不仅歪曲了自然界，歪曲了认识和思维，而且也歪曲了逻辑。因为康德把自然界说成是不可认识的，而实际上人类由科学在自然界中层出不穷地发现许多为前人所未知道的自然规律，并且根据这些规律创造出许多前所未有的生产工具和生活资料，就证明了世界是完全可认识的，“自在之物”是可变成“为我之物”的，从而也就证明了他的世界不可知论的虚妄性。其次，他认为人的感觉和概念并不反映外部世界，悟性的逻辑范畴是先天的并不从经验取得任何原则，而把思维认识和外部世界分割开来并且对立起来，这就根本歪曲了人类思维的本质。因为否定思维和外部世界的联系，就截断了思维的来源，根本就谈不到认识，更谈不到思维。至于他从上述观点出发，把逻辑的基础建立在思维和现实的对立上面，从而主张逻辑除研究悟性和理性的先验的必然规律外，不从任何科学或任何经验中取得任何原则，并断言逻辑不能作为科学的工具，这就否定了逻辑作为认识方法和获得真理的科学意义，只大降低逻辑的作用而已。

至于黑格尔的哲学则代表着德国唯心主义发展的完成阶段。黑格尔在进行哲学活动的早年，就以作为法国革命和法国唯物主义的敌人而出现。他最初写的“精神现象学”（1806年）给他的哲学打下了基础。以后他写出主要著作“逻辑学”，在此书中，唯心主义辩证法获得了最完善的形式。根据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世界的基础是某种在自然界和人类出现以前就已存在的神秘的“绝对观念”。依照他的学说，绝对观念乃是一种非人格的世界理性，世界精神，它是客观的，永恒的，存在于空间和时间的之外，处于发展状态之中；它是唯一的真理和一切存在物的唯一源泉；自然界及人类历史都是从“绝对观念”中派生出来的，都是“绝对观念”的表现。可以看到黑格尔的绝对观念，不是别的，不过是哲学加工过的普通宗教的上帝观念而已。恩格斯写道：“黑格尔是个唯心主义者，换句话说，他认为人脑的思想不是真实事物和真实过程多少抽象的反映；恰巧相反，黑格尔认为事物及其发展只是在世界尚未出现以前已存在于某个地方的某种‘观念’体现出来的反映。这样，一切都被颠倒过来了，世界现象的真实联系完全被歪曲了。”（“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二卷，第133页。）所以黑格尔在“逻辑学”中所考察的并不是单纯的人类思维的逻辑，而是在“纯粹状态”中的绝对观念从低级状况到绝对完善状况的逻辑发展过程，这时绝对观念是在自然界出现以前就存在，是作为“纯思维”而活动着，它是通过概念和范畴的运动表现出来。他写道：“逻辑学是以纯思想或纯思想型式为研究对象。就思想的通常意义言，……我们总以为经过思想之物，它的内容或材料必是经验的。而逻辑学中所承认的思想则不然，除了属于思想自身，由于思想自己所产生的思想外，它不能另以别的意义的思想为内容。所以，逻辑学中所说的思想是指纯思想而言。”（“黑格尔的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版，第41页。）

可知黑格尔也和一般思辨哲学的拥护者一样，轻视感觉经验的知识和对自然界的认识的意义，他赞赏冥思的理性，把理论的思维跟常识对立起来，认为思维不是事物的反映，相反的，事物乃是“纯思想”的体现，例如他说，“自然或精神的现像乃仅是纯思想的型式之特殊的表现罢了。”（同上书，第41页。）在他的逻辑学中“纯思想”是以通过概念和范畴的运动表现出来的。因此，概念和范畴在黑格尔的逻辑学里，并不被看作现实世界在人类思维中反映的理性形式，而是当作绝对观念展开的阶段，当作独立存在着的精神实体，它

們有自己的獨立生活。每個概念，範疇，從其出現起，內部就包含對自己的否定，自己被否定後，就讓位給另一個概念，另一個概念也是如此。黑格爾把概念的發展作出了一個“正，反，合”的公式：正題為反題所否定，反題又為合題所否定，合題是發展的第三階段，對立面在合題中得到統一。黑格爾由這個公式出發，把邏輯學分成三個部分，一論存在，二論本質，三論概念。存在論描述自我發展的觀念首先以絕對抽象的“純存在”的形式出現。純存在還沒有任何規定性，它實際等於“虛無”；而虛無和純存在是矛盾的，虛無否定了純存在，就產生第三個範疇——生成。生成的範疇又轉化為質，即某種有規定性的存在。在以後發展中，質又過渡到自己的反面——量，質為量所否定而統一於“度”，度是存在的最高階段。在這一章中，黑格爾表述了關於質到量和量到質的過渡的辯證法思想。但是黑格爾所講的存在，並不是普通的物質存在，而是絕對抽象的純存在，他所講的質和量也不是普通事物的質和量，而是指精神發展的一定階段，許多地方令人不解。第二部分本質論描述自我發展的觀念並不停止於存在的階段上，它否定了存在而作為本質出現，這時精神得到更深刻具體的規定。黑格爾先考察本質自身，即作為存在的根據的本質（正），然後考察本質的現象（反），和現實（合）。在這一部分中，黑格爾指出，本質和現象是互相聯繫的範疇，本質顯露在現象之中，並批判了康德把本質與現象分割的錯誤；他又研究了矛盾的學說，認為矛盾存在於本質的內部，矛盾是一切運動發展的根源；這些都是含着光輝的思想。但是唯心主義者黑格爾所講的本質並不是真實事物的本質而是邏輯概念的本質，所講的矛盾也不是事物的矛盾而是指概念的矛盾，所講的現實也不是真實的東西而是概念的東西，都是令人難解的。邏輯學第三部分是關於概念的學說。黑格爾認為概念之為物，比本質和存在高，它是實在世界的真理，並為構成一切存在物的創造性的源泉。他按照否定的否定的規律，把概念的發展，分為主觀性（正題），客觀性（反題），和觀念（合題）三種表現。在主觀概念一章中，黑格爾考察了關於概念，判斷，推論的問題，他認為概念的各個環節是普遍，特殊，和個別；這些環節發展為各種深度不同的判斷；概念和判斷的統一是推論。在這裡，黑格爾批評了形式邏輯，而企圖建立起不同種類的判斷和推論之間的內部聯繫。在概念的主觀性表現之後，便進入客觀性的表現階段。客觀性包含有三種形式：機械性，化學性，和目的性。按照我們的看法，先有客觀存在，然後人才可在研究這客觀存在的基礎上創造出它的概念，判斷，推論。黑格爾則相反，他認為先有精神，概念，而後有自然界，社會；這是他的明顯的唯心主義的歪曲。總之，黑格爾在邏輯學中所考察的，只是在純粹狀態中的觀念，他主要是敘述觀念的辯證法，即觀念從低級狀況到絕對完善狀況的邏輯發展過程。在他的邏輯學中，觀念是作為能動的力量出現，觀念是主體，因為它是能思維的，觀念又是客體，因為它是被思維着，觀念是思想者又是被思想者，它是主體與客體的統一。觀念展開它所固有的那些邏輯規定，即認識自己本身。黑格爾把發展看成觀念的發展，把認識看成觀念，精神的自我認識，而不看作物質世界的反映。他提出的辯證法諸規律，如對立面的鬥爭，質量互相轉化，否定之否定，等規律，都是從觀念自身中抽引出來的，並不是從自然和歷史中抽引出來的。由此就產生他的虛妄的思想體系：認為世界——不管它願意不願意——必須削足適履地遵照他的邏輯體系。實際上，邏輯的體系只是人類思維發展在一定階段上的產物。他把純思想的，觀念的邏輯當作物質世界發展的源泉和基礎的說法，實是無稽之談。所以列寧說：“不能原封不動地應用黑格爾的邏輯；不能把它現

成地搬来,要挑选出其中逻辑的(认识论的)成分,清除掉它的观念的神秘性,这还是一项巨大的工作。”(“哲学笔记”,中译本,第 770 页。)

到了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不仅在哲学中引起了伟大的变革,而且在逻辑领域内也引起了伟大的变革。马克思,恩格斯概括了认识和实践的全部历史,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在这个基础上第一次深刻地研究了作为人类认识的强有力的工具的唯物辩证法。唯物辩证法是以彻底的唯物主义世界观为基础的認識方法,它是马克思,恩格斯在按照自然界和社会的本来面目来研究自然和社会时,从而发现物质世界发展的最一般规律,即物质运动的一切形式所固有的规律,并随即把这些最一般规律转过来当作认识客观世界和改变客观世界的方法。这一能够揭露自然和社会的最一般规律的唯物辩证法,同时也就是最高级的逻辑方法。唯物辩证法并不取消旧的,在康德以后通常被叫做形式逻辑的亚里士多德逻辑。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曾不止一次地指出研究形式逻辑的必要性,强调形式逻辑在制定科学思维基本规则过程中的巨大作用。但是他们同时要求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对形式逻辑作适当的修正,这些修正必须肃清许多世纪来形式逻辑所遭受到的唯心主义的和形而上学的歪曲。他们会详尽地研究形式逻辑的地位,认为形式逻辑并不是唯一可能的逻辑,而只是逻辑的低级阶段,如恩格斯所说,是“逻辑的初等数学。”他们并讨论过形式逻辑和辩证法的相互关系。如恩格斯写道:“形式逻辑首先也是寻找新结果的方法,由已知进到未知的方法,辩证法也是这样,只不过是处在更高的阶段上罢了;而且,辩证法突破形式逻辑的狭隘的眼界,在自身中包含着更广大的世界观的萌芽。”(“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版,第 239 页。)恩格斯在另一书中又写道:“辩证逻辑和旧的纯粹的形式逻辑相反,不像后者满足于把各种思维运动形式,即把各种不同的判断与推论形式列举出来,或无丝毫关联地排列起来。相反地,辩证逻辑却以此推彼地推出这些形式,不把它们互相平行起来,而使它们互相隶属,从低级形式中发展出高级形式。”(“辩证法与自然科学”,人民出版社 1953 年版,第 66 页。)因为马克思主义的辩证逻辑是跟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相一致的,它“不是关于思维的外部形式的学说,而是关于一切物质的,自然的和精神的事物的发展规律的学说,即关于世界的全部具体内容及对它的认识的发展规律的学说。换句话说,逻辑是对世界的认识的历史的总计,总和,结论”。(“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版,第 67 页。)列宁并曾指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逻辑的基本思想说:“辩证法逻辑要求我们继续深入要真正认识对象,就必须把握,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我们不会完全做到这一点,但要求全面性可供我们防止错误和防止僵化,这是第一。第二,辩证法逻辑要求从发展,自己运动(如黑格尔有时所说的)和变化来观察事物。……第三,必须把全部的人的实践——不管作为真理的标准也好,作为对象与人所需要的东西之联系底实际规定者也好,——包括在对象底完全的定义里面去。第四,辩证法教导我们,抽象的真理是没有的,真理永远是具体的。……”(“再论职工,目前形势及托洛茨基与布哈林的错误”,见“列宁论职工会”,工人出版社 1950 年版,第 156 页。)因此,辩证法逻辑就好像是逻辑的“高等数学”;它提供给研究者以正确而又强有力的武器,使他能从客观世界的全部复杂性中,从其发展和变化中,从一种形态向另一种形态的转化中,从低级形态到高级形态的转化中,来认识客观世界。所以从十九世纪后半期起,唯物辩证法,不仅在无产阶级革命的阶级斗争范围内,亦不仅在社会科学的领域内,而且在自然科学的领域

內，都已成为必要；它已成为研究和認識真理的强大工具。

总而觀之，我們从上面列举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以前几种著名的邏輯理論來說，即可見到科学的邏輯在历史上的每一进步，都是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取得的，并且是在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的斗争中取得的。如亞里士多德的邏輯学即是在他对大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作广博的研究中和在反对柏拉圖的唯心主义以及当时的怀疑派詭辯派的斗争中成長起来的。培根和笛卡兒的新邏輯理論則是在反对中世紀經院哲学和保衛当时新兴的自然科学的斗争中产生出来的。至于馬克思、恩格斯則由于从徹底的唯物主义立場出發，深刻地評判了黑格尔和康德的邏輯学，致能創制出唯物辯証法，將邏輯科学放在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主义反映論的坚固基础上，并为今后邏輯問題的科學改造，为思維形式和規律的研究，建立了良好的基础。至于唯心主义者虽也曾大力研究邏輯，可是由于他們在哲学基本問題的解决上采取的观点，歪曲地理解客觀世界的实际情况和人类思維的真实本質，所以像經院学派和康德就把邏輯研究引导至跟自然脫离，跟生活脫节，并跟認識內容無关的純粹形式主义的偏向中去。而黑格尔的概念辯証法則走向神秘難解的迷霧中去。

#### 四

从上面数节的分析，我們得出兩点論断如次：

(一)邏輯和哲学的关系甚密切乃是無可爭辯的事实。任何想把邏輯变成不依赖于任何哲学世界觀的科学的企圖，特別是不依赖于認識論的，而似乎完全独立的科学的企圖，都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事实很明显，在历史上所有的邏輯理論無一不是和一定的世界觀相联系的。思維的邏輯形式和規律縱然沒有階級性而是全人类性的，然而解釋邏輯形式和規律的起源和本質的理論，总是或立足于唯物主义哲学或立足于唯心主义哲学。其理由在于邏輯這門科学是以确定答复哲学基本問題，即思維与存在的关系問題为出發点的。換句話說，邏輯必須在唯物主义世界觀和唯心主义世界觀的对立中选择一种作为理論的基础，不能有何例外。而世界觀的階級性質是能够提供給人們一定方向并能以一定方式指導人們去完成階級任务的。邏輯研究者在确定某种世界觀为出發点之后，即很自然地按照階級的利益，按照自己怎样利用邏輯的企圖來講解邏輯，來改造邏輯，務使邏輯成为合于自己的目的，适合于推广自己的思想体系。因此唯心主义者制定有唯心主义的邏輯，如康德邏輯，黑格尔邏輯是。唯物主义者也制定有唯物主义的邏輯，如亞里士多德，培根的邏輯，和馬克思主义的辯証邏輯是。那些宣揚邏輯沒有階級性从而認為一切人們都是遵照同一邏輯進行思考的說法是太天真了。事实上康德主义的拥护者如新康德派即系遵照康德的邏輯進行思考的。美帝国主义分子即系遵照美国实用主义的“工具”邏輯進行思考的。至于革命的工人階級即知道必須运用馬克思主义的辯証法邏輯進行思考。邏輯本身原是一門工具性的科学，它落在什么階級的人手中就須得为什么階級的人服务，它在过去和現在都是推广某种世界觀的工具。

(二)又可看到：恩格斯將哲学家依其如何解决哲学基本問題而划分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兩大陣营这一事实的論証，不仅是对于研究哲学發展的历史有巨大的意义，而且对于研究邏輯發展的历史也具有巨大意义。在哲学史方面，日丹諾夫在“西欧哲学史討論會上的發言”中規定“哲学史就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这一規定已成为馬克思

主义哲学史方法论的基本原则(詳載“苏联哲学問題”,新华書店,1950年版,第5頁。)在逻辑史方面我們认为这一方法论不仅指明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的斗争,也是逻辑发展的基础,而且还可教导人們在逻辑史上派別紛歧理論龐杂的迷雾中,可以找到分析各种逻辑理論的准則。因为从哲学家对于思维和存在的关系問題作出的解决方法来考察他們所建立的逻辑理論,就便于高瞻远瞩地看到每一理論的本質是什么,它所由产生的前提是什么,立場观点何在,对于認識世界能起什么作用,等等,从而就可望对它們作出正确的估价。

試再举流行国内甚久的穆勒名学为例。穆勒于1834年出版了“逻辑的体系”,在此書中,我們若是仅仅看他研究了科学归纳法的几个主要方法(即合同法,差異法,同異併用法,共变法,剩余法),并将这几个方法的逻辑公式制定出来,本可肯定他在归纳逻辑史上作出了显著的貢獻。但是我們若从他对哲学基本問題所作的解决来考察他的逻辑理論的理論基础,即可清楚地看到穆勒企圖用貝克莱和休謨的唯心主义观点来解釋逻辑,其結果不仅妨碍了他正确解决逻辑問題,而且还使他陷入了明显的非逻辑論。因为貝克莱的唯心主义的感觉論认为,感觉是認識底最可靠的和最后的根源,認識是各种感觉的結合而不是客觀事物本来面目的反映。休謨的不可知論认为,一个人所感知道的只是自己的感觉,超乎感觉以外,就不能知道有什么东西存在。休謨停止在現象的此岸,拒絕承認感觉以外有何确实可靠的东西,他既不承認有物質的本体,而且不承認有一般概念。穆勒附和着貝克莱和休謨的观点,宣揚实証主义,反对研究本体論問題,贊同科学知識不超出个人自己的感官印象的界限,而把人的經驗完全归结为各种主觀的感觉和观念的总和。他并认为人們心中所思所想的,从来不是什么一般的或普遍的东西,而只不过是些具体事物的意象的名字,名称;这些名字,名称全由人的心理联想建立起来,并不反映什么客觀事物的真实本質。于是在判断論上,穆勒认为那些以普遍概念作为主詞和宾詞而成立的全称判断并不是真实的,它們并不表現着什么科学規律性。在他看来,现实世界总是呈現着某种个別的东西,我們关于现实的知識只是些零碎的經驗,它們都表現在單称判断中。所謂全称判断只不过是許多單称判断的总和,由集合許多个別事物的簡單記載积累而成,在它們本身中并不反映什么普遍真理,其作用仅在于为着記憶的方便而已。于是在推理問題上,穆勒就發揮了一种理論,认为一切推理的过程,都可归结为从特殊到特殊的思维方式。不独归纳推理的过程是从特殊到特殊,而且认为演绎推理的过程也是从特殊到特殊,而不是从一般到特殊。他认为構成三段論大前提的全称判断只不过是关于所观察过的許多特殊事实在人的头腦中的簡單記錄或符号,而这些东西之所以表述为一般規則,全称命題,只不过是为了更好地記住这些特殊事实而已。穆勒因此否認了三段論式在認識过程中的作用,断言三段論式不能求得任何新知識。实则穆勒是根本歪曲了一般和特殊的区别和关系,抹杀了一般性在特殊中存在的事实,錯誤地以为一般性不过是特殊性的总和。这一錯誤理論的結果,不仅否認了三段論式推理的可靠性,否認了从較大一般到較小一般性的演绎推理底可能性,同时也导致不能說明归纳推理的本性。因为如果一般性不存在于特殊个体中,如果一般性不和特殊个体密切联系,則从个体与特殊中,也决不能用任何归纳的逻辑手續弄得出一个普遍定律来。穆勒用狹隘的經驗主义思想来解釋逻辑,結果只有导致曲解逻辑而已。

在最近十九和二十世紀，曾出現了許許多多研究邏輯的著作。對於這些著作，我們若從哲學基本問題的解決方法來加以考察，亦可見到所有忽視馬克思主義哲學，把自己的理論建立在康德，黑格爾，貝克萊，和休謨的學說上面的那些邏輯，都走向了唯心主義和不可知主義的領域中去。他們無論對邏輯科學基礎本身的解釋，或者對邏輯規律的解釋，根本上都是錯誤的，唯心主義的和形而上學的。如實證主義的代表們武斷地說，邏輯的規律，規則和方法，仿佛都是隨便製造的，是可以廢除和加以改變的。某些資產階級哲學家甚至鼓吹“非邏輯論”，認為邏輯規律對於思維是累贅的東西，而思維似乎應該立足于直觀，非理性的直覺上面。他們企圖以人的混亂的主觀印象，體驗，以對自然現象的盲目服從等等來代替邏輯思維。

對邏輯問題進行這種唯心主義的偽造，是有其階級的和認識論的根源的。當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把現代資本主義引上它的歷史末路時期，帝國主義的思想代表就出來否定自然，社會和思維的規律。他們為了保護資本主義的基礎，就唯心主義地宣揚周圍世界是幻影，是感覺的總和，或者甚至是理性底任意的詞句和邏輯的構造的總和。因此在研究邏輯的發展歷史的進程中，批判和揭露現代資產階級的唯心主義在邏輯方面所作的種種曲解和偽造，將是一個必要的任務。

1957年11月10日



# “孙子”十三篇校箋举要

楊炳安

“孙子”是我国古典軍事哲学中最傑出的作品，也是具有世界影响的作品，特别是对东方。它不但在軍事艺术上，而且在哲学思想上，都給我們留下了丰富而宝贵的遗产。

在學習过程中，我發現各种本子在文字上的差别很大。“十家注”系统与“武經七書”系统二者之间的差别自不必說，即二者之中的各書也不尽至同；其中虽然大多只是文字上的出入，但也有很多是与原意有关的。因此，我想，縱然我們不能等到有一个大家都認為准确的文字之后才开始对它思想內容的研究，但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假若我們能有一个准确的或接近准确的、可以作依据或基本上可以作依据的文字作基础，那末，这对我們研究孙子的思想內容不是更有好处嗎？当然，这个工作还要依靠这方面的專家去进行。我在这里之所以班門弄斧地把在这方面工作的一些結果發表出来，决不是想冒充什么專家；我之所以这样作，是由于我感到必要，是由于我想給專家們提供一些不成熟的参考性意見，是由于想把意見提出来以便通过批評討論使一个較好的訂本能够早日产生出来，以利这方面研究工作的更好开展。

在正式談及正題之先，我想先簡略地說一說“孙子”流傳的情况和一些重要書的版本，并附帶地提一提它們在校訂“孙子”十三篇文字的工作中的作用和地位，——关于这些，需專文評述，在此只略略提及而已。

关于“孙子”的作者与著作时代，还是一个尚未获得最后解决的問題，不过我們可以肯定的，就是孙子書在战国末已相当流行。“韓非子”五蠹篇云：“今境内……藏孙、吳之書者，家有之。”至汉，“世俗所称师旅，皆道‘孙子’十三篇”（“史記”孙吳列傳）。由此可知，在此期間，不但孙子書很流行，而且流行的只有十三篇。大概，这十三篇就是“孙子”本文或很接近本文的东西。不过，此后情况就發生了变化，附益的人越来越多。到后汉孝、成間，任宏論次兵書，定箸“吳孙子兵法八十二卷，圖九卷”（見“汉志”），这就是說，“孙子”除十三篇之外，又被附益了六十九卷和圖九卷。这些附益的东西，也都先后亡佚，只有一少部分还散見在“通典”（有孙子与吳王問答）、“周礼”郑注（有孙子八陣圖）、“御覽”（有孙子兵法杂占）、“隋志”（有孙子战斗六甲兵法）与“新唐志”（有三十二壘經）等書中；“文选”六臣注与何延錫注文也保有孙子佚文，但也多不同于十三篇本文，而十三篇本文却很幸运地被保存下来（当然究竟是否十三篇本来面目，还值得研究），而这个功劳就不能不屬於魏武帝曹操的了。曹操，一般人都說是注解“孙子”最早的人（注存“十家注”），“孙子”十三篇就从而賴以保存。他的注本名叫“孙子略解”。“略解”本文后被收入“武經七書”，注文被收入“十家注”，不过也有单独流傳的本子，而且在清代为最多，如四庫本和“孙、吳司馬法”本等；至于它的校本，明有刘寅，清有孙星衍，等，不过孙校本已受“十家注”的影响而改变了本来面目，北京圖書館藏有膠片。

曹操以後，注家紛起，魏有王凌、賈翔、張子尚，吳有沈友，惜其書皆佚。六朝時，有梁孟氏“解詁”，存“十家注”。

唐代注家很多，計有李荃、杜牧、陳暉、賈林等人，其注皆存“十家注”。魏徵所輯“羣書治要”（卷三十三）也有引錄，而引錄最多且加以注釋的則是杜祐的“通典”（卷一百四十八至一百六十三），此外，還有虞世南的“北堂書鈔”（卷一百一十五與一百一十六）。“治要”、“通典”與“書鈔”皆為引錄“孫子”較早的書。“治要”為節錄，所錄無多，但出入不少，不過這些出入多無甚重要，故在校訂工作上的地位不算十分重要，其版本當以叢刊本為善。至於“通典”，情況即有所不同，十三篇幾乎全被抄引，它在校訂工作上的重要性遠遠超過“治要”和“書鈔”，清孫星衍校訂“十家注”就是以其為主要依據的。但是，對它的引文，也需具體分析，因為杜氏改動之處很多（見下文可知一二），孫星衍在這一點上就表現有某種程度的盲目性。“通典”的版本當以四庫抄本或殿本為善，一些殿本翻刻本也不錯，不過，明刊本錯誤很多。“書鈔”引文很少，除個別之外，也無太多重要之處。

對“孫子”的整理、研究工作，到宋代就進入了一個大發展的時期。這時期的注家有梅堯臣、王皙、何延錫和張預，其注皆存“十家注”。此外，就是在元豐間以魏武所注“孫子”十三篇本文為首的“武經七書”的頒行。這是一個劃時代的創舉。歷來儒家多以兵為詭道而不屑與論，但“孫子”等書却在宋代被規定為武生必讀之教本，而且還特設“博士”以總其事，何去非即當時之武學“博士”，施子美的“七書講義”即當時通用的武學教本。“七書”的本子當以何“博士”校本（按當即“續古逸叢書”宋版影印本）與宋朱服校本（原書已流落國外，今北京圖書館藏有膠片）為善。至於“講義”，古本不易見，不過，長慶日刊活字本也可用。“七書”、“講義”二者的文字都基本全同“略解”，但彼此也都有個別不同之處。此外，又有王彥“武經龜鑑”，惜已殘，今北京圖書館存有殘頁。在宋代，除頒行“七書”之外，就是“十家注”——“十一家注”的輯刊。吉天保輯曹操、孟氏、杜祐、李荃、杜牧、陳暉、賈林、梅堯臣、王皙、何延錫與張預等十一家之注為“孫子十家注”；實為十一家而云十家者，蓋吉天保不以杜祐為一家也。此外，鄭友賢也輯上述各家注為“十一家注”，此與前述“十家注”內容全同，一般皆稱“十家注”。至於版本，今北京圖書館有稽瑞樓所藏宋刊殘卷，這應是“十家注”最早的刊本了。“十家注”與“七書”較之，文字出入很大，二者也各有長短，都同是校正“孫子”原文所不可缺少的書。這裡，還值得說的，就是，在宋代，引錄“孫子”最多的中國有名的大型類書——“太平御覽”（卷二百七十至三百三十七，三百三十七以下也有個別引錄之處），它引錄“孫子”文字最多，但也最混亂。它的引文多本之“通典”，但比“通典”多，比“通典”亂，臆改者有之，誤刊者有之，同一句話兩處所引竟不同者也有之（見下文可知一二）。它的價值不如“通典”，不過，仍不失其在校訂“孫子”文字上的重要性；論其版本，當以清嘉慶鮑氏刊本為善，宋刊本（即叢刊本）雖古，但誤刊很多，明刊本也如此。此外，宋代重要兵學著作——曾公亮的“武經總要”（前集卷一至十一）也引錄“孫子”多處，也有些出入，不過重要之處很少；版本有四庫本與文淵閣本，以庫本為善。至於許洞的“虎鈴經”，引錄很少（主要在卷六以前），無甚可說。

在元代，關於“孫子”的研究，幾乎沒有什麼進展，見於著錄者，只有潘衍翁一人，且其書已早佚。明劉寅“武經七書直解”所說之張賁，當為元或元以前人，但今不易考。

“孫子”兵學到了明代有着進一步的發展，評注講釋者達五十餘家。劉寅的“武經七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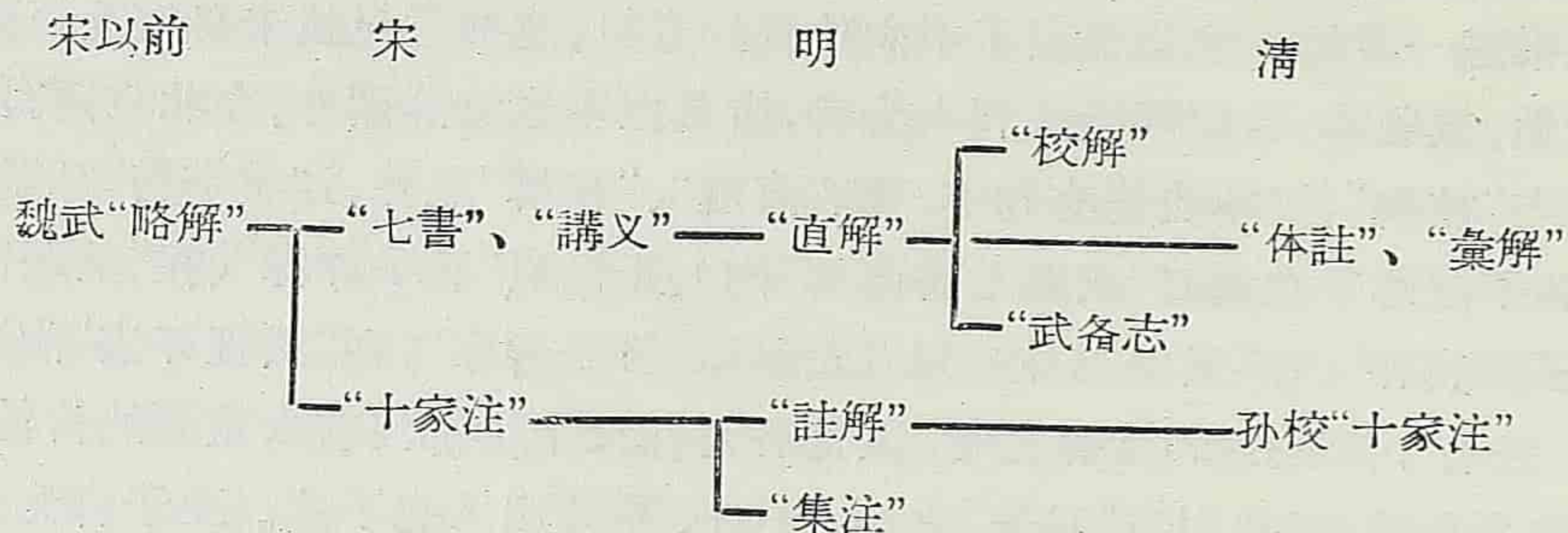
直解”和赵本学的“孙子校解引类”可以說这是这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在文字上，“直解”依張賁說也作了一些重要的校正，版本当以景印明本为善。至于赵氏“校解”，也称精湛之作，在校訂文字的工作上它的重要性当不亞于“直解”，因为它是在“直解”的基础上把这个工作向前更推进一步的。它也提出了不少独到的意見，这些意見虽未必完全正确可取，但也有参考价值。其版本，当以明隆庆刊本为善，惜其原本也流落国外，今北京圖書館存有膠片。“直解”与“校解”，日本也皆有刊本。除“直解”、“校解”之外，还有李贄“孙子参同”、張居正增訂“孙子直解”（在增訂“武經七書直解”內）、王世貞“孙子評釋”（在“兵垣四編”內）、茅元儀“孙子兵訣評”（在“武备志”內）以及黃猷臣“孙子开宗”（在“武經开宗”內）等，不过，除“武备志”还有个别独到的見解之外，其他各書在文字上都沒有太重要的价值。唐順之的“武編”（主要是前卷）也引有“孙子”之文，不过，重要出入也不多。至于郭光复的“兵机纂”，就更無甚可說了。关于“十家注”在明代的流傳，这里还值得一提。在明代，吉天保輯本有兩種重要的刊本，即嘉靖談愷校刊本与万历黃邦彥校刊本，此二刊本皆曰“孙子集注”。談本有叢刊本；黃本原書已流落国外，北京圖書館存有膠片。邦氏輯本至明，有正統道藏抄本，名曰“孙子註解”。“集注”与“註解”皆所謂“十家注”古本，二者当以“註解”为善，因“集注”有严重的錯簡現象。孙星衍所校岱南閣“孙子十家注”本，即是以道藏“註解”为母本的。

在清代，孙子兵学無甚重要發展，值得特別提出的就是孙星衍“十家注”的校刊。孙氏依据“通典”、“御覽”等書对道藏“註解”作了比較仔細的校訂。他的書不但在清代而且一直到現在还是比較广泛流傳的。我們不能抹煞孙氏在校訂“孙子”文字上的功績，但也必須指出，他的工作缺点也很多。他主要只根据“通典”、“御覽”，好像并沒有参考“武經”系統的書，而对“通典”、“御覽”的引文也缺乏足够的分析批判，且也有粗枝大叶的現象，“通典”誤而未指出者有之，“通典”不誤而改錯者有之，未經仔細考察而解釋錯誤者有之，臆改者也有之（見下文可知一二）。因此，我們在采用他的校本时，一方面需要尊重，同时也需要抱具体分析的态度。至于它的刊本，很多，而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多以嘉庆二年袁州觀察署刊本为善，这是孙校本較早的刊本，但也有疏漏之处，“地形篇第十”就有脫漏、重复与頁碼混乱等現象（見下文），該本被收入孙氏岱南閣叢書，此外又有光緒三年浙江書局刊本、光緒三十二年会稽东楼氏刊本、“二十二子”本、四部备要本与“諸子集成”本等。这些本子虽無嘉庆本之現象，但也有誤刻之处，例如將“杂于害”弄成“杂于善”等，不过一般說来，皆可用。在清代，除孙氏的工作之外，在“武經”系統各書方面，也有一些进展。除魏武“略解”这时期已逐漸脫离“武經”但仍屬“武經”的一个支系而单独流傳之外，值得稍微一說的就是夏振翼的“孙子体註”（在“武經三子体註”內）与朱壙的“孙子彙解”（在“武經彙解”內）。这两个書虽是“武經”、“直解”在清代的繼續，但学术价值与文字上的价值都不能与“直解”相比。此外，这时期还有陈玖的“孙子兵略評註”（在“七子兵略評註”內）、謝文洵的“兵法类案”（在“謝程山全集”內）、邓廷罗的“兵鏡备考”与汪紱的“戊笈談兵”（卷七）等。“淵鑑类函”（卷二百零六至二百一十八）与“古今圖書集成”（戎政典）也收录十三篇之文，前者多本“通典”，而后者則本“武經”，二者在文字上虽有少許改动之处，但重要者不多。

辛亥革命后，有刘邦驥“孙子淺說”与刘文屋“孙子釋証”等，不过也多無甚重要。張之純的“諸子菁华录”（卷十八）也收有十三篇之文。这个書，在內容上，不能算是很“菁华”，

不过,它在文字上却有不少独到的意見,这些意見虽未必完全妥当,但也有参考价值。

据上所述,关于“孙子”書的流傳情况,簡單地說来,有如下两个基本系統,如以圖示之,就是这样(自魏武“略解”始):



我們就是根据这两个系統的重要的書,同时还参照一些重要的类書和兵学書以及其他一些在文字上有参考价值的書,并尽可能选用一些較好的版本来进行校訂工作的。不过,由于篇幅所限,这里只能提出一些在我看来比較值得討論的意見,以供大家研究参考。再者,由于所引之書較多,若將每条所引皆加以附註,恐失之繁剩,故从略,必要时,可据上述各書所註篇卷查之。

为了参閱方便起見,我就逐篇摘要校箋了。

## 計篇第一

在第一篇中,文字出入虽不少,但問題不大,稍值得一提的,就是有关“五事”、与“計”的問題。

“經之以五事,校之以計而索其情”。“七書”、“直解”等“武經”系統各書如此,道藏“註解”、叢刊“集注”等“十家注”古本也如此,“武備志”、“兵垣”与“类案”等兵学著作也如此,赵本学“校解”与李贄“參同”也如此,一般孙子書皆如此,唯孙星衍依“通典”改为“經之以五校之計而索其情”。孙氏校改的理由有二:①“‘通典’古本如此”,因是固当从之;②認為“‘五事’与‘計’自是一事”,而且“其所重在‘計’”,故不应因注內有五事之言而改为“經之以五事”;若改,“則下文又有七事之語又可改为‘七計’乎”?

誠然,“通典”是引录“孙子”較早的書,我們在很多地方需要参照它来校正“孙子”的原文,但对它的引文也需进行具体分析,而不能彼云亦云,因为它对“孙子”十三篇的文字改动之处很多,而其中一种情形就是省文。有时,它把几句话干脆略去,有时則把几句合成一句,而有时甚至还把几个字略成一个字,例如:本篇之“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它就將其併成“能用而示之不能用”;“用間篇第十三”中之“昔殷之兴也,伊摯在夏;周之兴也,呂牙在殷”,它併成“昔伊呂之在夏殷”;本篇“道者令民与上同意”句末之“畏危”二字,而它則写成“倨”,等。“經之以五校之計”当系类似情况,当是“經之以五事,校之以計”的省文。至于“通典”之改动“孙子”原文,也許有下列几种解釋:①古人对抄引文字有时并不严格;②“通典”系节引“孙子”之文,是根据自己的邏輯系統把“孙子”十三篇中的話分別节引在有关題目之下,而不是自始至終全录“孙子”原文;③可能与体制有关,例如“五事”和“計”,它是分在两个地方引的,即卷一百四十八(叙兵)与卷一百五十(料敌),这样,在后者引“計”的时候,可能是为了避免突兀,于是就在第一句“校之以計而索其情”之前又加

“孙子曰：用兵之道”数字，而这几个字“孙子”各書皆無。它改“經之以五事，校之以計”为“經之以五校之計”，也可能与它把“五事”与“計”分开引有关。此其一。

再者，文中所述“五事”与“(七)計”固然是有密切联系的，——“計”为“五事”所生，但二者似乎并不完全相同，“五事”是要“索”之“情”的几个方面，是帶綱領性的东西，而“計”則是“索”“情”的標誌；而且，在“計”中又特別提出“兵众熟强”、“士卒熟練”，而这些在“五事”中并無明确体现。这也許正是孙子將这两部分的問題分別提出的原因。故以“五事”与“計”为一事且重在“計”而將兩句原文合而为一籠統地說成“五校之計”，理由恐怕是不充分的。

第三，參諸各家如曹操、李荃、杜牧、梅堯臣与張預之注文，皆有“五事”之語。孙氏謂“‘通典’古本如此”，好像就得如此，但魏武注比“通典”更早，又当如何呢？孙氏又謂不应以注中有“五事”之言而改其文，但注中“五事”之言恐怕正是对正文中所述五事之注釋。若因注中有五事之言而改其文为“經之以五事”，那末，下文又有七事之語是否也要將下句改成“校之以七計”呢？这是不必的，因为“計”就是指的七事，“計”在这里，或者由于傳統習慣，已經被理解为專名詞了。

第四，若为“五校之計”，在文字上也是不够通順的。

基于以上理由，故仍应依“七書”、“十家注”古本等書作“經之以五事，校之以計而索其情”，而不宜从“通典”与孙氏說。

## 作战篇第二

在第二篇中想提出討論研究的有下边三个問題：

(一)“其用战也貴胜，久則鈍兵挫銳。”“其用战也貴胜”，一般孙子書皆無“貴”字，“武經”系統各書与“十家注”各書皆如此。这样，就發生了句讀的問題。关于這個問題，历代各家意見都很分歧，而大体說来，分歧主要發生在“十家注”与“武經”两个系統的書中。“十家注”各注家皆以“胜”字断下，即与“久則鈍兵挫銳”連讀，作“其用战也，胜久則鈍兵挫銳”；而“武备志”、“校解”以及“开宗”、“体註”、“彙解”等書則断上，即与“其用战也”連讀，作“其用战也胜，久則鈍兵挫銳”。

由于句讀的不同，就产了对“胜”字解釋的不同。

持前一种見解的，虽具体說法不尽相同，但大都以“胜”为勝負之“胜”，杜牧曰：“淹久而后能胜。”賈林曰：“战虽胜人，久則無利。”梅堯臣曰：“虽胜且久。”另外，也有人由于感到“胜久”費解，而以“胜”为“胜衣胜冠”之“胜”，“胜”者，任也，“胜久”者，持久也。同时，也有人釋“胜”为“过”，“胜久者”，过久也。

持后一种見解的，即主張与“其用战也”連讀的，也有人感到与下文“久則鈍兵挫銳”不接而將其屬之上节，即屬之本篇第一节，作“孙子曰：凡用兵之法，馳車千駟，革車千乘，……然后十万之师举矣。其用战也胜”，以足該节之意。“武备志”即如此，“淺說”从之。也有人認為“胜”字上应有一“貴”字，赵本学即明确指出现：“‘胜’上疑脫一‘貴’字。”按：如將“其用战也胜”句断之上节恐不当，也不必要，因上节至“然后十万之师举矣”文意業已完足；而且若断上节，則本节自“久則鈍兵挫銳”起始，也甚感突兀。再，若有“胜”字，無論断上断

下，皆不自然，而以斷下尤為費解，“淹久而後能勝”、“雖久且勝”以及“勝衣勝冠”等，都覺生澀牽強。以“過”釋“勝”，固成一說，然古人很少如此用法。值得考慮的則是趙本學的意見。若作“其用戰也貴勝，久則鈍兵挫銳”，則正與該篇末節之“兵貴勝，不貴久”之文意全合，故宜從之。至於“勝”是否衍文，這當然也是可能的，而且若將“勝”字刪掉，也符合孫子本意，且文字也很簡淨，不過，似不如前者為勝。

(二)“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糧不三載。”“三載”，除“御覽”作“再載”(“諸子菁華錄”從之)之外，其他孫子各書多作“三載”。各家對“三載”的解釋是隨糧、繼糧、迎糧，即往則隨、缺則繼、歸則迎，但其中繼糧則是“因糧于敵”，故此“載”不計，如此，按照這種說法，“取用于國”之糧就是兩次即隨糧與迎糧兩“載”了。“糧不三載”者，看來，當然就是說諸侯出兵打仗只應向國人征發這兩次糧，而不應當征三次。但這裡似乎還有問題，就是：出兵打仗，必征糧餉以隨之，這是自然的，也是容易理解的，但是戰爭結束後軍隊回國還要特別向國人征發一次糧餉來載而迎之，這就是問題了。古時作戰回來，國人箠食糊漿以迎，這是常見的現象，但卻很少聽說為了歡迎歸國部眾而特別征發一次糧餉的。軍隊出征時，向國人征發一次；在敵國作戰，可“因糧于敵”，故不向國人征發；戰爭結束，軍隊回國，既不再向國人特別征發，如此說來，實際上向國人征發的糧食只應當是一次，也即劉寅“直解”所說的：“一饋糧而即止。”孫子主張速決戰，“久則鈍兵挫銳”，“屈力殫貨”，“國用不足”，無論從“籍”——人力方面說，或從“糧”——物力方面說，都主張只征發一次就解決問題，而不主張打“蘑菇”仗，以致一次不行再征一次。所以，這裡的“三載”似應作“二載”。原文本作“二”而被後人誤作“三”，於是各家皆以“三”字立說，這也是可能的。

(三)“殺敵者，怒也；取敵者，貨也。”按孫子各書“取敵者，貨也”皆作“取敵之利者，貨也。”這樣，這句話就費解了。歷來各家的解釋也多含混灰澀。杜牧注云：“使士見取敵之利者，貨財也。”劉寅“直解”云：“欲使士卒取敵之利者，當以其貨賞其心”，但對“利”字也皆缺乏明確的解說，而且對“貨”字的解釋也似有牽強之處。由於歷代各家對這句話很少提出過疑義，所以，我們很難一下子就肯定它一定有問題，不過為什麼不太通順呢？這裡似有兩種可能：一是原書“之利”二字為衍文，換句話說，就是原文本是“取敵者，貨也”。假若如此，那末，文意既明白通达，而文字又與上句“殺敵者，怒也”相對應。再一種可能就是或者由於輾轉刊錄的疏忽而將文字次序倒置，換句話說，就是原文本是“取敵之貨者，利也”而被誤為“取敵之利者，貨也”了。假若如此，文意也很明白通达——士卒爭相奪取敵人的財貨，是由於他們有利可圖。“取敵之貨者，利也”與“取敵者，貨也”的意思是基本上相同的，但其文字則不如“取敵者，貨也”為勝。姑作“取敵者，貨也”，以便進一步探討。

### 謀攻篇第三

在第三篇中想提出的有兩點：

(一)“故用兵之法：……敵則能戰之，少則能守之，不若則能避之。”該句主要問題是在“少則能守之”之“守”字上。“十家注”各本“守”皆作“逃”。“通典”、“御覽”、“書鈔”也作“逃”(“御覽”一引作“守”)。至於“武經”系統各書，也混亂不一：“講義”、“直解”作“逃”，而“開宗”、“體註”、“彙解”則作“守”。只就魏武注本而言，也不一致：孫校本作“逃”，

而刘寅校本則作“守”；長恩書室本作“逃”，而四庫本則作“守”。一般兵学書也不一致：“武备志”作“逃”，而“兵垣”、“类案”与“談兵”則作“守”。赵氏“校解”作“逃”，李氏“参同”則作“守”。其分歧竟如是。再察諸各家注意，也莫衷一是。曹操云：“高壁坚壘，勿与战也。”李荃云：“量力不如，則坚壁不出。”杜牧云：“兵不敌，当避其鋒，……敌人求挑不出也。”如此說来，則原文似为“守”字，但以杜祐、賈林之說觀之，則又似作“逃”字。杜祐云：“彼之众，我之寡，不可敌，則当自逃，守匿其形。”賈林云：“逃匿兵形，不令敌知。”大凡作“逃”字者，皆以“匿”釋之。但若作“逃”，則覺与下句“不若則能避之”之“避”字意思重复。“逃”者，匿也，“避”者，避其鋒，也匿也。故似宜作“守”字。如作“守”，則正于“形篇”之“守则不足”意合。但如作“守”，这里还有一个問題，就是是否与“不若則能避之”句下之“故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的“坚”字意思相碍。当然，如依施氏“講义”所說，若以“坚”为坚守，則前边說众寡不敌則守之，而下边接着就說假若坚守那就要作强大敌人的俘虏，二者当然有矛盾，但問題是“坚”字应否作“坚守”解。按此处之“坚”字似不宜作坚守解，而应作坚战解，“直解”如此，李荃、張預之說也如此。如以“坚”为坚战，那就不但沒有矛盾，而且还更丰富發展了上文的意思。

(二)“軍之所以患于君者三”。按該句，“七書”、“十家注”、“校解”等一般孙子書皆作“君之所以患于軍者三”，唯“直解”作“軍之所以患于君者三”，“体註”、“談兵”从之。此处之“于”字似与“虚实篇第六”“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之“于”字同格，而此句的意思是指“君”对“軍”的危害而不是指“軍”对“君”的危害，如作“君之患于軍”，則其意思就变成軍隊对国君的危害了。故宜从“直解”作“軍之患于君者三”。

## 形 篇 第 四

在第四篇中有兩個小問題：

(一)“古之所謂善战者，胜于易胜者也。”“御覽”作“古人所謂善战者胜，胜易胜者也”（“人”或系誤刊，姑勿論），孙校“十家注”本从之。按如依“御覽”，則“胜”、“胜”二字即覺失之累贅，二字連讀，更不成文，故此当系“御覽”重誤或臆改。这种情况在“御覽”引文中屢見不鮮，如“作战篇第二”之“近师者貴卖，貴卖則百姓財竭，財竭則急于丘役”，“御覽”引作：“近师者貴卖，貴卖則百姓虛，虛則竭，竭則急于丘役”；又如“謀攻篇第三”之“不知三軍之权而同三軍之任，則軍士疑矣”，“御覽”引作“不知三軍之任权而欲同三軍之任，則軍士复疑”。此句或屬类似情况。孙氏不察，相沿致誤，也系可能之事。按孙子各書除“御覽”与孙校“十家注”之外，“武經”系統各書与“十家注”古本皆作“古之所謂善战者，胜于易胜者也”，宜从之。

(二)“故其战胜不忒；不忒者，其所措胜，胜已敗者也。”“其所措胜”，“十家注”各本作“其所措必胜”，有“必”字，而“武經”系統各書以及其他孙子書則皆無“必”字。按似以無“必”字为是。“其所措胜，胜已敗者也”，即如李荃、杜牧、施子美等人的解釋，是置胜于已敗之师的意思；若如此，則“必”字不但为多余，而且还妨碍了文意的發展。“其所措胜，胜已敗者也”是对“不忒者”所作的解釋，但若有“必”字，則“其所措必胜，胜已敗者也”即不能如“其所措胜，胜已敗者也”那样作为对“不忒者”的解釋，而在其內部又發生了新的变

化,即“勝已敗者也”又成為“其所措必勝”之解釋了,換言之,就是:“其所措必勝(者)”,“勝已敗者也”。這樣,連起來說,就是:“不忒者——其所措必勝(者),勝已敗者也”,或者是:“不忒者,其所措必勝;其所措必勝(者),勝已敗者也”,不過這樣都覺得似乎不太好,故去“必”字。

## 勢篇第五

在第五篇中有三個小問題:

(一)“鷺鳥之击,至于毀折者,节也。”“击”字,“十家注”各本作“疾”,“武經”系統各書也作“疾”,“武備志”等一般兵學書也作“疾”,“通典”也作“疾”,只有“御覽”作“击”。參諸各家注意,除李荃、王皙之外,皆作“击”字解。曹操云:“發起击敌。”杜祐云:“發起討敌,如鷹鷂之攫搏也。”張預曰:“鷹鷂之擒鳥雀,必节量远近,伺侯审而后击。”有人說“鷺鳥之击”是指鷹鷂搏鳥雀,但也有人說是人獵鷺鳥,不管怎麼說,總之都是搏击的意思。杜祐引王子曰:“鷹隼一击,百鳥無以爭其勢;猛虎一奮,万兽無以爭其威。”孫氏引“呂氏春秋”曰:“若鷺鳥之击也,搏攫則墮。”又,“吳子”曰:“發之鳥击。”“淮南子”兵略訓曰:“飛鳥之擊(击)也,挽其首。”“越絕書”云:越王勾踐自會稽歸,附循士民欲以報吳,大夫逢同曰:“鷺鳥之將击也,必匿其形。”皆作“击”。故應依“御覽”作“击”,孫氏也謂“当作‘击’”,不過,他的正文并未改,不知何故。

(二)“以利动之,以卒待之。”“卒”字,“武經”各書皆作“本”,“校解”、“參同”、“武備志”同,趙氏且云:“一本‘本’作‘卒’字,非是。”但“十家注”各本則作“卒”,“御覽”同。參諸各家注意,也多作“卒”解。梅堯臣曰:“以精卒待之。”王皙曰:“严兵以待之。”何延錫曰:“以所待之卒击之。”張預曰:“以勁卒待之。”故應依“御覽”、“十家注”作“卒”。“卒”、“本”形近,原為“卒”而被誤傳為“本”,也未可知。如作“本”,固也成說,然其文意即覺生澀費解,即如施氏所謂“致敌之术”,劉氏所謂“吾之步騎或正或奇,务在必勝”,趙氏所謂“本者,實也,……以詐乱、詐怯、詐弱之利待之,以真治、真勇、真強之本待之”,這些說法也都失之玄虛牽強,未可从。

(三)“故善战人之势,如轉圓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一般孫子書皆如此,唯“菁華錄”作“故善战人之势,如轉圓石于千仞之山;轉圓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且云:“原本無‘轉圓石于千仞之山’疊句,今按不加此句則上下兩‘势’字相碍。”它不但肯定地說:“当系脫文無疑”,而且还严厉批評孫星衍“于此不補正而仍之,亦太疎略矣”。按“菁華錄”的這種說法也并不是毫無道理的,不過,也似乎近于臆說,缺乏充分根據。孫子書皆如此,而且歷來各家也皆未置詞,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要改動它的原文,非有強硬的令人信服的根據或理由不可。古人行文簡練,可略者則略,這種情況,十三篇中也往往有之,如“形篇第四”末句“勝者之战人也,若決积水于千仞之谿者,形也”就是如此,這句話,要按照“菁華錄”的說法,那就也應當改為:“勝者之战人也,若決积水于千仞之谿;決积水于千仞之谿者,形也”,但從未有過任何一個人——包括張之純在內——認為必須這樣改的。故不從“菁華錄”說,仍依“武經”各書以及“十家注”、“通典”、“御覽”等書,不疊句。



## 虛實篇第六

在第六篇中也有三個問題值得提出：

(一)“出其所不趨，趨其所不意。”“七書”、“講義”、“直解”等“武經”各書如此，“校解”、“參用”以及“武備志”等書也如此，“十家注”古本也如此，唯孫校本依“御覽”改“不趨”為“必趨”，且云：“原本作‘不趨’，按上文諸家注則作‘不趨’者，誤也。”這雖也系一字之差，但也需加以討論，因“不趨”與“必趨”就二者本身的意思來說，是完全不同的兩個東西。

這裡，我們首先應當了解的，就是軍事鬥爭是一種最尖銳最複雜的鬥爭，因此，某些基本的原理原則雖帶有普遍性，而對具體策略的運用則不能墨守成規，孫子也曾特別強調指出說：“戰勝不復而應形於無窮”，“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為之神”。對同一個問題，對同一種思想，在這裡是一種提法，而在另外一個地方則又是一種提法。譬如孫子在“形篇第四”中指出：“勝可知而不可為”，而在本篇則又說：“勝可為也”。這乍一看來，當然是有矛盾的，為什麼又說“不可為”而又說“可為”呢？我們能不能因為前者既說“不可為”而也就不分青紅皂白地為求表面上文字的一致而將後者“可為”之“可”字上也加一“不”字呢？這是不可以的。為什麼呢？因為這些話是孫子在不同的場合在不同的情況下說的。前者像是說作為主體的人即孫子所謂“善戰者”，在作為觀客存在的戰爭規律面前，只能發現或認識（即“知”）這個規律，而不能創造或從根本上改變（即“為”）這個規律，故云“不可為”；而後者則又像說假若我們能認識並能動地掌握這種規律，那末我們就能夠獲得勝利，就能作到“敵雖眾，可使無斗”，故云“勝可為”。孫子在這裡提出了雖很朴素但又多么生動的辯證法思想，而這種思想往往不是過去一般持腐儒之見的人所能理解的。“御覽”以“不”作“必”，因無注說，故不知為有意改動抑或無意刊誤，茲不必說，而孫氏則明白指出改動的原因是上文（按指“安能動之”）注文皆作“必”故而此處也應作“必”，不然就上下文有矛盾。我認為孫子這裡所說的是一件事情的兩個不同方面，這兩個不同方面，如果把它們分開來看，表面上就變成兩件事了，但它們彼此却有着密切的聯繫，而最基本的聯繫則是二者都是為了能夠爭取獲得戰爭勝利。若說二者也有不同之處，那只是意味着在爭取獲得戰爭勝利的總目標下，在不同情況下，可使用不同的策略原則，可通過不同的途徑罷了。有時，當敵人安穩駐紮的時候，我們需要擊其所愛，攻其必救，來擾亂它，使它招架疲奔，力量消耗，而有時則需要出其不意，攻其空虛，使他卒不及防而一戰成功。很明顯，這兩件事，是不同的，但也是不矛盾的，只有從表面上看或單純從文字上看才是有矛盾的，好像既說“安能動之”，就不能說出其“不趨”，其實問題不是這樣的。

其次，假若依孫氏所說作“必趨”，那末我們還可發現第二個問題，就是它與下半句“趨其所不意”的意思却有了矛盾。我們說它有矛盾，是指它在同一句話中出現了兩種相對立的思想。很明顯，既是“必趨”，那就不能是“不意”，既作“不意”，那就不可能是“必趨”了。如作“必趨”，不但與“出其所不意”句矛盾，而且與下邊的文意也有矛盾。假若出兵向敵必趨之地，那如何能夠如下句所說“行千里而不勞”呢？如何能如“行於無人之地”呢？“攻而必取”者，是由於我們“攻其所不守”，假若我們攻其所必守，那也就不一定能夠“攻而必取”。

了。所以孫氏之說未可從，應作“不趨”。這裡，還附帶說一下，下文還有“攻其所必救”，但此句與“安能動之”之語相類，也別為一事，故也不能因此處有“必”而謂前者也作“必”，茲不贅述。

(二)“以吾度之，越人之兵雖多，亦奚益于勝哉？”這一句，“吾”字也有作“吳”字者，不過，關於這一點就不多說了，因對文意關係不大。這裡，對“亦奚益于勝哉”想簡單地說一下。“十家注”各書此句皆作“亦奚益于勝敗哉”。按孫子這句話的意思是說戰爭勝負的決定因素不在兵眾數量之多少，兵多不一定就能打勝仗，不一定對戰爭的勝利就有所補益。假若我們的了解不錯，那就不宜有“敗”字，若有，那末這句話的意思就變成“兵眾雖多，對戰爭的勝利和失敗不一定有所補益”了。說兵多，對戰爭的勝利不一定有所補益，是可以的，但若說兵多對戰爭的失敗不一定有所補益，這就有点儿欠通了。故此句應依“七書”、“直解”、“校解”、“參同”、“武備志”、“開宗”、“體註”等書作“亦奚益于勝哉”，無“敗”字。

(三)“策之而知得失之計，候之而知動靜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該句主要的問題是在“候”字上。按“候”字，“七書”、“講義”、“直解”、“校解”、“參同”、“武備志”等書皆作“作”，“十家注”各本也作“作”，只“通典”、“御覽”作“候”，“武編”同。各注家的意見也很不一致，杜牧、陳皞、張預作“作”，而李荃、賈林、王皙則作“候”。按若作“作”，則覺生澀難懂，即如杜牧解作“激作”，或如“菁華錄”解作“振動”，也不免失之牽強。但若作“候”，則不但文字明易順達，而且更合該節原意。但如作“候”，其意是否就像李荃所說的“候望云氣風鳥人情”呢？這樣解釋也未必恰當。“候”者，斥候也，偵察也；“候之而知動靜之理”，就是說：要想了解敵人情況，那就進行偵察工作，這不是很自然的嗎？

## 軍爭篇第七

在第七篇中也有幾個問題：

(一)“軍爭為利，軍爭為危。”“軍爭為危”，“七書”、“講義”、“直解”、“校解”、“參同”、“兵垣”、“武備志”、“類案”、“談兵”等書皆作“眾爭為危”，“通典”與鄭友賢“遺說”同，而“十家注”各本則作“軍爭為危”。作“眾爭為危”者，多以“眾”與“軍”相對。施氏謂“軍爭”為“分軍而爭”，“眾爭”為“眾軍而爭”。劉寅謂“眾”為“大眾”。趙本學之說意同劉寅，但說得更明確，他說：“按部伍而行則為軍，不按部伍而行則為羣眾。”按此說固也有理，但恐未必全合孫子本意。孫子在這裡用了很多文字來闡發的是這種基本思想：在全面估計戰爭之兩個不同而又相關的方面——利與害的基礎上，強調指出，不要片面地只看到利的一面，不要片面地去追求利，不然，就會弄成“輜重捐”或“擒三將軍”的慘局。孫子在這裡只是說必需要“以迂為直”，“以患為利”，不然就不能使自己避免可能遭受的損失而獲得戰爭勝利，只是說招致這種“輜重捐”、“擒三將軍”等損失或危害的，是由于只片面地看到利的一面而“舉軍”去爭或“委軍”去爭的結果，並不是說也並沒有說是由于“舉眾”或“委眾”去爭的結果。假若原文作“眾爭為危”，那末下文所說的各种危害就應當是由于“舉眾”或“委眾”而爭的結果，而實際上并不如此，孫子所說的這些危害仍是由“舉軍”或“委軍”而爭的結果。由上可知，作“眾爭為危”很明显是後人的附會。當然，也可能是由于感到“軍爭為利，軍爭為危”的說法不易懂，或甚至矛盾，——都是“軍爭”，為何一為“為利”而一又為“為危”呢？“為”

在这里并非作“为了”解，也不作“則”字解，而宜作“有”字解，或作“包含”解。“軍爭为利，軍爭为危”者，言战争包含有利害两个方面，言战争固然有利可圖，但也包含着危險，弄得好，可以減輕或避免这种可能的危險，弄得不好，假若只片面地去追求利，即如文中所說“舉軍而爭利”或“委軍而爭利”，那結果就会弄成不但利得不到，反而会遭到更大的損失。以“有”釋“为”并非由于附会，“孟子”滕文公篇云：“夫滕，壤地褊小，將为君子焉，將为野人焉”，这意思就是說：滕虽然是个褊鄙小国，但也有君子，也有小人。故仍应依“十家注”各本作“軍爭为利，軍爭为危。”

(二)“故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預交；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乡导者，不能得地利。”按此句原在“是故軍無輜重則亡，無粮食則亡，無委积則亡”句与“故兵以詐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者也”句之間。此句，“九地篇第十一”也有，而且文字全同，故疑其本“九地篇”文而重誤于此，因此句与本篇——“軍爭篇”之旨不符，而且与上下文意也不銜接。前后皆系描述战斗行动的准則，孙子这里告誡說：不要“舉軍而爭利”，不要“委軍而爭利”，行动起来，“疾”要“如風”，“徐”則“如林”，但在中間却突然插进与諸侯謀交与依地形行軍等事，就显得很不自然。而“九地篇”則專講出兵远征所应注意的事項，此句正与該篇之旨吻合，而且，在“九地篇”此句之下紧接着就是“此三者不知一（按一般書皆作“四五者不知一”，应作“此三者”，見本文該篇箋註），非霸王之兵也”，“此三者”显然就是指的这三件事情。因此，我們有理由認为此句原系“九地篇”的錯簡。

(三)“指乡分众，廓地分利，悬权而动。”这句话的主要問題是在“指乡分众”的“指”字上。按“指”字，除“通典”、“御覽”之外，几乎所有孙子書皆作“掠”。在考究是否作“掠”字时，似有必要首先把这句话的意思弄清楚。一般作“掠”者，皆謂“掠乡分众”为抄掠敌人乡鎮，將所获战利品分賞有功的人，而对“廓地分利”的解釋則是开拓領土以分敌之利。杜牧、陈皞、梅堯臣等就是如此說法。这种說法当然也不是沒有道理的，但只要我們注意一下，就会發現在这句话的前边，孙子用了一連串的話来描述各种战斗行动的准則：“其疾如風”、“其徐如林”、“侵掠如火”、“动若雷霆”等，而最后就总地說一句：“悬权而动”；这样，假若在中間插进抄掠敌人与开拓領土等等，就显得很不协调。而且，对这句话作这样的解釋，历来就有人表示異議。这里首先就是杜祐。杜祐作“指乡分众”，其說为：“旌旗之所指向，則分离其众。”賈林、王皙、張預也持此說。“廓地分地”，杜祐、梅堯臣和施子美解为：“开土拓境，分賞有功”，而李荃、王皙、張預、刘寅与赵本学等人則謂：既得敌地，則分守利害，以防不虞。按杜、梅、施等人对“廓地分利”的說法未必妥善，張預就曾指出：“或云得地則分賞有功者，今观上下文，恐非謂此也。”假若我們比較研究一下，就会感到：抄掠乡鎮分賞有功、开土拓境利不專享的說法是不如旌旗所指分兵追击、既得敌地則分守利害的說法为善的。假若我們从后者的解釋，則联系上下文来看，就一点也不覺得牽强。故“掠乡”应作“指乡”。作“掠”字者，其解釋可能有下列几个：①“掠”、“指”因形近而致誤。②因“九地篇第十一”有“掠于原野，三軍足食”之語而加以附益。③“指”下有一“乡”字，如作“指乡”則覺費解，故作“掠乡”。其实，“乡”在此并非乡鎮之乡，“乡”为“向”之本字。“乡”，“通典”、“御覽”作“响”，也古“向”字。至于“廓地分利”之“廓”字，杜祐釋为“开拓”，張預釋为作平易解的“开廓”，按“廓”字在此当为指定、圈划的意思。

(四)“夫全鼓旌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也，人既專一，則勇者不得独进，怯者不得独退，

此用眾之法也。故夜戰多火鼓，晝戰多旌旗，所以變人之耳目也。”這裡的問題主要是在“一人之耳目”與“變人之耳目”上。為什麼前說“一”而後又說“變”呢，二者是否有矛盾呢？“一人之耳目”與“人既專一”之“人”是指的同一對象，這是沒有問題的。“變人之耳目”之“人”與前述二者之“人”所指對象是否相同呢？假若是指同一對象，那為什麼又說“一”而又說“變”呢？這看來不是矛盾嗎？於是就有人認為“變人”之“人”為敵人，“變人之耳目”為變惑敵人的視聽。梅堯臣、張預、劉寅、趙本學都是這樣說的。另外，更有人為了明白區分“一人”與“變人”所指對象之不同，而將“一人”與“人既專一”之“人”改為“民”，這就是說，以“民”指我軍，而以“人”指敵方。“菁華錄”就是這樣改的。我過去也曾一度地認為這樣改有理。但詳察孫子文意，又覺未妥：“故夜戰多火鼓，晝戰多旌旗，所以變人之耳目也”句系前兩句之結語，故句前冠有“故”字。前兩句是說：金鼓旌旗這種指揮信號之設立，是用來齊一部眾視聽的；視聽齊一了，那末勇敢的人就不敢冒犯號令單獨前進，怯懦的人也不敢干性命之危險臨陣退縮；而在結語里却說：所以夜間作戰要多用火鼓、白天作戰則多用旌旗來借以惑亂敵人的視聽，很显然，這樣說，前後文就脫節了。所以我們可以肯定前後所指系同一對象，而不宜以“民”與“人”來加以區別。對象既是一個，那末又說“一”又說“變”是否矛盾呢？這在字面上看來是有矛盾的，但二者在實質上則是一致的。“變”在這裡不應作惑亂解，而應作改變解。“夜戰多火鼓”，“晝戰多旌旗”，是用來改變部眾視聽以便進行統一指揮和調動的。這樣，不但與“一”字之意沒矛盾，而且更豐富了“一”的意思。故“菁華錄”之說未可從。至於作“民”或作“人”，“武經”系統各書與“十家注”古本上述三處皆作“人”，孫校“十家注”則依“御覽”作“民”。按“形篇”末句云：“勝者之戰人也……”，“勢篇”末句云：“任勢者，其戰人也，……”，“故善戰人之勢”，皆作“人”，故也宜作“人”，以便在文字取得一致。

(五)“先知迂直之計者勝，此軍爭之法也。”此句原在本篇“‘軍政’曰：言不相聞，故為金鼓；視不相見，故為旌旗”句之前，也即在“指彊分眾，廓地分利，懸權而動”之後。歷來各家對此也皆未置詞，唯趙本學云：“愚謂此節（按即指該句）與上文不相蒙，當在‘無邀正正之旗，無击堂堂之陣，此治變者也’之下，為本篇之結語耳。”按趙說有理，宜從之，將其置于本篇之末，以足本篇之意。而將本篇末節：“故用兵之法”以下至“此用兵之法也”數句，因系錯簡，應移至下篇——“九變篇第八”，說見下。

## 九 變 篇 第 八

在第八篇中最大的問題是訂正錯簡問題。

“軍爭篇”末與本篇之初的那幾節文字，錯簡情況很嚴重，是“孫子”十三篇中錯簡情況最嚴重者之一。唐、宋兩代，特別是宋代，儒者喜談兵，但也多沿襲舊文，且附會其說，而對該段文字也皆無所訂正。至張賁，才提出這個問題，並進行了初步訂正。“直解”云：“按此篇編簡錯亂，前人多因而傳會其說，惟張賁已能改而正之。”劉寅即依張賁說在“直解”中訂正了該段文字的次序。但對問題解決得比較徹底的應當還是趙本學。趙氏在“直解”的基礎上，更深入地比較分析了各注家以及鄭氏“遺說”的意見，把文字處理得更加簡練，緊湊。

原来，孙子各書，“軍爭篇”末节之文为：“故用兵之法，高陵勿向，背丘勿逆，佯北勿从，銳卒勿攻，餌兵勿食，归师無遏，圍师必闕，穷寇勿迫，此用兵之法也”，而在本篇即“九变篇”初之文为：“孙子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于君，合軍聚众，圯地無舍，衢地合交，絕地無留，圍地則謀，死地則战”，再接着，就是“途有所不由，軍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君命有所不受”。我們只要仔細考察一下，就会發現一系列的問題，而主要的問題則是下边相联系的几个：

①“軍爭篇”末的那么句，不但与上文意思不接，而且也不符合該篇之旨。“軍爭”所述多为“常法”，而“九变”所述則多为“变法”。軍爭所述多系有关兩軍爭胜的原則性問題，“九变”所述則多为与軍爭有关諸原則之灵活运用，而“高陵勿向”、“佯北勿从”与“穷寇勿迫”等事則正是講灵活性的問題，故当为“九变篇”之文。

②上述諸句既为“九变篇”文，其所云八事再加“九变篇”初之“圯地無舍”、“衢地合交”、“絕地無留”、“圍地則謀”与“死地則战”五事，即为十三“变”而非“九变”了。这里，需要解决的前提問題，就是孙子所謂“九变”，是一般言其“变”之多呢还是說其“变”有“九”？“直解”云：“九变者，用兵之变法有九也。”曹操曰：“变其正，得其所用九也。”再，参諸“九地篇”文，發現九地之变其数也恰为九，即“散”、“輕”、“爭”、“交”、“衢”、“重”、“圯”、“圍”、“死”，故可知“九”在此并非如王皙所說一般指的“数之極”，而是有具体的数之概念的。至于本篇所云之“变”是否也为“九”可見以下之分析。确定这个前提很重要，不然，我們就失掉数量的尺度了，——反正“九”是多的意思，多几个少几个也沒有关系，假若这样，我們就沒有必要来校訂錯簡之文字了。这个前提既然确定，“軍爭篇”末之所云八事也既然确定为本篇之文，但合本篇初所云五事却为十三，这样，我們就需要进一步研究本篇所云五事是否皆系本篇之文了。这里，我們發現本篇所云五事除“絕地無留”之外，其他四事皆重見于“九地篇第十一”，唯个别文字稍有不同（“九地篇”云：“圯地則行”、“衢地則合交”、“圍地則謀”、“死地則战”，而本篇則为“圯地無舍”、“衢地合交”、“圍地則謀”、“死地則战”）。此其一。其次，此四者，与“九变篇”之旨不合而与“九地篇”之旨則合。“九地之变者”——“直解云：“遇九地而处之有变法也。”故可肯定其为“九地篇”文。如此，則“九变”之“变”也正合“九”之数。“九变”者：“高陵勿向”，“背丘勿逆”，“佯北勿从”，“銳卒勿攻”，“餌兵勿食”，“归师勿遏”，“圍师必闕”，“穷寇勿迫”，与“絕地勿（茲作‘勿’）留”也。如此，則張預所說“从‘圯地無舍’至此（按指‘死地則战’）为‘九变’止陈五事者，举其大略也”，显然是一种附会；何延錫与郑友賢也因文中所云之事不合九之数而將“圯地無舍”以下五事再加上“途有所不由”、“軍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与“地有所不爭”四事断为“九变”，而將“君命有所不受”一句作为总申上述九事之結語，則更是荒唐；至于張預、何延錫与郑友賢因文中有“圯地”、“衢地”、“圍地”、“死地”等事而釋“九变”为“九地”之“变”以自圓，这也是莫大的誤解，关于这一点，赵本学批評得好：“謂‘九变’即后篇‘九地’之文，固非孙子之本意，且‘九地’在后，‘九变’在先，見于前者或举其大略于后，安有見于后者而举其大略于先邪？”“九变”之次于“軍爭”以及“九地”之次于“地形”皆係先言“常”而后言“变”，那能先言“变”而后言“常”呢？即使如此，也不能將軍爭之变誤为地形之变。張、何、郑諸公失次竟如是。

③这样訂正之后，“圯地無舍”句上之“孙子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于君，合軍聚众”数

句因“軍爭篇”已有，或原系該篇首段之文而重錄于本篇之首，宜從趙氏說：“歸諸軍爭篇”。再，原“窮寇勿迫”句下之“此用兵之法”，也依“校解”略，以免與“高陵勿向”句上之“凡用兵之法”重復。這樣校訂的結果，本篇首段之文即為：“孫子曰：凡用兵之法：高陵勿向，背丘勿逆，佯北勿從，銳卒勿攻，餌兵勿食，歸師勿遏，圍師必闕，窮寇勿迫，絕地勿留”，下接“途有所不由”，等等。如此，則正如趙氏所說：“始為全文，更尤簡淨，……無一言之不足，亦無一言之有餘”了。

## 行軍篇第九

在第九篇中也有嚴重的錯簡情況，而這種情況卻發生在“十家注”重要古本之一的“集注”一書中。此外，也有其他幾處文字需要訂正。茲分述如下：

(一)在“若交軍于斥澤之中，必依水草而背眾樹，此處斥澤之軍也”句之“必依水草而背眾樹”與“此處斥澤之軍也”之間，“集注”插入以下三十多句，而這三十多句的次序也錯亂不堪，茲將其原文次序簡錄如下，以資參校：

①自“旌旗動者，亂也”至“兵非貴益多也，惟無武進”共約十句，依道藏“註解”與“七書”、“直解”等書之次序，應在“軍擾者，將不重也”與“足以併力料敵取人而已”之間。

②自“奔走而陳兵者，期也”至“軍擾者，將不重也”約八句應在“無約而請和者，謀也”與“旌旗動者，亂也”之間。

③自“鳥起者，伏也”至“輕車先出居其側者，陳也”九句，應在“眾草多障者，疑也”與“無約而請和者，謀也”之間。

④自“凡地有：絕澗、天井、……”至“眾草多障者，疑也”九句應在“此兵之利，地之助也”與“鳥起者，伏也”之間。

“集注”就是將以上四節文字依次插入“必依水草而背眾樹”與“此處斥澤之軍也”之間的。它將“此處斥澤之軍也”以下的文字調到此句之上，這當然也影響了此句以下文字之次序。“集注”自“此處斥澤之軍也”至“上雨水沫至，欲涉者，待其定也”這七、八句應在“必依水草而背眾樹”與“凡地有：絕澗、天井”之間。“集注”“欲涉者，待其定也”以下即接“足以併力料敵取人而已”；再以下，次序即不亂了，不過本篇也只有少數幾句了。這就是說，“集注”關於本篇文字的次序絕大部分都是顛倒錯亂的。嘉靖談校本，其亂尤可說，萬曆黃校本既在談本之後，也不訂正，也疏失之甚矣。至於孫星衍所校“十家注”的工作雖較仔細，但也只主要依據道藏與“通典”、“御覽”，根本就沒有參照“集注”這個書，當然也就更談不上什麼訂正了。

(二)除上述錯簡外，還有一處，就是“上雨水沫至，欲涉者，待其定也”原在“此兵之利，地之助也”與“凡地有絕澗、天井”之間，歷代注家也皆未置詞，唯“直解”引張賁說云：“此句當在‘欲戰者，無附水而迎客’之下。”按張賁之說是，因此句系言處水之軍，正與“欲戰者，無附水而迎客”節文意吻合，但若置于“此兵之利，地之助也”與“凡地有絕澗、天井”之間，則與上下文意就不銜接了。

(三)“平陸處易，而右背高，前死後生，此處平陸之軍也。”“前死後生”，“菁華錄”依王

哲說改成“前生后死”，而一般書皆作“前死后生”。“菁华录”改变此句文字的理由是：“右背山陵，以便下击，敌軍背山則無退步，故后为死地；从高击下，形势便，故前为生地。”王哲注云：“既后背山，即前生后死。”按其注意，以后高为死，而以前低为生。而杜牧注則引太公曰：“軍在左川澤而右邱陵，死者，下也，生者，高也，下不可以禦高，故战便于軍馬也。”賈林也謂：“岡阜曰生，战地曰死。”“淮南子”曰：“所謂地利，后生而前死，左牡而右牝。”施氏“講義”引張昭“擇地利篇”曰：“平地則前死而后生。”如此，則似应仍依其他孙子各書作“前死后生”，不知可否。

(四)“軍旁有險阻蔣潢，并生葭葦，山林翳薈者，必謹复索之，此伏奸之所也。”此句在文字上的分歧也很大，而主要的分歧也出現在“十字注”各本与“武經”系統各書之間，而這兩個系統之內的各書彼此也不全同，茲將此句分作如下几点来分別地簡單談一下：

①“軍旁”，“十家注”古本作“軍行”，应依孙校本“十家注”、“七書”、“講義”、“直解”、“校解”、“通典”、“御覽”作“軍旁”，作“軍行”，失意。

②“險阻蔣潢，并生葭葦，山林翳薈”，“十家注”古本作“險阻潢井，葭葦山林翳薈”，孙校本依“通典”、“御覽”作“險阻蔣潢，井(“御覽”作“井”)生葭葦，山林翳薈”，“七書”、“講義”、“校解”作“險阻潢井，蒹葭林木翳薈”，“直解”、“武备志”則以“蒹葭林木”作“林木蒹葭”。又，參諸各家注文，曹操有“險”、“阻”、“蔣”、“潢”、“井”、“葭葦”、“山林翳薈”，杜祐同，而梅堯臣、張預則無“蔣”字。綜合上述，其文字分歧大体是：“險阻潢井，葭葦山林(蒹葭林木，林木蒹葭)翳薈”与“險阻蔣潢，井(井)生葭葦，山林翳薈”。由于前者多不合曹注与杜注，故似宜以后者为校訂之基本根据。不过，既云“蔣潢”，既云地势低下若再說“井生葭葦”，則覺繁剩重复，故“井”似宜从“御覽”作“井”。这样，則不但指出地势低下，且又指出水草叢生，不但不与上边文意重复，而且更加丰富了上边的文意。“井”、“井”形近，易混。

③至于“此伏奸之所也”，“十家注”古本作“此伏姦(同“奸”)之所在也”，孙校本則又作“此伏姦之所藏处也”，而“七書”、“講義”、“校解”則作“此伏姦之所也”。显然，前二者系以“伏姦”为名詞，这样，話說起来，就是：“这乃是暗藏的奸細(伏姦)所在(处)的地方(藏处)。这样当然意思也是通的，但若比之“这乃是暗藏(伏)奸細(姦)的地方(所)”，就覺差一籌了。故宜作“此伏奸之所”，以“伏”为動詞为宜。

对这一句話的意見，大体就是这样。

(五)“散而条达者，薪来也。”“薪来也”，“十家注”与“武經”以及其他各書皆作“樵采(採)也”。历代注家也多以“樵采”立說，唯李荃認為应作“薪来。李荃注云：“煙塵之候，晋师伐齐，曳柴从之，齐人登山，望而畏其众，乃夜遁，薪来即其义也，此荃以‘樵采’为‘薪来’字。”按李說有理。如作“樵采”則覺有兩個問題：①“樵采”为一般采樵，似非曳柴之意，既非軍事行为，則与“相敌”無大关系，而“薪来”——曳柴，則为一种伪裝的軍事行为，与“相敌”有关；②既为采樵，而非李荃所說之曳柴，那如何能够产生塵土飞揚的局面？故似宜依李荃說作“薪来”。“薪来”、“樵采”形近，后人誤將“薪来”作“樵采”，也是可能的。“通典”作“薪采来也”，盖意与李荃同。

(六)“無約而請和者，謀也。”按此句一般書皆在“輕車先出其側者，陣也”之下，唯赵氏“校解”云：“愚按此句当在上句(即指“輕車”句)之上，与‘进也’(即指“辞卑而益备者，进也”)、‘退也’(即指“辞强而进驅者，退也”)三句，皆为相其使命。”赵氏之說有理，宜从之。

## 地形篇第十

在第十篇中，文字出入虽也不少，但重要之处不多，稍值得一提的就是嘉庆二年袁州观察署刊本孙校“十家注”将“支形”句整个脱漏，且页码颠倒致使六地之次序也发生了一些混乱现象，读者宜察之。至于其他问题，就略而不谈了。

## 九地篇第十一

在第十一篇——“九地篇”中，也只有一处想提出谈一谈，这就是关于“四五者”与“此三者”的问题。按该句，几乎所有孙子书皆作“四五者，不知一，非霸王之兵也”，唯“武备志”作“此三者”。似以依茅氏说作“此三者”为宜。孙子前述“是故不知诸侯之谋者不能预交，不知山林险阻沮泽之形者不能行军，不用乡导者不能得地利”，正系三事，而下文紧接着就下结论说“此三者，不知一，非霸王之兵也”，这样，文意发展就很自然通达。假若我们的了解不错，那末，曹操、张预以“四五者”为九地之利害的说法——即合四、五为九的说法，就显然是一种误会了。

## 火攻篇第十二

在第十二篇中，有以下两点值得提出研究：

(一)“昼风从，夜风止。”“从”字，一般孙子书皆作“久”，且皆以“凡昼风必夜止”释之，并引“老子”“飘风不终朝”之语以自圆，唯“直解”引张贲说云：“‘久’字，古‘从’字之误也。谓白昼遇风而发火，则当以兵从之，遇夜风而发火，则止而不从，恐彼有伏反乘我也。……若作‘久’，甚无意味。”按张贲之说甚是，宜从之。

(二)“水可以绝，火可以夺。”“火”字，所有孙子书皆作“不”，“历代各家也皆以“不可以夺”立说。按：此篇系专讲火攻，而此节则系分析比较水攻与火攻对战争之重要以及二者在战争中不同的作用，所以前句说：“以火佐攻者明，以水佐攻者强”。但是，只用“水佐攻”则有缺点，因为它只可以隔绝敌人的通路，而不能够消灭敌人的积蓄，而消灭积蓄的这个战斗任务就要靠火攻来完成了，故“不可以夺”似应作“火可以夺”。当然，说水不可以夺，意思也就是说火可以夺，不过，既是正面讲火攻，而不是讲水攻，那末就应当将火突出地提出来，而不必含混其辞。“火”、“不”形近，把“火”当作“不”，这也是可能的。

## 用间篇第十三

在第十三篇中也有两个问题：

(一)“故用间有五：有乡间……，乡间者，因其乡人而用之。”此处之“乡间”，“十家注”各书皆作“因间”，“七书”、“讲义”、“武备志”、“总要”与“兵垣”也作“因间”，“通典”、“御览”也作“因间”，而“直解”与“校解”则作“乡间”。张预曰：“‘因间’当为‘乡间’，故下文云：‘乡间’



可得而使’。”按張說為是，應作“乡間”。如作“因間”，則從文字上看來，連同內間、死間、反間、生間，再加上“乡間……可得而使”之“乡間”，即為六間而非文中所說之五間了。又，“校解”云：“旧註‘因’作‘乡’。”可見“因”為後人所改也。

(二)“間事未發而先聞者，間與所告者皆死。”“間與所告者皆死”，“直解”、“校解”“武備志”等書皆作“聞與所告者皆死”。假若如此，那末這句話就是說：聽到秘密消息的人（聞者）和他所告訴的人（其他聞者）都要處死。這樣就有問題了。間諜之事未發作而先洩漏了消息，應當先殺洩漏消息的人——間者以正軍法，而且還應當殺聽到消息的人即間者之所告者——聞者以滅口，假若只殺聞者與所告者，而使間者逍遙法外，洩露消息的人沒罪，而聽到消息的人則殺頭，這成何說？這裡，對“所告者”還需要弄清楚。假若“所告者”系指“間者”之所告者，那末，“所告者”就是“聞者”，如此，則“聞”（者）與“所告者”就是一會事了，“聞與所告者皆死”，也就不通了；假若“所告者”系“聞者”的“所告者”，那末，“聞者”是否在聽到消息之後又自由主義地亂跟別人講，文中並沒有說。故若作“聞”，似不當，應依“十家注”、“七書”、“講義”作“間”。“間與所告者皆死”，施氏“講義”說得很明白：“間事未發而先聞者，必吾間傳之耳，故間與所知之人皆死。”“直解”、“校解”注意皆同“講義”。趙氏云：“斬間者之泄言，斬聞者以滅其口。”但其文則仍作“聞者”不知何故？抑其以“所告者”為“聞者”歟？若其言指“間者”，那就不應當是“所告者”而應當是“告者”。這裡似乎有兩種可能，一是將“所告者”與“告者”混淆，一是由於“間”、“聞”二字形近而誤傳。不過無論是由於那種情況，都似乎是不對的。

我對“孫子”十三篇中某些文字上的問題的一些初步意見，就提到這裡。疏失之處，乃至錯誤之處，想必難免，誠望各位同志予以批評指正。

## 学术消息

### 世界近代現代史教研室一年来的科学活动

一、科学报告会 1957年教研室共举行了三次报告会：第一次由張蓉初同志报告四十年来苏联历史家对苏联史研究的成果；第二次由潘潤涵同志等报告苏联考古学和世界史方面的研究情况；第三次报告会是为庆祝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紀念，由罗荣渠同志宣讀以“中国工人参加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为題的論文，同时听取張蓉初同志关于苏联历史家如何紀念十月革命节的报导，和潘潤涵同志关于苏共二十大以来苏联历史科学新發展的介紹。会后放送前苏联專家安东諾娃同志的临別講話录音。第四次报告会預定由馬克堯同志宣讀他的論文——“1926年英国总罢工中右派領袖的叛卖”，因馬克堯同志下放未举行，他的論文將在学报中發表。

二、文化史專題講座 为活躍学术空气，貫徹百家爭鳴方針，充实專門化同学的文化史知識，教研室本学期举办了“文化史講座”，邀請校內外專家每周作一次專題講演。截至一月初为止，已举行的有下列十三講：荷馬史詩(李賦宁教授)，希腊哲学(任华教授)，印度哲学(金克木教授)，基督教与西方文化(朱光潛教授)，阿拉伯文化(馬坚教授)，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宗白华教授)，拉勃雷与法国文艺复兴(吳达元教授)，莎士比亞与英国文艺复兴(楊周翰教授)，莫里哀与法国古典主义(文学研究所李健吾教授)，英国革命浪漫主义詩人(赵蘿蕤教授)，歌德(馮至教授)，德国古典哲学(郑昕教授)，易卜生(文学研究所潘家洵教授)。本講座得到有关單位的热情支持，及系內外听众的热烈欢迎。

三、与外国历史学家座談 上学期末教研室約請法国进步历史学家約翰·謝諾(Jean Chesneaux)同志来校座談，事先由教研室提出兩個問題請求謝諾同志講述：(一)法国大学中历史教学的情况；(二)目前法国历史科学中的主要派別。謝諾同志对巴黎大学历史教学情况作了詳細介紹，并指出大学生在法国有較多的自学時間，但指导教师的数量則頗感不足。接着謝諾同志介紹了法

国历史家中的三个派別：傳統派，“年鑑派”，馬克思主义学派，对每派作了分析，最后強調集体研究的重要性。到会的教师和同学又提出了一些补充問題，謝諾同志一一作了解答。

最近教研室又有机会請到了民主德国科学院院士、經濟史研究所所長、历史学家尤·庫辛斯基(J. Kuczynski)来校座談。庫辛斯基是多卷本的“資本主义国家劳工狀況史”的作者，最近对于德国帝国主义史、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社会民主党也發表了專著。教研室向他提出了四个有关德国史的問題，一个有关对德国史学家評价和西德史学派別的問題，另一个关于培养研究生和助教的途徑問題。庫辛斯基院士对于所有問題都作了滿意的回答，他对于指导研究生和助教的科学研究工作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对教研室的同志有很大啓發。

四、科学情报工作 教研室自上学期起接受了“历史研究”的委托，每月組織“国外史学消息”和“外国历史著作介紹”各一篇，自五月份以来迄無間斷，除約請教研室以外同志撰稿外，我教研室同人共写了报导和書評十余篇。最近又接受人民日报和哲学社会科学情报室委托編写同样性質的稿件，教研室已將此項情报工作納入科学工作的計劃中。

五、其他 为解决科学研究所需圖書資料的困难，教研室已与苏联、民主德国、英国、法国的学术机关建立正常联系，交換必要的資料、期刊、圖書。苏联科学院和莫斯科大学已贈送我系約500册有关苏联史書籍，另为我系征購絕版圖書約600册。最近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又贈送我校“巴黎公社会議記錄”原文影印本全套。此外，民主德国也已寄贈我系有关德国史圖書百余册，及馬克思在1848—1849年所編“新萊茵报”原版影印本全套，这些都是不可多得的珍貴史料。教研室也設法供应外国学者所需的中文書籍和資料。

(世界近代現代史教研室通訊)

# 关于阿Q性格

蔡 健

“阿Q正傳”是世界文学史上一篇傑出的现实主义作品，阿Q性格是世界文学史上一个非常光輝的典型。这已經是历史性的定評了。但阿Q性格的特点是什么？它的社会基础又怎样？自“阿Q正傳”發表后，三十多年来，我們作了不少的研究和說明，只是至今意見仍难一致。

阿Q的性格本来是复杂而又多样的。如爱面子、自高自大、保守、排斥異端以及精神胜利法等等，都是他的性格因素。而基本的性格特征却是精神胜利法，这是大家公認的。因为这种性格特征不仅貫穿了阿Q的一生，而且在他日常生活中起着主导、支配作用。我們知道，人們在不断毆辱他，也殘酷地剝削他，他怎样对付那些不断襲来的侮辱与損害，剋服那些怨敌呢？现实中是沒有这种可能性的，他只有經常采用精神胜利的“妙法”了。

而且他的爱面子、自高自大、保守、排斥異端等，又是和他的精神胜利法联系起来，更充分地表現了他的精神胜利法的。爱面子、自高自大，一般說是風气閉塞、見識淺陋的小生产者常有的性格。但他的瞧不起未庄人——包括赵太爷等，說明他还不只是一般的爱面子，却是毫無根据的妄自尊大；而且在现实迫使他認識到实际上不是高于別人时，他却說“我的兒子闊得多啦！”这就突出地表現了他的精神胜利法。保守、排斥異端，也是封建社会中农民普遍有的。他看不慣城里人的煎魚方式，这是他的保守性；但这保守性在阿Q性格中出現之所以显得比別人可笑和突出，是由于他一方面菲薄城里人，另一方面反过来又鄙視未庄人“未見過城里的煎魚”，是沒有見過世面的可笑的乡下人，于是他高出城里人也高出未庄人一等了。这就表現了他的精神胜利法。

至于他和王胡、小尼姑等曾發生过的糾葛，也是他性格突出的表現，而且也和他的精神胜利法有关系。只是这些糾葛的主要原因和意义，却是各自不同的。譬如，他与王胡的糾葛，那原因是由于王胡的“一部絡腮胡子，实在太新奇，令人看不順眼”。这說明他并不是觉得自己社会地位比王胡高，只是从絡腮胡子的新奇不順眼来看王胡，他要渺視王胡，因此發生的这次糾葛，是自高自大和精神胜利法結合的表現。而他和小尼的一战呢？是当他被假洋鬼子揮起哭丧棒“拍、拍”打过后，正感到無限屈辱，需要报复的时候，小尼姑来了，在他排斥異端的“正气”下，“……便在平时，看見伊也一定咒罵，而况在屈辱之后呢？”于是將蹙着的一肚子“晦气”向小尼姑傾瀉了，这和前一瞬間与王胡一战失敗后，正感到屈辱無可适从时，假洋鬼子来了，便咒罵假洋鬼子是一样的。假洋鬼子并不比王胡弱小或低下，可是他在受王胡屈辱后轉向假洋鬼子报复了。所以，很明显，这主要是一种与“排斥異端”的思想結合着的洩憤的表現。而他和小尼姑一战胜利了，得到了別人的賞識，

报复了一切“晦气”，于是飘飘然了，这就突出了他精神胜利法的一面了。

很显然，阿Q的基本性格特征是精神胜利法，不过这种基本性格特征精神胜利法也通过这种种性格因素，更丰富、更多样地表现出来，使他的精神胜利法的性格更鲜明更突出起来了。

然而这种精神胜利法，是他在现实压力下不能正面进行抗争时，所采取的消极的精神上的自慰；也是他在被侮辱与被损害以后所表现的一种报复意图。因此，我们觉得阿Q的精神胜利法，有着它性质上的特点的。这种性质的特点就是：现实中失败的自慰，同时也是无可奈何的虚伪的反抗。这是矛盾的，而又是统一的。阿Q的精神胜利法就是这种矛盾的统一。

阿Q在被赵太爷打了嘴巴以后，暗暗地咒骂一句：“儿子打老子”，就算获得了失败、屈辱后的安慰，而且还以赵太爷是自己的儿子而得意起来；被剥夺得精光了，也只心里咒一句：“妈妈的……”就算报复了；被别人揪住黄辫子不得不自轻自贱地承认失败后，还是以“自轻自贱”为“第一个”，而且还瞪着眼睛说：“你算什么东西”，就算克服了怨敌，心满意足了；……等等这一切表现，是在实际中失败后、是在不可能取得任何实际的胜利后的一种精神上的自慰的表现。这种自慰，是自欺自骗的自慰。作为一个人来说，还有什么比不断被人辱打、嘲弄更不可容忍的呢？还有什么比被压榨、被掠夺到赤膊饿肚子了更大的苦难和羞辱须要掩饰的呢？还有什么顾虑和躊躇而不挺身而出，积极地进行反抗和报复呢？可是，阿Q不这样，他在无情的纷来沓至的侮辱、损害、掠夺面前，只用虚伪的精神胜利法来掩饰实际的失败，从自欺自骗的精神胜利法中求得安慰，这种性格是落后的，甚至是丑恶的。不管是他“瞪眼”的时候也好，不管是他“飘飘然”的时候也好，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可笑、可鄙亦复可怜的形象，心里不禁湧起一股由可笑急骤地转为可鄙的感情来。我们固然感到他的被凌辱被践踏的不幸，更感到他在被压迫被损害下的不积极、不正面起来抗争的可耻！

但是，这种自欺自骗的自慰精神，也仍然是有着它反抗的一面，这是需要我们给予它重视的。我们试追溯一下它的产生原因吧：他为什么需要精神胜利法呢？为什么采取“怒目而视”、“肚子里暗暗咒骂”……呢？我们知道，他是怎样要求改变他的生活和处境的啊，在被侮辱与被损害下，他曾经“估量对手，口讷的他便骂，气力小的他便打。”但是，“不知怎么一回事，总还是阿Q吃亏的时候多”。现实的压力如此强大，使他的一切愿望和努力都失败了，然而失败又是令人不甘心的，于是在这种无可奈何的情况下采取了“怒目而视”或“暗暗咒骂”。这种“怒目”和“咒骂”，虽然不是正面的、实际的反抗，可是，能说不是他为改变生活和地位所作的挣扎？不是他在不堪忍受屈辱而采取的一种报复手段吗？因此，从它的产生，我们可以看出它是带着反抗的意图，是为了“克服怨敌”的。这显然是阿Q精神上对敌人不甘屈服的表现。这是植根在一个被压迫者的灵魂中，是萌芽在一种报复的要求下而产生的性格特征，因此，它有消极的一面，也有反抗的一面的。

而且正因为阿Q性格中有着这种反抗的因素，阿Q实际上也就并不是一个太驯顺的角色。他对他的生活地位，经常是“忿忿”而且“不平”的；他对赵太爷独不表格外崇奉，尤其当他意识到快翻身了，赵太爷即算迎着他怯怯地叫“老Q”，他也是歪着头以不屑理会的、甚至傲慢的态度回答他的；假洋鬼子则是他最厌恶的人，而且看见他“一定在肚子里

暗暗咒罵”。虽然他也受了那些封建礼教的严重影响,有着相当的頑固、保守思想,可是对那个社会的礼教制度、道德规范,阿Q也并不是一个能够誠懇遵守的人。在那个社会制度下,他却是一个頗有些“不安分”的人。在他要求女人的时候,他敢于向吳媽跪下求爱;他飢餓的时候,敢于翻过修靜庵的牆偷蘿蔔;他丧失了生路的时候,敢于进城“干勾当”。这些“不安分”的行为,以新的品質来衡量,固然也是不可称許的,但在那个制度下,阿Q究竟触犯过那个礼教制度的尊严,(地保就說,“你連赵家的用人都調戏起来,簡直是造反!”)破坏过那个社会制度的秩序,从而使赵太爷之流“气忿”而且“担心”过,使未庄人們“惊惧”而且“憮然”过,因此,这还是表明着阿Q的反抗性。阿Q的这种精神胜利法的反抗性,虽說不是正面的,而是被歪曲的,他是有發展为正面反抗的可能性的。所以,阿Q性格特征中这种反抗的一面,也还是有意义的。

对阿Q性格的基本特征,我們必須認取它既是消極而又是反抗的兩面,認取它是矛盾而統一的整体。

固然,从被压迫者的角度來說,如果真正要求改变自己的被压迫的地位,是不應該止于这种反抗,而且也不應該采取这种反抗的。这种精神反抗,实际上不可能动搖統治者任何根本的东西。因此,阿Q的性格特征中的这种反抗,还是一种虚伪的、消極的現象。如果將它扩大或夸張,以为阿Q是个革命英雄,是“使人燃燒起来”的“自豪的性格”,那是錯誤的、是歪曲的。阿Q畢竟是魯迅先生“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心情下孕育而誕生的这种特定的精神胜利法的典型。但反过来說,如果我們仅仅看到他的性格特征落后的、丑惡的一面,而無視它的反抗的一面,認为它單純是种消極丑惡的存在,是一种奴才主义,甚或將它与統治階級的精神胜利法等同起来,那也是不全面、不正确的。魯迅先生曾經說过,他的創造这个人物,“实不以滑稽或哀憐为目的”,这也是值得我們深思的。

## 二

为了进一步理解阿Q这一个典型性格的特征,我們来探索一下它的社会基础吧:

一般的說分散的小塊土地的生产方式,帶給了封建社会的农民以历史的局限性。他們眼光短小,思想閉塞;更由于長时期的封建主义的压迫,租稅、債務以及重重封建礼教的負累,他們也更愚昧、保守、甚至麻木了。精神上的束縛是如此厉害,以致他們不明确一切压迫的由来,不明确反抗压迫的道路,甚至也不敢有所实际反抗。至于,阿Q是一个丧失土地,沒有家,也沒有固定职业,处在社会最底層的貧僱农了,按常情說,对迎面而来的压迫和剝削,任何时候都可以决然地进行面对面的抗爭了;但又由于他是一个有时連短工也沒有做,不得被挤到游手之徒的队伍中去,沾上了游手之徒的狡猾的人,面对着重重的迫害,尽管他急切要求反抗,却也善于估量对手,这就往往叫他在压力面前失去斗争的勇气和力量,不能进行正面的、积极的抗爭,而只能采取精神胜利法了。

加之,封建統治階層的重重压迫和剝削,使处在社会最底層的阿Q,成了承受压迫和剝削最惨重的一個。赵太爷是阿Q生活着的未庄社会的封建統治的代表人物,我們从他和阿Q的关系,可以看出阿Q所遭受的迫害是怎样难于忍受的。他为了維持他家族門閥的高貴,不准阿Q姓赵,命地保將阿Q叫来打嘴巴;为了維持他那封建礼教的尊严,不准阿Q恋爱,用大竹槓追打阿Q;因为进城干过“勾当”,他家就要驅逐阿Q。而且除了剝削

阿Q的整天的勞力外,還強迫他夜間點燈舂米,阿Q有過一點“外路貨”,就將阿Q叫來逼問:“……聽說你有些舊東西,……可以拿來看看……”,當阿Q回復“都完了”時,不禁失聲叫道:“那里完得這樣快呢?”“總該還有一點罷?”這些話語中,暴露出一幅貪圖便宜的丑惡臉像。尤其通過那可悲的戀愛事件,對阿Q進行了一次最無恥的訛詐,剝奪去了阿Q唯一的一條棉被、最後的一件布衫,甚至連一頂舊毡帽也不可能救下。從此,迫使阿Q不能不忍受赤膊、餓肚子的生活。這是怎樣殘酷的榨取呀。而一個受精神束縛如此厲害、社會地位又如此不足道的阿Q,面對着這種強暴的壓迫和剝削,怎能不是像泰山壓頂一樣不可抗拒啊。我們想,趙太爺不准他姓趙,他能有什麼辦法抗辯呢?未庄人不是說,“即使真姓趙,有趙太爺在這里,也不該如此胡說的”嗎?趙太爺打嘴巴了,阿Q能回出拳頭去嗎?正如在那次訛詐下,即算最後赤膊餓肚子了,他能抗拒不交出最後的一條棉被嗎?那是可能想像的嗎?然而這種嚴重的壓迫和剝削,以及精神上和肉體上的屈辱,又是怎樣難于忍受啊!阿Q不能不要求“尅服”,不能不尋求出路。“對於被奴役、被壓迫和赤貧的人們,哪里是出路,哪里是救星呢?……這條出路有了,但它不是在這個世界上。形勢使然,它只能是一條宗教上的出路。”<sup>①</sup> 實際生活中既失去出路,在那個社會發展階段的被壓迫和赤貧的人們,只有走向精神生活,只有在精神世界求得自欺自騙的自慰,這就是這些人們的敬天信神的宗教迷信。這也就是在現實中失敗後表現的精神勝利法。阿Q沒有走向宗教,卻以虛偽的報復,求得自欺自騙的自慰。這就是阿Q在現實壓迫下的出路,阿Q的精神勝利法。

而且,當時正是劃歷史時期的辛亥革命的風暴來臨的前夕,中國封建社會臨于總崩潰的時期,正是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對中國人民進行壓迫、也是中國人民進行反帝反封建鬥爭的時期。中國社會正處在歷史的激變過程中,這種複雜而激變的社會情勢,也給予阿Q性格以強烈的影響。

鴉片戰爭後,帝國主義者更向中國進行有加無已的侵略。而清皇朝統治者為了維持它那搖搖欲墜的統治權,不僅不設法抵禦這種侵略,免除人民的苦難,反而更兇殘地統治人民,鎮壓人民對他們的不滿和反抗。而且通過各種方法和形式榨取人民身上的一點一滴的血汗。這里,我們且就征收賦稅一項中個別小例來看就可以知道。1910年山東萊陽農民除負擔正額賦稅,統治者巧立名目外加的苛捐雜稅就有契紙捐、戶口捐、學捐、戲捐、油房捐、舖捐、草房捐、騾馬捐……等等不下數十種。然而這又不止是山東萊陽一處的情況,而是全國普遍的現象。我們從當時長沙等處發生的數十次盛大的“搶米風潮”<sup>②</sup>,可以窺見當時全國人民“饑寒交迫”的生活的一斑。這說明了人民的苦難,也說明了那個制度的通體腐爛。

而處在這種帝國主義封建主義雙重壓迫和掠奪下的中國人民呢?中國人民卻惊醒起來了,經過鴉片戰爭、太平天國革命運動、義和團起義等,到清朝末期,農民的抗捐、抗稅、搶米、鬧荒等暴動和武裝起義運動,像野火燎原一般地开展起來。其間尤其通過1905年的俄國民主革命運動的鼓舞,中國的革命運動更呈現了新的姿態,組織了有着鮮明的激

<sup>①</sup> 馬克思、恩格斯:“論宗教”,61頁。

<sup>②</sup> 自1907年至1910年三年中長江下游與兩湖一帶發生的搶米事件,有八九十次之多。——見陳旭麓:“辛亥革命”。

进的政治綱領的統一的革命政党“同盟会”(在日本)。孙中山对这次革命的进展曾以極其兴奋的心情回忆道：“不期年而加盟者逾万人，……从此革命風潮一日千丈，其进步之速有出人意表者矣。”<sup>①</sup>这也是列宁指出的，从此，“几万万被压抑的、沉睡在中世紀停滯状态中的人民醒悟过来，要求新的生活，为爭取人的初步权利、为爭取民主而斗争。”<sup>②</sup>

总之，阿Q，一个有着長期封建主义历史重压的既保守又落后、而且处在社会最底層的农民，在統治阶層的瘋狂压迫和剝削下，只有無可奈何地以精神胜利法来尅服怨敌、汲取力量再走向生活。而且阿Q由于是个赤貧者，由于是个經常連短工也沒有做，而不得被挤到游手之徒的队伍中去，沾上游手之徒的狡猾的人，所以他比一般有家有業較固着于土地和家業的农民更显得“不安分”些。所以封建統治者的压迫愈瘋狂，阿Q的一切改变生活的要求愈只有失敗；阿Q愈不能从现实中取得胜利，愈只有寻求精神胜利法，于是就形成了这种突出的典型性格。也就是說，这一切特定时代的阶级关系和社会情势等等諸关系的結合，促使了阿Q的精神胜利法在他的性格中表現得如此充分、鮮明、突出，以至成为典型的。

正因为他的这种性格特征，成長在这样的生活实际的基础上，它有着消極因素，同时，也弯弯曲曲地孳長着反抗的因素。他是个人，像任何人一样不可能安于饑餓和赤膊的。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当整个社会起了激变，封建統治临于解体的日子，阿Q的这种反抗性加强了，正面反抗意識抬头了，他精神上的虛伪反抗，要求發展为现实的反抗。在辛亥革命風暴掀起来的时候，阿Q暴發了震撼未庄人心的“造反了”的呼声，急切要求“投降革命党”，要求“革这伙媽媽的的命”。这完全是有着他性格發展的“一脈相承”的基础的。这个大嚷“造反了”的，确实也就是那暗暗咒罵“兒子打老子”的阿Q，也就是爬牆偷蘿蔔、进城“干勾当”的阿Q，如魯迅自己所說：“人格也恐怕并不是两个”。

这样一个既消極而又有着某种反抗性的性格，既是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时代、特定的社会关系下形成起来的典型性格，它之成为典型，也就一定有着它特殊的意义的。

在封建主义殘暴統治的社会，在統治制度搖搖欲墜的情势中，阿Q这种性格，較之一般奴才，确实是要有意义的，而且不仅如此，我們前面說到，即較之一般固着于土地上的农民，也是有意义的。我們先比較一下閩土吧，閩土是个朴实、善良的农民，可是我們看，他面对着兵、匪、官、紳、饑荒、苛稅、多子的重重苦难怎样？却只是沉痛地忍吞着那無窮無尽的苦难，默默地沉重地搖着头。我們想，这样一个安分守己的人物，即算革命情势激盪起来了，从“故乡”中所表現的看来，能想像他会最先發出“造反了”的呼声嗎？他会充滿激情要求“投降革命党”嗎？这是不可能的。因此，从这一方面說，阿Q的性格比起“靠天吃飯”的农民如閩土及閩土兄弟們是更有典型意义，更表現着时代的傾向性的。再，我們看看奴才武訓吧，他为了求得几个錢，他可以奴顏卑膝地向財主下跪、叩头，可以委曲承欢于統治阶級。而阿Q呢？对統治者独不表格外崇奉的阿Q，却没有这份奴顏媚骨。阿Q不是奴才。他饑肚子了，“看見熟悉的酒店，看見熟悉的馒头，但他都走过去了，不但不想暫停，而且也不想要。”他不可以伸手討嗎？我們知道，平常看別人是“你算什么东西”的阿Q，不

① 見“孙文学說”，第八章。

② 列宁、斯大林：“論中国”，40頁。

会在人前伸手的。饑餓难于忍受了,他宁願“爬牆”;沒有路走了,他宁願“蹬洞口”;走向刑場了,他也还要叫“过二十年又是一个……”,因此,阿Q这样的性格,是不可能給予那个社会的統治者如赵太爷之流称心快意的。这种性格,在那个社会制度下,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代,較之积极維護封建統治权力的奴才如武訓等,更具有特殊的意义的。不过,阿Q这种消极反抗的性格,究竟是那个特定的历史时代中被殘酷的阶级关系所損害、所扭曲了的性格。看到这种性格,我們也緬怀着在那革命情势蓬勃發展、整个社会激盪过程中的、閃耀着斗争光芒的許多人物的光輝的性格。我們想起革命斗士徐錫麟、秋瑾等的英勇壯烈的性格,想起革命領袖孙中山、章太炎等的坚毅不屈的性格,想起农民起义英雄余栋臣(1898年四川起义农民領袖)、刘恩裕(1907年广东廉州抗捐运动領袖)等的冒險犯难的性格,在这些战斗性格的光輝照耀下,我們看到阿Q这种在敌人的無情的侮辱与損害面前,只“怒目而視”、只暗暗咒罵“兒子打老子”的性格,是丑惡的,而且社会向革命的、新的發展阶段迈进的时候,阿Q的这种性格的存在,虽不如反动統治势力、或反动統治势力的帮兇帮閒的存在的那样丑惡和反动,然而究竟是一种消极的存在,究竟是革命前进道路中一种阻碍力量。它不仅是阿Q自己挺身而起的沉重負累,而且是革命力量前进的負累。然而也正因为如此,在这个典型的性格上,我們既可以历历辨認出那个封建社会总崩潰时期农民在尖銳的阶级冲突下的烙印,也隱然看出社会發展的历史动向。这說明,它的出現是为那个历史时代的社会情势所規定,也說明,阿Q的性格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

### 三

然而在阿Q性格的研究中,有兩種普遍意見,是我們不能不注意的。

一种說法是,中国長期的封建統治就是培养“阿Q性”的温床。封建制度中自王公起,以至最下層的衙役,都在逐級連环地培养着阿Q性。他們一面是“羊”,同时也是“兇兽”,遇到比他更凶的“凶兽”时便現“羊”样,遇到比他更弱的“羊”时便現“凶兽”样。并援引魯迅先生杂文中所闡述的“孙皓,治吳的时候,是驕縱酷虐的暴主,一降晋却是如此卑劣無耻的奴才”,“宋徽宗在位时,不可一世,而被擄后偏会含垢忍辱”作为論据,从而論証阿Q的性格就是受这种精神毒素感染而成的,或这种精神已經滲透于中国历史的血肉里,为中国历史的血肉哺育長大的人民,又怎能不承傳这份“宝贝的遺產”呢?也就是說阿Q性格是承傳历史遺產而形成的。这是一种說法。<sup>①</sup>

另一种說法是,清朝后期,封建統治者在帝国主义数十年的不断侵略下失地賠款,天朝的声威扫地無余,但又不肯正視这种可悲的現實,于是产生了精神胜利法。如当时統治者失敗后的自欺欺人的“彼夷邦、我天朝”、“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和慈禧太后的“宁贈友邦,不与家奴”的說法,以及李鴻章的“叩头外交”……等做法,就是这种精神胜利法的具体表現。这种精神胜利法本屬於統治阶级,却傳染到被統治阶级的广大人民中去。也就是說阿Q的这种性格特征是受这种精神傳染而成的<sup>②</sup>。

而这两種說法,很显然,它們的意义是相同的;只是后者較前者肯定了阿Q这一典型

<sup>①</sup> 請參看朱彤“魯迅作品的分析,第二卷,‘阿Q正傳’的分析”、李桑牧“魯迅小說論集”中“‘阿Q正傳’的偉大意义”、巴人“魯迅小說的艺术特点”(文艺报1956年19号)等文。

<sup>②</sup> 請參看李希凡“典型新論質疑”(新港1956年12月号)、張畢来“新文学史綱”。



性格的时代性,这是值得重视的。但实质上,从性格的性质特点方面说,两者同样是,将阿Q的精神胜利法与统治阶级的精神胜利法等同起来,认为阿Q单纯是个消极的、丑恶的存在;从性格的社会基础方面来说,同样是否定阿Q精神胜利法形成的基础的特点。而且这两说,同样是以“统治阶级的思想是统治的思想”为其理论支柱。

当然,这两种意见,并不是没有根据的,但是我们觉得有些问题是值得提出来商榷的,譬如说:阿Q的性格本质和孙皓、宋徽宗等的性格本质是一样的吗?统治阶级的精神胜利法与阿Q的精神胜利法之间没有区别吗?阿Q的思想果然就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吗?甚至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阿Q的精神胜利法的性格特征是由于“承传历史遗产”,或受“感染”、“传染”而成的吗?这些我们觉得都难于作肯定的解答的。

孙皓、宋徽宗等的性格本质是什么呢?这些人物在位时以统治者的身份将人民当作奴隶统治着,一朝失位归为臣僚时,却又安于以奴隶的身份臣事别人,诚如这些评论中所列论的,这些人一面是“羊”,同时也是“凶兽”,这种性格也确实是一种等级制度产生的一级一级制驭的等级压迫现象,也就是鲁迅先生深刻地指出的,这是一种“专制的反面就是奴才”的奴才性格。

然而,以精神胜利法为特征的阿Q性格却不能说与这种性格本质上是一样的。

首先是这种论据是不太可靠的。譬如说,论者认为阿Q被假洋鬼子挥起哭丧棒打了以后,忍受着屈辱不敢反抗,却转而凌辱小尼姑,这是一种畏强凌弱、一种奴役思想的表现,是一种等级压迫行为,这种性格也就和孙皓等一样是种奴才性格。

固然,阿Q性格中如自高自大的因素,不能不说有封建等级制度的影响。但这种自高自大与精神胜利法结合所表现的意义,与其说是奴役别人,毋宁说主要是为了保卫自己。如阿Q捏小尼姑这件事情,便不能说是一种等级压迫的行为,我们前面说过,那根本上是一种排斥异端和洩愤的表现。否则,我们将何以解释他受王胡屈辱后转向假洋鬼子发洩的行为呢?与王胡比较,假洋鬼子绝不可能说是弱者,这是很明显的。而且从阿Q的毕生行状中,我们也找不出一种奴隶主对待奴隶的思想行为。虽然对又瘦又乏的穷小子小D,他也有些看不起,但在“手执钢鞭将你打”的心情下与小D进行的一次“龙虎斗”,却主要是一种争饭碗、争生存的报复表现,诚然,争生存应该面对赵太爷,可是阿Q由于历史性的限制,看不清真正的敌人,只直觉地认为小D夺去了他的饭碗,于是愤愤地向小D扑上去。这是阿Q的悲剧,也是历史的悲剧。而他飘飘然幻想做革命党时,曾想叫小D替他搬东西,“要搬得快,搬得不快打嘴巴”。可是促使他有这种想法的根源,也还是一种对那次夺去饭碗的积怨的报复要求,一个“质朴而又愚蠢”的农民的简单而痛快的报复要求,不是那种奴役思想。

而且什么是奴才性呢?阿Q的性格特征是一种奴才性吗?

孙皓、宋徽宗等那种一面是“羊”,一面是“凶兽”的性格,鲜明的是一种奴才性。

鲁迅先生在“‘题未完’草(五)”中驳斥反动统治者御用文人张露薇的“略论中国文坛”一文,那种恶意污蔑左翼作家向苏联学习的精神为奴隶性时,这样勾勒过一种奴才的嘴脸!“张露薇先生自然也是知识阶级,他在同阶级中发现了许多奴隶,拿鞭子来抽,我是了解他的心情的。但他和他的所谓奴隶们,也只隔一张纸。如果有谁看过非洲的黑奴工头,傲然的拿鞭子乱抽打着做苦工的黑奴的电影的,拿来和这‘略论中国文坛’的大文一比较,

便会禁不住会心之笑。那一个和一羣，有这么相近，却又有这么不同。这一張紙真隔得厉害：分清了奴隶和奴才。”<sup>①</sup>

列宁的“奴才气”一文，在揭露孟什維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并称他們为资产阶级的奴才时深刻地写道：“奴才的地位，使奴才必須把一点点爱人民的行为同百般順从主子和拥护主子利益的行为結合起来，这必然使作为社会典型的奴才是虚伪的。……因为他的職業的根本特点就是要把他‘必須’‘忠心耿耿’为之效劳的主子的利益与供应僕人的那个階层的利益結合起来……。”<sup>②</sup>

这些就是奴才。虽说奴才的社会典型也不只是这几种类型，不过通过这几种类型，也可以看出奴才的臉譜尽管不同，但他們之無可怀疑地都是奴才，就在于：無論这样、那样，他們都是“忠心耿耿”地为豢养着他們的主子服务，以鞭子抽打着“不安分”的同阶级来維持主子的世界的太平这一点，則是他們之間最基本的共同特征。

然而阿Q呢？阿Q对他的統治者如赵太爷之流却不仅沒有这份“耿耿”“忠心”，而且平时是对他“独不表格外崇奉”，革命風浪中是“第一个該死的是小D和赵太爷”，是大嚷着“造反了”从赵太爷面前昂着头走过去，这样的阿Q，能給赵太爷和赵太爷的世界以美滿和平安嗎？这样的性格是奴才性嗎？

阿Q的思想，既不是奴役思想；阿Q的精神胜利法的性格特征，也不是奴才性。阿Q虽然落后、愚蠢，并有些游手之徒的狡猾，但仍然是一个質朴的农民。他不是亡国后的孙皓、宋徽宗等那样的奴才性格，不能与他們混同起来。

又如說，人們認為魯迅先生研究和分析了中國历史，研究和分析了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中国的“阿Q性”，看到了国民性的弱点，于是概括地創造了阿Q。

是的，魯迅先生对中国历史确曾有過極其精湛的研究和分析，但作为一个偉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和革命民主主义斗士，魯迅先生的分析既凶殘又卑劣的一面的历史人物，和他分析“我們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有拼命硬干，有为民請命的人……”一样，主要是为了更深刻地認識野蛮的阶级制度下社会现实的不合理，掌握社会发展情势，从而更有效地进行战斗；他的通过对历史上丑惡現象的揭發，更是命中当时反动統治者及其制度發出的憤恨的反击！他的揭示孙皓等，不正是为了剝露当时北洋軍閥統治者及帝国主义的走狗蔣介石等的“对国民如何專橫，对外人如何柔媚”的丑惡本質嗎？（孙皓一例，魯迅先生曾在两个不同时期写到。一在北洋軍閥統治时期——見“憤”170頁；一在蔣介石統治时期——見“南腔北調集”，93頁。）因此，我們不能以为魯迅先生揭發了历史上那种丑惡的灵魂，就可以作为論証阿Q是奴才主义的典型的依据；同时魯迅先生的小說如此深刻，虽然与他具有深湛的历史知識有关，但不能認為他的創造阿Q，就是概括了历史人物。似乎他提笔写小說，不看现实社会，而看历史似的。要之，我們覺得魯迅先生的研究、分析历史，不可作为將阿Q与孙皓等等同起来的理由。

其次，我們来看看統治阶级的精神胜利法与阿Q的精神胜利法之間有無区别吧。

过去的人們是不是有精神胜利法呢？这是沒有疑問的，一个人对现实的反抗感到無

① “且介亭雜文二集”，172頁。

② “列宁全集”，29卷495頁。

能为力时所發出的“怒目而視”和“肚子里暗暗咒罵”的說法和做法，大概古人也有。所謂“十目所視”，就是“怒目而視”吧，“時日曷喪，余及女皆亡！”也分明是無可奈何時的背地里的咒罵。尤其到清朝后期，封建統治者在帝國主義者面前，明明軍事上失敗，外交上叩頭了，還裝腔作勢地說“彼夷邦，我天朝”，“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等等，都顯然是精神勝利法。而且這與阿Q在現實中失敗後所表現的精神勝利法也有着某種現象和程度上的相似。因此，不管是阿Q也好，是清朝統治者也好，都有着精神勝利法，這是無須爭辯的。這原因就正如恩格斯在論到近代三個階級——封建貴族、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道德學說時所闡述的一樣：“上述三類道德學說中，總歸有某些共同的东西……上述三類道德學說代表着同一歷史發展過程的三個不同階段，因而具有共同的歷史背景，因而也就不能不有許多共同之處。不僅此也，對於共同的或差不多相同的經濟發展階段，道德學說也就不能不多少一致。”<sup>①</sup>可是，恩格斯不是明確地提示我們：“難道這些共同的东西不是一成不變的道德的一般嗎？”（即這種“一般”的东西，恩格斯在本文下面指出，也不是“永恆”的。）所以阿Q及過去歷史上的人們和清朝統治階級共同着的精神勝利法，只不過是“一般”的东西，而這種一般的“共同的东西”，在具體的人物性格中產生的實際基礎及其本質意義，却可以有完全不同之處的。

就以這種精神表現得突出的清朝統治者為例吧，他們的精神勝利法的產生基礎及其本質意義是什麼呢？我們覺得這些統治者對“天朝”敢於抱着“萬古不朽”的妄自尊大的幻影，固然也由於歷史光榮的殘象，但也還是有着廣大的中國河山、善良人民作雄厚的基礎的。同時他們在帝國主義的“利砲堅艦”的轟擊下失敗後，腐朽的骨架完全被剝露出來了，但又害怕人民看透它的腐朽性，喪失統治的威力，於是不能不可恥地用各種幻想的光采的偽裝掩蓋着。顯然，他們是企圖用“天朝”、用“東方精神文明”、用“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來掩飾失敗，作為繼續對人民進行壓迫和剝削的張本。他們雖在現實中失敗了，但在另一方面可以取得實際的滿足——在帝國主義者面前失敗了，可以在他們所統治的人民身上取得補償的。他們這種精神勝利法表現的實際意義，不只是为了精神上的自慰，也是為了加強和鞏固他們那行將墜落的統治權力。他們的精神勝利法固然也自欺，却也欺人；固然是為了精神的勝利，却也為了實際的滿足。而阿Q呢？在強大敵人的瘋狂的壓迫和剝削下所表現的精神勝利法，像我們知道的，它僅僅是一種虛偽的反抗、一種自欺的自慰而已。只是自欺，並不足以欺人；只是單純的精神勝利，毫無實際勝利的意義，相反的，還使他陷於不能有現實鬥爭的企圖。阿Q的精神勝利法與統治階級的精神勝利法在本質上顯然是不同的。

至於“每個時代里，統治階級的思想就是統治的思想”，這一名言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沒有什麼可懷疑的。現在問題是，阿Q的思想是不是可以歸納於統治的思想的範疇之內呢？

我們知道一種統治思想，它應該不從這個角度、就從那個角度作為維護統治制度而存在的社會精神力量，正如馬克思恩格斯他們自己所解釋的，“是那些使這一階級成為統治階級底觀念的表現。”而阿Q的這種精神，實質上是不是這種力量呢？當然，阿Q長期生

<sup>①</sup> “論宗教”，23頁。

活在封建主義統治下，必然接受了統治階級的思想的教育和薰陶，他的那些“合乎聖經賢傳”的想法，嚴“男女之大防”、排斥異端，以及曾經對革命黨的“深惡而痛絕之”等思想都是封建思想。但是，我們所理解的阿Q的最基本的性格特征，現實中失敗後的要取得精神上的勝利這一點，我們看不出有如“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等的積極維護封建統治權力的意義，最初甚至也不是自慰，正如恩格斯說到“靈魂不死的觀念”的發生最初不是宗教上的安慰，而是一種無可奈何的命運，是肯定的不幸一樣，<sup>①</sup>阿Q所表現的一切精神勝利法的說法和做法，也是一種無可奈何的命運、一種不幸。

我們已經認識了阿Q的精神勝利法與奴才們、以及清朝統治階級的精神都有着本質上的區別，現在就可以進一步來考察阿Q這種精神勝利法的性格特征是不是由於歷史遺產的“承傳”、或統治階級思想的“感染”或“傳染”的了。

每一個時代里，人們的思想、精神、性格的形成，與他們的民族歷史，有着不可割斷的臍帶聯系。阿Q是中國的土著產物，是中國封建社會沒落時期的產物，阿Q性格中有着中國歷史的、當時沒落的統治階級的思想的血緣，這是自然的。不過儘管有着這些聯系，我們能說阿Q的這種精神勝利法的性格特征的形，就是由於歷史遺產的“承傳”嗎？是由於統治階級思想的“傳染”嗎？

如果，一個典型性格的產生，是由於歷史遺產的“承傳”，那末首先必須有着這樣的前提：過去歷史上已經屢屢存在着這種典型性格。然而，阿Q這種特定的典型性格，是任何其他歷史時代都可產生的嗎？那阿Q還能成其為“典型環境中的典型性格”嗎？再說，如果是“統治的思想”“傳染”的，那不是將阿Q這種性格特征與統治者的精神等同起來，不是同樣要抹煞阿Q的典型性格嗎？

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的批判”序言中愷切簡明地指出：“意識必須從物質生活的矛盾中、從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衝突中，予以說明。”很顯然，人們的意識總是實際生活的反映，要從社會生產關係的衝突中求得說明。我們探索阿Q性格的形成，也只有這樣，也只能這樣了。

如我們已經知道的，阿Q的這種典型性格，如果不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總崩潰時期生產關係的尖銳衝突下，如果不是封建統治者喪失最後的一點道德和人性，阿Q的精神勝利法當不至表現得如此鮮明和突出吧；如果不是革命浪潮的洶湧形勢下，阿Q為改善生活地位而掙扎所表現的精神反抗也不會如此鮮明、以至最後要求“投降革命黨”的吧。因此，阿Q這種典型性格只能是特定時代的生產關係的尖銳衝突下、特定時代的社會發展情勢下形成起來的。如果按照那些說法，阿Q這一典型性格，不產生於物質生活的矛盾中、社會關係的衝突中，而產生於歷史遺產的“承傳”、或統治階級思想的“傳染”，那不僅抽掉了典型性格的社會基礎，閹割了阿Q典型性格誕生的歷史的現實意義，而且將導致典型論的混亂。

#### 四

一個現實主義的藝術典型，必然是具有生動鮮明的個別性以充分地體現廣泛的一般

<sup>①</sup> 恩格斯：“費爾巴哈論”。

性。阿Q就是这样充分地体现了广泛的社会人羣的一般性的典型，因此，当这部小说还正在报上一段一段陆续发表的时候，就有不少的大小官僚政客感到慄慄危惧，恐怕以后要骂到自己的头上。当我们读的时候，也不会是毫不感受到鞭撻力量的。这正是文学艺术形象的美学意义和社会意义，也正说明了阿Q典型的一般性的广泛。

正因为这个典型以它的个别性充分地具现了如此广泛的一般性，所以也就容易使人将它与历史上的奴才，以及统治阶级的精神胜利法联系起来，甚至等同起来。

但是在艺术形象的分析中，如果我们忽视了典型的个别性，而偏执它的一般性，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脱离了人物的具体形象、脱离了人物特定的时代的社会的具体条件、脱离了典型的个别性，它的一般性便可能是贯穿于古今中外的历史中去的東西，一个没有个别性，——甚或个别性不鲜明的性格，也一定不可能是一个典型的。因此，典型是“以个别显现一般”，而绝不是以一般代替个别。

譬如说奥勃洛莫夫的“惰性”吧，这当然是有着广泛社会基础的“一般性”。可是，如果我们试图脱离奥勃洛莫夫本身，脱离他那有着“一个查哈尔，和三百个同样的查哈尔”的生活地位；脱离他那贵族家庭的教养所养成的由于取予求的任性而发展的毫无毅力的性格，以至只耽于幻想，害怕与现实接触；脱离当时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人们要求从事社会活动的情势，从而使奥勃洛莫夫更显得无用，脱离这些来看奥勃洛莫夫的“惰性”，这种惰性不仅可以与高列赫伐斯托夫的性格一致，也可以与畢巧林的性格一致。很显然，这样却模糊了这人物的性格，丧失了这个伟大的典型。

同样我们对阿Q这一典型的精神胜利法，也应该这样理解，也只能这样理解。如果我们脱离阿Q的具体形象，脱离阿Q的实际的社会地位，脱离当时由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彻底崩溃，封建统治者对人民进行疯狂的压迫和剥削，以及蓬勃发展着的革命形势给予他的影响，使他长期处于被凌辱、被损害的生活中，而又不安于这种生活，从而要求反抗，但现实中又可悲地丧失了反抗的可能，脱离这些来理解阿Q性格中的精神胜利法，他不仅可以与反动统治者、封建官僚、政客的精神胜利法混同，也可以与奴才的“含垢忍辱”而无怨望的性格混同，这样“一般性”固然是“一般性”，然而却模糊了阿Q的典型性，丧失了阿Q这一个典型。因为我们认识中的阿Q的精神胜利法的典型性，却不是那样单纯消极、丑恶的存在，它是渗透着阿Q对生活的挣扎、对怨敌的反抗的意图的。这种精神胜利法又怎能与其他人的精神胜利法混同呢？

同时，阿Q既是一个光辉的现实主义的典型性格，它必然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一个典型性格，既是特定时代、特定社会关系下的产物，它必然带着哺育它成长的这一时代的社会情势的血液，像一个胎儿带着父母的血液一样。因此，在典型性格中必然显现着特定时代的社会发展趋势的跡象。这是它之所以成为充分的现实主义的典型的原因，也是它区别于其它典型，区别于任何其他历史时期、其他阶级有着某种共性的性格的标志。

就我们熟知的一个有关典型的例子，哈克納斯的“城市的姑娘”来看吧。恩格斯之所以批评“城市的姑娘”还不是充分地现实主义的，是因为哈克納斯所描写的1887年代倫敦东头工人的性格是消极的，没有显示具有五十年光景的无产阶级的斗争的荣誉，没有具现当代的社会发展情势；而这情势，在一个当代的典型的工人性格中应该是不可避免地给

留下烙印的。哈克納斯沒有寫出這種社會發展情勢下的性格，那末所寫的也就不是充分地現實主義的。因此，充分地現實主義的典型性格，既是特定時代的、社會情勢下的性格，這種性格中鮮明地體現着當時的社會發展情勢，成為這個性格之所以是這樣而不是那樣的性格的決定條件，這應該是必然的了。

阿Q的精神勝利法的典型性，正充分具現了由沒落的統治者加予一個貧苦農民的壓迫和剝削的瘋狂性所體現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總崩潰時期的情勢；同時，也充分具現了由革命浪潮給予一個無衣無食、不斷要求改變生活地位的農民的強大影響所呈現的時代徵兆。這種性格，是形成於特定的歷史時代的社會情勢下的性格，它鮮明地帶着這種特定歷史時代、社會情勢的強烈特徵，社會發展趨勢的跡象的。

因此，阿Q是個典型環境中的典型性格。它的出現，絕不可能是由於任何其他歷史時期人物性格“感染”或“承傳”歷史遺產的。那任何時代都可“感染”、或“承傳”遺產而出現的東西，將只能是歷史上的游魂，而不是典型性格；同時，阿Q這一典型又是具有着鮮明的個性的人物，他的性格中不僅具現着“典型環境”所規定的特殊性，而且也由此具現着獨特的現實意義。它的形成，不可能是由於任何“傳染”。那由“傳染”而形成的將只能是一種普遍的東西，而不是典型。

而且，阿Q這樣一個典型性格，是作者通過它反映他所認識的社會現實生活的真實，它是社會的發展情勢所規定的，同時，也是和作者的世界觀與美學思想有關係的。

一個作者以怎樣的態度對待生活、看取現實，以怎樣的美學觀點評價社會、評價人生，在自己的血肉孕育而誕生的人物性格中，自然要流露出自己的思想感情。

以一個偉大的革命民主主義鬥士和作家來說，魯迅先生固然也可能創造一個奴才的典型、或統治階級思想的典型，作為對消極丑惡現象鞭撻的對象的。可是，他對阿Q就像對奴才或統治思想一樣單純只有鞭撻嗎？而且，單純為鞭撻一種消極、丑惡的現象，就奴才性來說，作者不是很可以直接塑造一個十分循規蹈矩、對主人不敢有任何怨望的農民隊伍中游離出來的奴才嗎？不是可以塑造一個“折中、公允、調和、平正之狀可掬，悠悠然擺出別人無不偏激，惟獨自己得了‘中庸之道’似的臉來”的、以伶俐的皮毛為闊人、太監、太太、小姐們鍾愛的叭狗兒似的知識份子中游離出來的奴才嗎？不是可以索性塑造一個“倚徙華洋之間，往來主奴之界”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的西崽式的奴才嗎？總之，鞭撻這些人物，不是更切實更能夠鞭鞭見血地鞭撻奴才性嗎？而他卻為什麼創造一個“不安分”、不能令主人愉悅的阿Q呢？

再就統治思想來說，作者直接塑造一個“對國民如何專橫，對外人如何柔媚”的統治者，不是更充分更實際地表現了統治思想嗎？或者塑造一個吮人的血，還要講道德說仁義的、像蚊子一樣叮人還要哼哼地發一篇大議論的“正人君子”式的典型，或一個“走在一羣胡羊面前，頸子上還掛着一個小鈴鐺，作為知識階級的徽章”的山羊式的知識份子中的統治思想的代表人物，這些人物，不是更多地接受了“聖經賢傳”的教化，更忠心於替統治階級“治國平天下”統治人民，從而更能夠集中表現統治思想的嗎？鞭撻這些人物，不是較鞭撻一個貧僱農民阿Q，更能夠命中統治思想嗎？而作者卻為什麼創造了這樣一個最後呼喊與統治思想絕不相容的“造反了”的阿Q呢？

從這裡，我們可以知道，魯迅先生對他的阿Q，不可能單純是為了鞭撻，还有着他深厚

的同情和热切的期望。他对这“大石底下的小草”一样的灵魂，倾注了他无限的关怀和爱。鲁迅先生自己就说过：“我的小说出版之后，首先收到的是一个青年批评家的谴责，也有以为是病的、也有以为是讽刺的；或者还以为冷嘲，至于使我自己也要疑自己心里真藏着可怕的冰块。”<sup>①</sup> 这意思，和他说过创造阿Q“实不以滑稽或哀怜为目的”是一致的。有力地说明了他对他的阿Q不是冷酷无情、或深恶痛绝的。而且在他发掘人民革命动力的深刻思想指导下进行艺术创造，他的阿Q不可能单纯是一个消极、丑恶的存在，为人们想象中的奴才、或统治阶级思想的化身一样。

总之，阿Q的精神胜利法，有着它独特的社会基础，在这基础上形成起来的阿Q的精神胜利法，本质上不同于其他历史人物或清朝统治阶级。阿Q的这种性格特征中虽有着严重的消极、丑恶的因素，但也有着精神上没有屈服的、反抗因素。伟大的人道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者鲁迅先生，在痛切要求改造当时中国那种“病态社会”的忧愤深广的胸怀下，在寻找革命力量的激情下，鞭撻着他以及他的兄弟们的这种弱点，催促他们积极起来，成为正面的革命力量。因此，在这个性格上，历史地、具体地揭示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上层社会的惰落，下层社会的不幸”，暴露了统治阶级崩溃时期的疯狂的压迫和剥削，以及由于这种压迫和剥削所造成的人民——尤其贫苦的农民从物质上到精神上所遭受的令人不堪忍受的磨难与灾害；显示了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社会发展的趋势，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民的反抗意图，闪耀着作者高度的艺术真实和美学理想。通过这个性格，人民作出来的结论，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是激发人心的要求进行一次远比资产阶级领导的更坚决、更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社会革命斗争！阿Q是一个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他带着特定历史时代社会发展的情势，显示着时代的征兆，正因为这种，这个典型的性格，在世界文学的宝库中，永远放射着辉煌的光芒！

1957年3月

<sup>①</sup> “集外集”，87页。





# 試論当前我国經濟發展中的矛盾与發展

## 工業和發展農業同时并举的指導方針

牟 甲 寅\*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民族民主革命，取得了革命的胜利。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我国已经进入了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党和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根据这一总路线和总任务，我国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结束之后，从1953年起，开始进入了国民经济的计划建设时期，党制订了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根据过渡时期总任务的要求，规定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主要任务是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帮助我国设计的156个建设单位为中心的、由限额以上的694个建设单位组成的工业建设，建立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发展部分集体所有制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并发展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建立对于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步基础；基本上把资本主义工商业分别地纳入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建立对于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机关领导全国人民为实现过渡时期总任务而奋斗的带有决定意义的纲领。现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已经结束，由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英明领导，由于全国人民，尤其工人和农民的高度革命热情，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以及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无私援助，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已经超额完成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已经建立起来了，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我国已从多种经济成份，改变为单一的社会主义经济成份，这标志着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基本完成。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随着工农业生产建设的发展，国民经济其它部门也有了相应发展，人民物质文化生活也有了一定的改善，国防力量也更强大了，国际威望也大大提高，这些都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伟大成就。同时，在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过程中，也出现了新的矛盾和问题。“目前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主要矛盾是消费资料生产的发展赶不上生产资料生产发展的需要，特别是农业生产的发展赶不上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同时，在生产资料的发展方面，原材料工业的发展又赶不上加工制造工业发展的需要。这样，在我国国民收入的积累和消费之间，也就出现了新的矛盾，人民消费水平的提高较慢，国家所增加的收入大部分只能用于积累。”<sup>①</sup>正

\* 本文作者系经济系四年级学生。

① 参看“薄一波向天津市干部报告编制1958年计划控制数字问题”，新华半月刊，1957年第17期，206页。

确地解决上面所說的各种矛盾,是第二个五年計劃时期和今后社会主义建設的主要任务。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的矛盾問題”的报告中,提出了在优先發展重工業的基础上,發展工業同發展农业同时并举的方針,正是針对着解决消費資料生产的發展赶不上生产資料生产發展的需要,特别是农业生产的發展赶不上整个国民經济發展的需要这一矛盾提出来的,从而也是針对着解决国民收入中积累和消費之間的矛盾提出来的。本文的目的,是企圖对农业生产的發展赶不上整个国民經济發展需要这一矛盾的性質,發展工業和發展农业同时并举这一方針的客觀依据,内容和特点,以及它在理論上和實踐上的重大意义,作一初步探討。

## 二

为了正确認識农业生产的發展落后于工業生产發展,赶不上整个国民經济發展的需要这个矛盾的性質,我們必須对这个矛盾产生的原因进行考察,那么,我們首先要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設所借以进行的那个經济基础,作一簡單回顧。旧中国社会,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長期以来,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資本主义的压迫和剝削下,中国經济处于非常落后的状态。現代工業在整个国民經济中所佔的比重很小,在1936年,現代工業的产值只佔工农业总产值的10.9%,农业和手工業佔89.1%。到1949年以1952年的不变价格計算,現代工業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只佔17%,左右。旧中国工業生产水平是很低的,如1936年年产量,生鉄只佔世界12位,鋼第18位,煤第7位,棉布第4位。在整个工業中,大型工業少,小型工業多,全能厂少,协作厂多。生产生产資料的工業比重小,生产消費資料的工業比重大。輕工業佔很重要的地位,在1936年,仅紡織工業和食品工業的产值,就佔了工業总产值的50%以上。1936年消費資料的产值佔工業总产值的72%,生产資料的产值只佔28%。1949年,消費資料产值佔工業总产值的71.2%,生产資料只佔28.8%。旧中国冶金,燃料,电力,机器制造等工業部門極為落后,特别是机器制造工業,在1936年,全部工業总产值中,机器制造工業产值只佔2.2%,到1949年下降为1.7%。而且都是一些修配性工業,或只能制造一些簡單的机器,至于制造大型的或精密的机器設備就更談不上了。而在这仅有的一点工業中,大部份为外国帝国主义所控制,在20世紀40年代,包括东北在內,外国資本在电力工業中佔58%,煤矿工業中佔75%,鉄矿开采佔90%以上,有色金屬佔80%以上,織布佔64%,卷煙佔58%。旧中国工業在地区分布上,工業部門之間和工業部門內部都是不平衡的,由此可見,旧中国工業水平,如与最先进資本主义国家比較約落后100—150年。甚至还赶不上印度,如以1933年中国鋼的产量来看,只有同年印度鋼的产量 $\frac{1}{28}$ ,紗錠不及印度的 $\frac{1}{2}$ ,布机只有印度的 $\frac{1}{5}$ ,与世界上先进資本主义国家和苏联相比較,就显得更加落后了(請參看下頁兩表)。<sup>①</sup>由于工業落后,旧中国每年需要鋼鉄的95%,机械的76%,石油的99.8%,砂糖的60%,紡織品的21%都要靠外国进口。而且由于八年抗日战争和三年解放战争,国民經济受到了很大破坏。旧中国的农业同样落后,資本主义在农业中沒有多大發展,个体小农經济佔了絕大比重,在地主,官僚和帝国主义的压迫掠夺之下,农民陷于極端貧困的境地,不仅無

<sup>①</sup> “統計工作通訊”,1956年第22期,第25頁。

表一：1936年中国与世界主要国家主要工業品产量比較表

	單位	产 量				各国为我国的倍数		
		中 国	苏 联	美 国	英 国	苏 联	美 国	英 国
电 力	亿 度	37.95	364.00	1,465.00	242.00	10	39	6
原 煤	百万吨	39.56	126.00	447.85	232.12	3	12	5
生 鉄	万 吨	81.00	1,440.00	3,153.00	785.00	18	39	10
鋼	万 吨	41.43	1,624.00	4,853.00	1,197.00	39	117	29
棉 布	亿公尺	34.58	34.48	79.21	33.28	0.99	2.3	0.96

表二：

	單位	以人口平均每人分得的产量				各国为我国的倍数		
		中 国	苏 联	美 国	英 国	苏 联	美 国	英 国
电 力	度	7.9	219.3	1,144.5	514.9	27	141	63
原 煤	公斤	83.0	761.0	3,498.0	4,938.0	9	41	58
生 鉄	公斤	1.7	84.4	244.5	165.9	50	144	98
鋼	公斤	0.9	95.3	376.3	253.2	106	418	281
棉 布	公尺	7.34	20.28	61.42	70.38	2.8	8.4	9.6

力扩大再生产,甚至連簡單再生产也不能維持。旧中国名义上是一个农业国,但每年都須进口大量粮食和棉花。在交通運輸和国民經济其它部門,也同样处于非常落后的状态。新中国从反动派統治下的旧中国接收的經济遗产,是非常菲薄的。新中国成立以后,一方面在农村中进行翻天覆地的土地改革运动,在土地改革以后,又立即领导农民走互助合作的道路,發展农业生产;一方面沒收帝国主义和官僚資本,改变为社会主义全民經济,同时采取了許多措施来恢复和發展我国的工业生产。在恢复时期結束的时候,农业生产有了很大發展,許多主要农产品已达到或超过历史上最高年的生产水平。以1949年产量为100,1952年粮食产量是114.8%,棉花是293.4%。工业生产的恢复和發展,成績也很大,到1952年,現代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已上升到26.7%;生产資料生产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已上升到39.7%,消費資料生产已下降为60.3%,机器制造业产值已佔工业总产值的5.2%。主要工业品也都有了很大增長。由于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發展,国家財經情况也已經好轉,物价也基本上稳定,恢复时期的胜利結束,有計劃地进行經济建設的新时期随着到来,为了把我国这样贫穷和落后的国家建設成具有現代工业,現代农业和現代科学文化的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首要的任务,便是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即是实现以优先發展重工业为中心的,能够按照自己的面貌来改造整个国民經济一切部門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只有这样,才能根本改变我国經济的落后状态。我国發展国民經济的第一个五年計劃,正是充分体现了这个方針的要求。同时,我們也相应發展农业和其它經济部門,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如果我們在那时也来一个“工农业并举”,就超越了客觀的可能性,是不现实的。原因何在呢?第一,农业固然落后,工业也同

樣落后,農業落后于工業的矛盾,當時是不存在的;要發展農業生產,必須要工業的大力支援,當時的工業要擔負這個任務是不可能的。第二,我國資金有限,我們必須集中最大部份財力、人力、物力來進行工業尤其重工業建設,不能百廢俱興。第三,從農業本身來看,1952年土地改革才基本完成,互助合作運動還剛剛開始,分散落后的個體經濟還佔絕大部份,它限制着農業的高速度發展。因此,這時期在農業中的任務,是要把勞動農民的個體經濟通過合作化的道路,改造成為社會主義的部份集體所有制,並在這個基礎上,發展農業生產。所以,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集中了主要力量進行以蘇聯幫助我國設計的156個建設單位為中心的,由限額以上的694個單位組成的工業建設。限額以下的工業建設共有二千多個。這是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最首要任務,今天,這個任務我們已經勝利完成了,我們已經建立了我國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初步基礎:按照1957年的預計完成數字,和1952年比較,工農業總產值增長了62%,其中工業產值增長了132%,手工業產值增長了66%,<sup>①</sup>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經濟和文教部門的基本建設投資總額預計為484.9億元,其中工業部門的基本建設投資273.8億元,(佔56%以上)開始施工的限額以上的建設單位有820多個,預計在去年年底可以全部建成的有450個,其中屬於蘇聯幫助設計的156項的有57個,(此外還有部份建成投入生產的10個);限額以下的建設單位計劃為2300多個,在計劃執行中有很多增加,並且絕大部份可以在1957年年底建成,由於上述建設的完成,1957年我國工業固定資產總額將比1952年增長一倍以上。我國工業生產能力大大提高了,列入第一個五年計劃的46種主要工業產品,已經有36種提前達到五年計劃規定的1957年水平,除原油、捲煙、砂糖等少數幾種產品由於客觀條件不能完成計劃以外,其它大部份產品將完成或大大超額完成。到1957年底,發電量預計達到190億度以上,為解放前最高年產量的3.2倍,原煤預計達到12,837萬噸,接近解放前最高年產量的2.1倍,鋼預計達到524萬多噸,為解放前最高年的5.7倍,<sup>②</sup>其它主要工業品也有了不同程度的增長。與此同時,建立了一系列新的工業部門,改變了我們過去在殖民地半殖民地時期所造成的工業基礎薄弱和殘缺不全,互不配合的狀態,使我們變為一個具有飛機製造業,汽車製造業,新式機床製造業,高效率蒸汽機車製造業,發電設備製造業,冶金和礦山設備製造業及高級合金鋼,重要有色金屬冶煉業的國家。我國以鞍鋼為中心的東北工業基地已經基本完成,上海和其它沿海城市的工業基地也都已經大為加強,同時,在華北地區,華中地區和西北地區,新的工業區正在形成。在西南地區和華南地區也開始了部份的工業建設,我國原有企業經過改建,擴建和經營管理的改進,生產能力也有了很大發揮。因而,使我國工業總產值五年間增長132%,其中生產資料工業產值增長兩倍左右,消費資料工業產值增長80%左右。1956年,工業總產值在工農業總產值中的比重已經達到45.6%,加上手工業產值,佔54.7%,1957年將有進一步提高。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金屬材料的自給能力已經達到80%以上,機器設備的自給能力已經達到60%以上,我國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初步基礎已經建立起來了。與此同時,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在工業中也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國家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已基本完成,在1956年全國工業總產值中,國營工業已經佔54.5%;合作社工業包括供銷合作社的加工工廠和合作社

① “必須堅持多快好省的建設方針”,人民日報,1957年12月12日社論。

② 同上。

化手工業佔 17.1%；公私合營工業佔 27.1%；資本主義工業和个体手工業只佔 1.3%。由此可見，我国建立起来的工業化初步基础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工業化而不是随便什么的工業化。这些偉大成就，是由于我們坚决走以优先發展重工業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工業化的道路的结果。但是，我們在进行工業建設的同时，并没有忽略農業的發展。并没有低估農業在国民經济中的重要地位，我們在第一个五年計劃中写道：發展農業是保證工業發展和全部經济計劃完成的基本条件。“工業和農業是国民經济的兩個主要部門。農業提供了發展工業的条件。……我們要發展工業，但决不能够減輕發展農業的意义。相反，实际生活已經更加証明農業对于發展工業的極端重要性。沒有農業的相应發展，我們的工業化事業是不可能實現的。如果農業的發展赶不上工業發展的需要，如果工業農業生产之間失去平衡和日益脫节，就势必造成很大的困难，严重地影响工农联盟，而至打乱国家的整个建設計劃。”<sup>①</sup> 在第一个五年計劃建設过程中，当出現了農業生产發展赶不上国家建設和人民需要的时候，党和国家把農業的發展当作“不仅是一个方針或原則問題，而且是一个重大的現实的战斗任务。”<sup>②</sup> 因此，在第一个五年計劃期間，我們对于農業生产，給予很大注意。農業合作化运动逐步、迅速开展，經過 1955 年底开始的農業合作化高潮以后，到 1956 年底，参加入農業生产合作社的农户已佔全国农户总数的 96.3%，其中加入高級社的农户佔全国总农户数的 88%。農業合作化的基本完成，是第一个五年計劃最偉大的成就之一。与農業合作运动的同时，国家和全体农民为了發展農業生产，进行了極其巨大的工作，也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就。这些工作和成就，总起来說有以下几方面：在財政工作方面，五年来，国家对农林水利事業的撥款共有 75 亿元，增加的貸款將近 29 亿元，农民自己用于生产的投資約有 100 多亿元。国家还通过稅收政策和价格政策鼓励農業生产的發展。从 1951 年起貫徹了合理負擔的農業稅政策后，几年来在繼續稳定的原則下，農業稅在国家全部稅收中的比重已从 1950 年的 39% 降低到 21%；农产品的采購、收購价格也作了适当的調整，使农民得到合理的利益，提高农民生产的積極性。在水利建設方面，几年来国家投資建筑大型水庫十多座，已着手根治淮河，开始治理黄河和其它河流。从 1949 年至 1956 年为止，七年来共新建及整修渠塘 1,400 多万处，共增加水井 500 多万眼，七年間水利部共貸放水車 100 多万个，全国用于农田水利方面的抽水机共有 39 万匹馬力。此外，还进行了大規模的水土保持工作，由于国家和农民羣众的努力，到 1957 年止共增加灌溉面积二亿三千多万亩，等于我国到 1952 年为止几千年開發的灌溉面积三亿五千万亩的 65% 以上。另外还改善了灌溉面积四亿亩以上。在开荒方面，由于国营农場的开荒，移民开荒和合作社的就地开荒，耕地面积逐年有所扩大，五年累計共扩大耕地面积 7,756.5 万亩，播积面积約扩大二亿八千万亩。国家对農業生产資料的供应方面，五年內国家供应了化学肥料 600 多万吨；推广新式农具五年累計共 433 万件，其中仅双輪双、單鏵犁一項共推广 150 多万件；农葯的使用逐渐普遍，五年来共推广 28.5 万吨，五年累計，葯剂防治病虫害面积共十五亿亩。在采用良种，推广先进經驗，使用現代科学技术成就方面，也进行了許多工作，种植良种的面积不断扩大，到 1956 年，粮食良种播种面积已佔全部粮食播种面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發展国民經济的第一个五年計劃”，第 79 頁。

② “必須在發展重工業的同时，相应地發展其他經济事業”，人民日报，1954 年 3 月 4 日社論。

积的36%，棉花則佔到90%，1957年推广优良品种面积达到113,762万亩。在农业企业事业机构的设置方面，国家为了帮助农业的发展，几年来相继设立各种农业企业事业机构，到1956年为止，共设立了国营农牧场2,547个，其中有机化农场166个，共有拖拉机4,422标准台，联合收割机950台；拖拉机站326个，共有拖拉机9,862标准台；技术推广站14,230个；畜牧兽医站2,257个；民用牲畜配种站545个；新式农具推广站207个。在造林方面，从1952年至1956年造林面积累计已超过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的任务，其中仅1956年造林面积就达到5,000万亩。<sup>①</sup>从上面的材料我们可以看到，几年来国家和全体农民为了发展农业生产做了许多工作，因此，农业生产也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农业总产值增长了26%。几年来各种主要作物播种面积、单位面积产量和总产量都有了增长。大小家畜头数也有所增加。从1949年到1952年粮食作物每年平均发展速度是12.6%，从1952年到1956年是4.3%。到1957年粮食总产量达到3,700亿斤，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共增长700多亿斤。1957年棉花总产量达到3,200万担，五年间增长390万担。在牲畜方面，1956年大家畜比1949年增长46%，小家畜增长76%。我国农业生产这样的增长速度，同资本主义国家比较起来是很快的了。（请参看表三、表四、表五。）<sup>②</sup>

随着工农生产的发展，人民生活有了相应的提高。失业现象已经基本上消灭了。1957年和1952年相比，全国职工的平均工资增长了30%以上，（劳保基金、医药费、福利

表三：1949—1956年主要农作物播种面积，单位面积产量，总产量增长指数

（以1949年为100）

	播 种 面 积	单 位 面 积 产 量	总 产 量
粮食作物	122	138	169
稻    谷	130	131	170
小    麦	127	142	180
杂    粮	111	134	149
薯    类	157	142	222
大    豆	145	139	201
技术作物			
其中 棉    花	226	143	325
黄 洋 麻	484	145	700
烤    烟	633	147	930
甘    蔗	204	160	328
甜    菜	938	92	864
花    生	206	128	263
油 菜 籽	143	88	126

① 上面材料见：1. 国家统计局关于1956年国民经济建设计划执行结果公报。  
2. “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人民日报，1957年11月14日第四版。  
3. 李富春：在中国工会八大上的报告。  
4. “统计工作”1957年14期，第12页。  
5. 人民日报，1958年1月1日图表。

② “统计工作”，1957年第14期，第10、11页。

表四：平均發展速度

	1949—1952	1952—1956
糧食作物	112.6	104.3
稻    谷	112.1	104.8
小    麦	109.5	108.2
杂    糧	112.9	100.9
薯    类	118.4	107.6
大    豆	123.2	101.8
經濟作物		
棉    花	143.2	102.6
黄    洋    麻	202.5	—
烤    烟	172.9	115.8
甘    蔗	139.1	105.0
甜    菜	135.9	136.2
花    生	122.2	109.6
油    菜    籽	108.3	—

表五：1949—1956 年大、小家畜發展情况

家    畜    名    称	1956 年 头 数	1956 年为 1949 年的%	1956 年为解放前最高年%
大    家    畜	87,370	146	122
牛	66,601	152	138
馬	7,372	151	114
驢	11,686	123	96
騾	1,711	116	37
小    家    畜	175,680	176	125
羊	91,654	216	147
猪	84,026	145	107

費等还不計算在內);农民收入也大約增加了 30%。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計劃所規定的改善人民生活的指标。

我們回顧了旧中国的經濟狀況,几年来我国工、農業生产建設的成就,綜合起来說,可以得出以下几点:

第一,生产資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經基本完成,我国已从多种經濟成份轉变为單一的社会主义經濟成份的国家。社会主义的物質基础已經在我国建立起来了,虽則还很充分。这是具有非常重大意义的事件。在下面,我們所討論的問題和解决办法,正是和这个变化有不可分割的关系。

第二,由于我們采取了优先發展重工業的社会主义工業化方針。在第一个五年計劃期間,我国工業得到了巨大發展,我国社会主义工業化的初步基础已經建立起来了。与此同时,我們对發展農業也給了很大的注意,上面已經說过,在第一个五年計劃期間,对農業的發展由于客觀条件的限制,不可能采取最快的速度,只能采取相应(或積極)發展農業的方針。虽然如此,我們在第一个五年里,对農業生产也做了很多工作,取得了很大成就。

第三，在第一个五年計劃期間，農業生产的發展和工業生产的發展基本上是協調的，並沒有产生脫节的現象。我們从上面有关数字中可以看到，農業本身有了較大發展，粮食和主要經濟作物的产量都有所提高；工業生产增長速度是特別突出，1956年我国工業發展速度占世界第一位（根据联合国統計）。利用农产品作为原料的輕工業生产，也逐年都有增加。由此可以証明，我国工、農業生产並沒有發生相互脫节的現象。当我国第一个五年計劃剛提出来的时候，帝国主义进行了惡毒的嘲笑和攻击，說我們是“水中捞月”。当我国社会主义工業化取得了不可否認的巨大成就以后，帝国主义又轉而攻击我国農業，說我国農業如何落后，說我們是靠牺牲農業来进行社会主义工業化等等。在中国共产党整風期間，資產階級右派对党和社会主义發动了瘋狂进攻，右派份子罗翼羣說“农民生活接近餓死邊緣”。右派份子陈振汉也惡毒地攻击我們的經濟建設工作，說我們犯了“严重的錯誤”和出了“幅度很大的偏差”<sup>①</sup>帝国主义和右派份子的这些攻击和誣蔑，是完全站不住脚的，这只能說明他們同是一丘之貉，只能說明他們对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人民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刻骨仇恨而已。但是，我們也不怕承認缺点，由于農業發展較慢，对国家建設和人民生活的提高，有一定的影响，后面將談到这一点。

第四，農業生产的發展落后于工業，落后于国家建設和人民生活的需要这个矛盾，是相对性的，它的根本原因是在于農業發展还比較慢，和工業的發展相比較，和人民生活提高的需要相比較，就显得慢了一步。从下面表里的数字可以看到，五年工業生产增長很快，幅度很大，農業則受种种客觀条件的限制，增長較慢，二者相比，有一个較大的距离。但是我們必須区别清楚，我国農業的相对落后与資本主义国家農業停滯不前，大大落后于工業的狀況，是有本質的不同。

表六：我国第一个五年計劃工農業生产發展速度比較表（以1952年为100）<sup>②</sup>

	1957年計劃		1956年实际		1957年实际	
	1957年比1952年增長%	平均每年增長速度	1956年比1952年增長%	平均每年增長速度	1957年比1952年增長%	平均每年增長速度
工業总产值	98.3	14.7	104	19.5	130	
生产資料产值		17.8		23.9	200	24
消費資料产值		12.4		14.8	80	
手工業产值	60.9	9.9		12.6		
农副業总产值	23.3	4.3	19	4.4	26	
粮食总产量	17.6	3.3	18		20	
棉花总产量	25.4	4.6	11		25.6	

我国当前農業生产發展的相对落后，还表現于随着国家建設的發展，粮食，棉布，油

① “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参考資料选輯”，人民大学1957年版第240頁、300頁。

② 材料来源：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發展国民經济的第一个五年計劃”。

2. 国家統計局：“1956年国民經济計劃执行結果公报”。

3. 李富春：“关于我国第一个五年計劃的成就和今后社会主义建設的任务，方針的报告”，人民日报，1957年12月8日。

4. 1957年農業数字見：人民日报，1957年12月29日第一版圖表。



料,畜产品等的供应便变得比較紧张。另外,还有一些工業品也出現了供不应求現象。但在国家对粮食,棉花,棉布等实行計划收購計划供应以后,(同时大力提倡节约)这种紧张情况就得以緩和。

第五,由于我国生产資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經基本完成,資產階級已趋于消滅,农业中小农經濟已基本改造成社会主义的合作經濟,农民自發的资本主义道路断絕了。在这个条件下,我国当前經濟中农业落后于工業的矛盾,已不具有無产階級与資產階級階級对抗的性質,而是人民内部的矛盾。正如柯庆施同志在中共上海市第一屆代表大会第二次會議上的报告中所正确指出的:例如对于工業發展速度和农业發展速度的某些爭論,这是一种主观同客观,先进同落后的矛盾。这种矛盾就是在階級和階級影响完全消滅以后也仍然会繼續产生。矛盾的性質是非对抗性的,它可以經過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

另外,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国家建設發展很快,人民生活改善的需要也很大,但我国农业的發展还比較慢,不能滿足这个需要。所以,这个矛盾,也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在生产資料所有制方面取得基本胜利以后,所出現的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間矛盾的一个方面。

### 三

根据上面的分析,矛盾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农业發展較慢,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在于农业。因此,解决矛盾的办法不是降低工業的發展速度而是加速农业的發展,使农业生产的增長能够与国家建設和人民生活的需要相适应。所以,毛澤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的报告中,提出了發展工業必須和發展农业同时并举的方針,这是非常正确、及时和必要的。这个方針的提出,一方面是总结了几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設的經驗,以及針對着解决当前我国国民經济中存在的問題,同时,也是吸收了苏联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經驗,結合我国具体情况加以运用。另一方面,也是根据工業和农业——国民經济中两个最主要的部門的相互依存关系;根据社会主义基本經濟規律和其它經濟規律的要求提出来的。首先我們从工农业的相互依存关系来看,工業生产的扩大,需要农业能够提供日益增長的商品粮食、副食品和来自农业的工業原料,要农业能够吸收工業品,使工業产品能得以实现;而农业生产的發展,也需要工業能够提供机器、农具、化肥、农药等农业生产資料和农民所消費的輕工業品。这是工業和农业在物質上的联系。在社会主义国家,工業和农业不仅有物質联系,还有政治上的联系,那便是工农联盟問題,正如斯大林同志指出:“农民經濟是工業的市場,正像工業是农民經濟的市場一样。农民对于我們不仅是市場,而且是工人階級的同盟者。”<sup>①</sup>“社会主义乃是工業和农业工作人員的一个生产消費組合。如果在这个組合里面,工業与供給原料、粮食和消耗工業品的农业不協調,如果工業与农业因此而不能組成一个統一的国民經济的整体,——那么,从这里任何社会主义的結果都不可能获得。”<sup>②</sup>既然工农业的关系这么密切,为了使它們互相适应,互

<sup>①</sup> “斯大林全集”,第八卷,第128—129頁。

<sup>②</sup> 斯大林:“問題与答复”,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48頁。

相協調,在工農業生產發展的速度上,應該採取什麼比例關係呢?根據馬列主義關於社會生產劃分為兩大部類,在擴大再生產的條件下,第一部類(生產資料)生產的增長,快於第二部類(消費資料)的原理,在工業裏面,重工業生產的發展速度快於輕工業生產的增長速度;在農業裏面,作為工業原料的農產品增長速度快於作為直接消費的農產品增長速度。但輕工業所需要的全部原料,不完全是由農業提供的,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農業原料在全部輕工業原料中的比重,將逐漸下降。因此,農業原料的生產發展速度,並不需要和輕工業生產發展的速度並駕齊驅,從而,工農業的發展速度,客觀上要求有一個距離。同時也由於工農業生產受自然條件的限制和影響的程度不同;工業勞動生產率的增長大於農業勞動生產率的增長;現代科學技術在農業中的應用,相對地落後於工業。因此,農業的發展也會慢於工業。至於各個國家在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具體安排中,工農業的發展究竟按照一個什麼樣的比重,中間有多大差異,不能主觀地規定一個數字,必須根據各個國家的實際情況而異。但是,我們在蘇聯和其它社會主義國家計劃建設的實踐中,也可以找到一個总的趨勢,作為可資借鏡的寶貴經驗。首先,我們看看蘇聯的經驗;蘇聯是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具有豐富的社會主義建設經驗,而且領土廣大,人口眾多,資源豐富,經濟的發展是獨立和完整的,因此,蘇聯的經驗,就具有特別重大的意義。蘇聯已經勝利地進行了五個發展國民經濟的五年計劃,今天正在執行第六個五年計劃。下面幾個表列舉了六個五年計劃工農業發展速度的資料;(表七——十二)①

表七: 蘇聯第一個五年計劃工農業生產發展速度比較表

按 1926—1927 年價格 單位: 10 億盧布

	1927—1928	1932—1933		五年總計		1932—1933年度對 1927—1928年度的%	
	年度	最低方案	最高方案	最低方案	最高方案	最低方案	最高方案
全部工業總產值	18.3	38.1	43.2	145.2	145.6	280	236
全部農業總產值	16.6	23.9	25.8	102.1	105.7	144	155

表八: 蘇聯第二個五年計劃工農業生產發展速度比較表

按 1926—1927 年價格 單位: 百萬盧布

	計 劃 數			實 際 數	
	1932	1937	1937 年對 1932 年 的%	1937	1937 年對 1932 年 的%
全部工業總產值	43,300	92,712	214.1	95,500	220.6
全部農業總產值	13,100	26,200	200	20,123	153.9

① 第一至第五個五年計劃的資料見“蘇聯國民經濟建設計劃文件彙編”,人民出版社 1955 年版,第六個五年計劃資料見蘇共二十次代表大會關於第六個五年計劃的指示。

表九：苏联第三个五年計劃工農業生产增長速度比較表

按 1926—1927 年价格 單位：亿盧布

	計 划 数			实 际 数
	1937	1942	1942 年对 1937 年的%	1940 年对 1937 年的%
全部工業总产值	955	1,840	192	145
全部農業总产值	201	305	152	—

表十：苏联第四个五年計劃工農業生产發展速度比較表 (1946—1950)

	1940	1950 計劃	1950 实际
工業总产值	100	148	173
農業总产值	100	127.1	*

\* 農業完成了計劃, 数字不詳。

表十一：苏联第五个五年計劃工農業生产發展速度比較表 (1951—1955)

	1950	1955 計劃	1955 实际
工業：工業总产量	100	170	185
農業：谷物总产量	100	140—150	129
小麦生产	100	155—165	150
原棉	100	155—165	109
亞麻纖維	100	140—150	149
甜菜	100	165—170	147
向日葵	100	150—160	200

表十二：苏联第六个五年計劃工農業生产發展速度比較表

(1956—1960)

	1955	1960 計劃
工業总产量	100	165
其中：生产資料生产	100	170
消費資料生产	100	160
農業总产量	100	170
其中：子棉	100	156
亞麻纖維	100	135
甜菜	100	154
馬鈴薯	100	185
蔬菜	100	218
肉类	100	200
牛奶	100	195
蛋类	100	254
羊毛	100	182

第一个五年計劃規定五年間工業增長 136%，農業增長 55%，距離較大，这和当时苏联处于受資本主义包圍和国内工業还很落后，農業集体化还没有完成这种情况有关。在第二个五年計劃里面，規定工業生产增長 114%，農業增長 100%，二者是很接近，但执行結果，工業計劃超額完成，共增長了 120.6%，農業沒有完成計劃只增長了 53.9%。第三个五年計劃規定，工業增長 92%，農業增長 52%，仍是較接近的。这个計劃执行了三年，由于德国法西斯背信棄义进攻苏联而中断。衛国战争胜利以后，从 1946 年起，开始执行恢复国民經济的第四个五年計劃。这个計劃規定到 1950 年工業总产值比 1940 年增長 48%，農業总产值增長 27.1%，执行結果，工業增長了 73%，農業也完成了計劃。第五个五年計劃規定工業增長 70%，执行結果，增長了 85%，在農業中，谷物总产量和其它主要經濟作物計劃分別增長 40—70%，(見表十一)和工業增長速度也較接近。但执行結果，谷物，小麦，原棉沒有完成計劃，谷物总产量只增加了 29%，原棉增加了 9%。在計劃执行过程中，苏联共产党和政府，采取了許多措施，推动農業的發展。根据苏共中央九月全会(1953年)，二——三月全会(1954年)及一月全会(1955年)的決議，进行了許多重大措施，使農業走上了更高的發展阶段。但农产品产量的增長，仍然落后于五年計劃規定的任务。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指出，由于农产品的五年計劃任务沒有全部完成，这便阻碍了輕工業和食品工業的發展，阻碍了人民消費品的生产，苏联历届五年計劃工業生产任务大大超額完成，農業生产任务超額不大或沒有完成計劃的主要原因，是由于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受着資本主义的包圍，不得不集中一切人力、財力、物力迅速發展重工業，巩固国防，斯大林同志多次指出，这是关系到国家存亡的問題。1953年9月苏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發展農業的決議里也指出：“共产党一貫执行尽力發展作为国民經济各部門順利發展的必要条件的重工業的方針，并已在这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主要的注意力是集中在完成这个首要的国民經济任务上，而且主要的資源和財力也是用在这一方面。我国最好的干部过去是从事国家工業化的工作。我們当时沒有可能在發展重工業的同时又以很大的速度發展農業和輕工業。必須为这件事創造必要的条件。今天，我們已有了这些条件。我們已經有了强大的工業基础，巩固的集体农庄和在經濟建設方面訓練有素的干部。”因此，苏联發展国民經济的第六个五年計劃的主要任务規定是：“在优先發展重工業，不断改进技术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保証进一步大力發展国民經济的各个部門，急速發展農業生产，并在这个基础上大大提高苏联人民的物質福利和文化水平。”五年間工業將增長 65% 左右，其中重工業增長 70%，輕工業增長 60%；農業將增長 70%，到 1960 年，谷物总产量將达到 110 亿普特，經濟作物，蔬菜，畜产品五年內將大大增長。(參看表十二)。我們考察了苏联几个五年計劃工、農業發展速度的材料以后，我們可以進行以下的分析：

首先，旧中国是一个經濟上很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而十月革命前的俄国，則是已經發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的國家，如果和西方更發达的資本主义國家相比較，它仍然是落后的，但是，和旧中国比較起来，它就發达得多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工業在俄国整个国民經济中的比重，已超过 40%，資本主义(富农經濟)在農業中也有了很大發展。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国内战争的破坏，年青的苏維埃國家經濟上遇到很大困难，不得不采取战时共产主义的政策，以保証战争需要。在內战結束以后，进入了新經濟政策时期，从余粮收集制过渡到粮食稅，以刺激農業的發展，从而提供恢复發展整个国民經济的条件。到

1927 年末新經濟政策时期結束的时候，工農業生产总量达到了战前水平，工業在整个国民經济中的比重，达到 42%。在農業中，从“1918 年开始在农村中發生的那种由巨大經濟單位碎裂为細小經濟單位，再由細小經濟單位碎裂为極小經濟單位的过程，仍然繼續着。”当时谷物業所能賣給城市的商品谷物，只稍多于战前所能出賣的数量  $\frac{1}{3}$ 。在 1927 年間，富农还出产过六亿普特的粮食，其中当作商品粮食交出的約有 13,000 万普特。当时集体农庄和苏維埃农庄所能交出的商品粮食还不过 3,500 万普特。由此可見，在新經濟政策时期，粮食供应是比較緊張，苏联政府因而采取了粮食配給制的措施。富农經濟在粮食生产中，还佔相当大比重。

其次，我国人口众多，耕地面积有限，可垦荒地也不多，以人口平均，每人只有 2.7 亩；苏联人口比我們少，耕地面积則比我国大，每人平均有十一亩。耕地广大是發展農業生产很有利的条件。

再次，我国由于工業落后及其它原因，農業集体化和机械化不是同时进行的。農業机械化大約需要三个五年計劃期間才能完成。苏联則由于工業基础較好，有可能也有必要（地广人稀）迅速实现机械化。所以，苏联的農業集体化和机械化几乎是同时进行的。在第一个五年計劃时期，社会主义工業化和農業集体化的成功，到 1930 年間，集体农庄和苏維埃农庄所提供的商品粮食已超过四亿普特。到 1937 年，農業机械化已經完成，上述農業企業提供的商品粮食达到十七亿普特以上。因此，在 1934 年的时候，国家已經有可能把面包及其它食品配給制廢除，而規定一切食品都可自由購買了。在工業方面，也取得了很大成功，工業在整个国民經济中的比重已增加到 70%。斯大林同志在总结第一个五年計劃的成就时指出，苏联已經从農業国变成了工業国。<sup>①</sup>

最后，我国今天所处的国际环境和苏联当时所处的国际环境是不同的。苏联当时所处的国际环境上面已提到了。我国今天則是大大不同了：有了强大的和平、民主、社会主义陣营；反殖民主义和反对战争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和平运动的高漲；帝国主义陣营内部矛盾重重，經濟衰退等等。国际形势趋于緩和，东風压倒了西風，和平的前景愈来愈美好了。

上面的分析比較主要說明，由于这些經濟条件和国际条件的不同，苏联發展農業的迫切性和重要性和我国比較起来是有差別的，但是苏联共产党和苏維埃政府在历届發展国民經济的五年計劃中，都給予農業較高的發展速度，这說明对農業在整个国民經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是給予了充分估計。只是由于別的原因，在执行过程中沒有完成或稍超額完成計劃，在第一至第五个五年計劃期間，農業的發展和工業相比仍显得比較慢。所以我們可以說：从長期来看，農業生产發展的速度，慢于工業的發展速度，但并不是大大地落后于工業的發展，而是應該和工業的發展速度比較接近，同时也并不排斥在国民經济發展的某一阶段，農業的發展可以快于工業的發展。以上是苏联四十年来社会主义建設实践的寶貴經驗。它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設，有極重要的意义。我国第一个五年計劃中，对工農業發展速度的具体安排，是屬於这种类型的。

后面，我們再看看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經驗。下面是波蘭、捷克、羅馬尼亞、保加利亞、阿尔巴尼亞和匈牙利六个社会主义国家發展国民經济的第一个五年（或六年）計劃所

<sup>①</sup> 上述資料和数字摘自“联共(布)党史簡明教程”。

規定的工農業生產發展的數字資料。(見表十三——十八) 我們暫時把其它條件不加以考慮, 只從工農業的發展速度來看, 可以劃分為兩種類型。一類是工農業的發展速度很接近的, 如波蘭, 一類是差異較大的, 如保加利亞和匈牙利等國, 尤其是匈牙利最為突出。從1949年到1953年上半年, 上述各人民民主國家在計劃的執行上, 取得了種種巨大成就, 特

表十三：波蘭第一個六年計劃(1950—1955)期間工農業生產  
增長速度比較表

	1949年	1955年比1949年增長%
工農總產值	100	58
農業總產值	100	50

表十四：捷克斯洛伐克第一個五年計劃(1949—1953)期間工農業生產  
發展速度比較表

	1948年	1953年比1949年 計劃增長%	1953年比1949年 實際增長%
工業總產值	100	98	102
農業總產值	100	50	12.4

表十五：羅馬尼亞第一個五年計劃(1951—1955)期間工農業生產  
增長速度比較表

	1950年	1955年比1950年計劃 增長%
工業總產值	100	144
農業總產值	100	88

表十六：保加利亞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1949—1953)工農業生產增長  
速度比較表

	1948年	1953年比1948年計 劃增長%
工業總產值	100	120
農業總產值	100	57

表十七：阿爾巴尼亞第一個五年計劃(1951—1955)期間工農業生產  
增長速度比較表

	1950年	1955年比1950年 計劃增長%
工業總產值	100	239
農業總產值	100	—

表十八：匈牙利第一个五年計劃(1950—1954)期間工农业生产增長速度比較表

	1949 年	1954 年 比 1949 年 計劃增長%
工業总产值	100	200
其中：重工業	100	280—290
农业总产值	100	54

別是工業生产有了很大發展。但在計劃执行过程中也出現了新的矛盾和問題，概括地說，就是国民經济某些部門和某些方面，个别国民經济部門之間的發展比例出現了某种脫节現象。特別是农业的發展速度远远赶不上工業的發展速度；从而，生产資料生产增長和消費資料生产增長的比例不相称，情况相当严重。举例來說，从 1950 年到 1953 年四年間，波蘭工業生产增長了 118%，平均每年增長 22%，而农业生产四年只增長了 20%。捷克在第一个五年計劃期間，工業生产增長了一倍多，而农业只不过增長了 12.4%。保加利亞到 1953 年工業生产比战前增加了三倍半，而农业只增加了 29%。由于农业生产發展迟緩，影响了工業的进一步增長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从 1953 年下半年起，上述人民民主国家的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都相繼采取措施，加速农业的發展，以克服这种不协调現象。<sup>①</sup> 从上述国家的实践經驗也足以証明如果农业生产發展速度比工業生产發展速度过于落后，势必产生彼此不协调的現象。因此，农业的發展速度必須較接近于工業的發展速度，也是这些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設实践中提供出来的結論。而且，我們在考察上述人民民主国家的时候，我們要特別注意的是这些国家由于領土面积不大，人口不多，受自然条件和資源情况的限制，不必要也不可能建立完整的輕重工業一切部門，可以在社会主义国家国际分工和协作的条件下，根据自己的实际条件，發展最适当最有利的部門。在农业方面，当然，也需要根据本国的自然条件，尽可能全面發展，以滿足国内人民和工業建設的需要，但因为人口不多，当某些农产品感到不足时，通过国际贸易还是比较容易調節。但这种情况不仅不降低一个国家按照适当比例發展工农业生产的重要性，恰恰相反，这更有力地証明这个重要性。

最后，我們来看看几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設的經驗。我国是一个拥有六亿以上人口的国家，領土广大，資源丰富，因此，我們有必要也有可能建立一个独立强大完整的工業体系。另一方面，我国是一个大农业国，生产还相当落后，人口又很多，农业人口占的比重很大，由于这些特点，农业生产的發展，在我国就显得特別重要。下面一些材料，<sup>②</sup> 也有力地証明了这一点：

第一，根据初步估算，从 1953 年到 1956 年农产品和利用农业原料进行加工的产品，

① 以上材料請參看：1. 姜庆湘：“歐洲人民民主国家的經濟建設”，湖北人民出版社，1956 年版。

2. 費尔果諾夫：“歐洲人民民主国家的經濟建設”，財經出版社，1957 年版。

② 参考：1. “發展工業和發展农业同时并举”，人民日报，1957 年 11 月 14 日第四版。

2. “加快农业的發展才能加快重工業的發展”，“計劃經濟”，1957 年第 10 期。

3. 楊英傑：“国民經济計劃中的比例关系”。

4. “計劃經濟”，1957 年第四期，第 10、11 頁。

約占我国全部消費資料总值的85%左右。在全部消費資料中,吃的約占65%,这部份几乎全部直接間接由农業生产出来;穿的約占13%,在目前我国人造絲,人造纖維工業还没有發展的情况下,絕大部份也是用农業生产的棉、麻、毛、絲来加工制造;用的約占22%,其中由农产品加工制成的也占相当大比重。因此可見,农業供应了我国人民消費資料的絕大部份。

第二,我国全部工業中,輕工業占50%左右,輕工業的原料有80%以上来自农業。农業的丰收或欠收,对工業生产的增長有直接的影响。例如1952年农業丰收,1953年工業总产值上升31.7%;1953年水災,1954年工業总产值只增長16.7%;1954年遇到更大水災,1955年工業总产值只增長了7.5%;1955年农業丰收,1956年工業总产值增長25%左右;1956年受到大災荒,1957年工業只計劃增長4%。从这些事实看来,农業生产的發展对工業的增長有極大意义。1954和1956年的农業災荒对1955和1957年工業生产的發展影响相当严重。为了不加大对市場的压力,在安排1957年計劃时,不得不縮減一些基本建設投資,一些輕工業部門也由于原料供应不足而減产。1955年和1957年工業的增長速度与1953年和1956年比較起来,就显得很慢了。

第三,农業是我国国内市場和对外貿易商品供应的重要来源。在国内市場方面,在全部社会零售商品总额中,农产品和农業原料加工的产品約占80%。在对外貿易上,几年来我国出口的全部物資中,农、付、土产品大約要占到60%左右。每年进口物資中,生产資料一般占90%左右。十吨猪肉可換五十吨厚鋼板或一部拖拉机。一吨葵花子可換二吨肥田粉。近年来由于农产品供应緊張,对于一些国内迫切需要的农付产品不得不采取限額出口办法。今后农業發展了,將大大加强出口能力,便能更好地支援我国社会主义工業化。

第四,农業是工業的主要市場。輕工業生产的消費品大部份是供应农村,需求的增長很大。重工業产品供应农村的数量也不少。在供应市場的全部重工業品中,供应农村的比重,生鉄占12%以上,煤油占80%以上,煤占50%以上,木材占30%左右,化学肥料和农葯几乎全部供应农村。此外,还有大量的农業、水利机械,而且还远远不能滿足农村的需要,随着农業技术改革的进行,农業对重工業品的需要量,將是很惊人的。

第五,农業是国家积累的重要来源,几年来,为了鼓励农業生产的發展,国家采取了稳定农業稅的政策,农業稅的收入在国家全部稅收收入中的比重有所下降。农产品的統購,收購价格也有所提高,但在国家財政收入中,直接和間接依靠农業生产而得到的,还佔55%左右。1954年农業欠收,1955年国家財政收入只增加0.3%,1955年农業丰收,1956年財政收入就增加了12.5%。

基于上述理由,我們可以說,农業在我国佔有很特殊重要,甚至可以說是举足輕重的地位。在我国經濟建設中必須充分注意农業的發展。所以毛主席指出:“我国的經濟建設是以重工業为中心,这一点必須肯定。但是必須充分注意發展农業和輕工業。我国是一个大农業国,农村人口佔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發展工業必須和發展农業同时并举,工業才有原料和市場,才有可能为建立强大的重工業积累較多的資金。大家知道,輕工業和农業有密切的关系。沒有农業,就沒有輕工業。重工業要以农業为市場这一点,目前还没有使人們看得很清楚。但是随着农業的技术改革逐步發展,农業的日益現代化,为农業服务的机械、肥料、水利建設、电力建設、运输建設、民用燃料、民用建筑材料等等將日



益增多,重工業以農業为重要市場的情况,將會易于为人們所理解。在第二个五年計劃和第三个五年計劃时期,如果我們的農業能够有更大的發展,在輕工業相应地有更多的發展,这对于整个国民經济会有好处。農業和輕工業發展了,重工業有了市場,有了資金,它就会更快地發展。”从我国農業对我国工業發展的重大意义上来看,我們說:“沒有我国的農業,便沒有我国的工業”是一点也不过分的<sup>①</sup>。

#### 四

从我国的社会、經濟狀況出發,發展工業必須和發展農業同时并举,这是我国今后社会主义建設的重大方針之一。但是,我們有沒有条件实现这个方針呢?回答是肯定的,我們有足够的条件。这些条件除了我国有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領導、中国人民的革命積極性和創造性、苏联和其它兄弟国家的支援,我国有利的自然条件和国际形势趋于緩和这些重要的政治条件和自然条件之外,在經濟方面,由于第一个五年計劃的偉大成就,給我們創造了不仅能够在第二个五年計劃期間仍然以很高的速度發展工業<sup>②</sup>,同时也能够以較大的速度發展農業的条件。这些条件概括起来說,就是:

第一,我国社会主义工業化的初步基础已經建立,我国的經濟面貌已大大改变,我国工業已經有較大力量来支援農業,能够給農業提供更多的化学肥料、农藥、農業机械及其它生产資料了。例如,1957年化学肥料的产量將达到70万吨,比1952年增加260%,第二个五年計劃期間还将大大增力。在最近農業部召开的農業工作會議上,决定1958年供給农村五十万匹馬力的排灌机械,这是过去所办不到的。工業对農業的支援,这是農業迅速发展很重要的条件之一。

第二,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已經基本完成,農業合作化已經实现了。上面曾說过,我国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是要在我国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業化和对農業、手工業、资本主义工商業的社会主义改造。对農業的社会主义改造有兩方面的任务:一方面是要改变生产資料所有制,从而根本改变生产关系,这方面的任务我們已經基本完成了;另一方面是进行農業的技术改革,以大大發展農業生产力。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我国農業的技术改造的时间是較長的,但由于变革生产关系的任务已經完成,發展生产的任务就显得更为突出,国家也有可能以更多的人力、物力和財力来發展農業。農業合作化的实现,农民已經組織起来,農業生产合作社的优越性,为農業生产的迅速发展,开辟了極其广寬的前景,几年来的实践,已足够証明这一点。这是農業迅速发展非常重要的条件。

第三,第一个五年計劃期間,在農業生产方面国家和全体农民做了很多工作,創造了極丰富的經驗,也取得了巨大成就。这些工作和成就我們在上面已經詳細說明。这一切,給今后農業生产的大發展,建立了坚固的、可靠的基础。

此外,我国在全民整風运动和农村中进行了整党、整团,整社和大辯論以后,农民的社会主义觉悟已大大提高,再經過对農業生产發展綱要修正草案的討論;以及权力下放,体制下放;許多干部和知識份子下乡上山参加農業生产,这一切都是大力發展農業生产的有

<sup>①</sup> 参看毛澤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和“1956—1967年我国農業發展綱要草案”序言。

<sup>②</sup> 参看周恩来“关于第二个五年計劃的建議”。

利条件。

既然要大力發展農業生产，那末我們將采取些什么具体措施呢？这必須从我国農業的情况出發，概括地說是人多地少，自然災害严重，單位面积产量还很低，目前又沒有条件大力开荒。因此，提高單位面积产量，便是当前發展農業生产的主要途徑。为此目的，我国在第二个五年計劃期間發展農業生产的主要措施是：

1. 增加国家对農業、水利、林業的投資。同时農業生产合作社应当把增加的积累的大部份用之于發展農業生产。
2. 有計劃地整治为害严重的河流，广泛开展小型的农田水利，減少水澇災害，增加灌溉面积。
3. 努力增加化学肥料的供应，同时广泛开展农村中的积肥造肥运动，以提高农田的肥料量。
4. 增加适合于我国各地農業發展的各种机械的供应，努力推广各种先进的技术經驗。
5. 尽可能增加复种面积。
6. 努力改良品种和防治病虫害。
7. 發展山区交通，大力開發山区，并且努力保持水土。
8. 在可能的条件下积极开垦荒地。<sup>①</sup>

在第二个五年計劃中，国家对農業的基本建設投資佔整个基本建設投資的比重，將从第一个五年計劃的7.6%提高到10%，大約比第一个五年增加一倍。国家在財政上对農業的支援是很重要的条件。同时，在第二个五年間，農業生产合作社的公共积累也將有較大增加，最近人代常委会已作出決定，農業生产合作社的公共积累可以超过8%，种植經濟作物的農業社可以超过12%。农民自己的投資，是極巨大的資金来源。此外，在大力開發山区方面，国家已制訂了具体計劃，正在加以貫徹。今年是我国机械工業空前丰收的一年，二十七座大机械厂將建成，成套設備和農業机械的生产大大增加。我国人民盼望已久的拖拉机，將由今年投入生产的天津拖拉机厂开始制造。水稻插秧机已經試制成功。排灌、耕作、运输、动力、脫谷、加工等机械將紛紛下乡。在我国目前条件下，每年开垦荒地一千几百万亩也是完全可能的。但是最主要，最關鍵性的措施，是兴修水利和增施肥料兩項。我国农民常說，“有水無肥一半谷，有肥無水望天哭”。“人少不得血，田少不了水”。毛主席也指出，“水利是農業的命脈”。在第一个五年計劃的前四年合計，全国受災面积約七亿七千万亩，平均每年一亿九千万亩。四年合計受災損失的粮食七百五十亿斤，棉花七百九十万担，都超过了五年实际增長数字。如果我們把水利搞好了，就能不怕旱，不怕澇，有了水利灌溉，才能多施肥料，保證高产穩收。几年来的經驗証明，在水稻区用抽水机灌溉，每亩增产自几十斤到一百多斤。如改兩季为三季，可增产二百斤到三百斤。在棉、麦产区，由于灌溉一般可增产籽棉三十斤到五十斤或麦子五十斤到一百五十斤。<sup>②</sup>河北省石家庄地区正因为澆灌得好，出現了麦子一千斤、棉花四百斤的記錄，这样的例子还有很

<sup>①</sup> 參看李富春“关于我国第一个五年計劃的成就和今后社会主义建設的任务、方針的报告”，人民日报，1957年12月8日。

<sup>②</sup> “为了實現四、五、八”，人民日报，1957年12月19日。

多。所以,为了實現农业生产大躍进,从去冬开始,在党的領導,城市居民和学生、解放軍的支援下,全国农民开展了規模浩大的水利建設高潮。到今年 1 月 31 日为止,全国增加灌溉面积共 11,798.3 万亩,等于 1958 年計劃的 127.9%;改善灌溉面积 5278.3 万亩;窪地治理 7452.8 万亩;控制水土流失 45,269.9 万公里。超額完成增加灌溉面积計劃的有十四个省市,其中超額一倍到兩倍的有六个省市。<sup>①</sup> 这是农业生产大發展極其有力的保證。其次,增施肥料也是很重要的措施,經驗証明,若每亩地施用十斤硫酸銨肥田粉,就可增产小麦四十斤到六十斤或谷子五十斤到八十斤。我国粮食生产,平均每亩單位面积产量是二百斤,而日本是六百斤,这是和施用大量化学肥料有关。在第二个五年計劃期間,我国化学肥料的产量將大大增加,今年开始建設的限額以上的化学肥料厂有十七个,另外还有一个供應磷肥厂原料的磷矿。此外,农家肥料仍佔極重要的地位,計劃到 1962 年全国猪的头数將增至二亿五千头,这是極巨大的肥料来源。我們有了这些措施,就能保證农业生产的大躍进。今天,形势已經很清楚,农业生产的高潮已經在全国出現了,工、农业并举方針已变成無比的物質力量。农业的大發展,是指日可待的了。

## 五

从上面的叙述和分析說明,發展工業和發展农业同时并举的方針,是吸收苏联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經驗和根据我国的社会、經濟情况,我国第一个五年計劃建設的實踐經驗提出来的。周恩来总理在發展国民經济第二个五年計劃的报告中,指出:“經驗証明,以重工業为中心的工業建設,是不能够也不應該孤立地进行的,它必須有各个方面的配合,特别是农业的配合。农业是工業發展以至整个国民經济發展必不可少的条件。延緩农业的發展,不仅直接地影响輕工業的發展和人民生活改善,而且也將極大地影响重工業以至整个国民經济的發展,影响工农联盟的巩固。因此,在第二个五年計劃期間,我們應該繼續努力發展农业,求得农业和工業的發展互相配合。”这是馬列主义理論指导革命實踐并在實踐中丰富革命理論的一个范例,它具有極巨大的理論意义和實踐意义。这个方針的主要內容是:在优先發展重工業,迅速發展整个工業生产的同时,以較快的速度大力發展农业,以求得工农生产的互相協調、互相支援,互相促进,在工农業迅速發展的基础上,推动整个国民經济的共同高漲。它有下面四个要点:第一,优先發展重工業,因为重工業是改造整个国民經济的物質力量。重工業發展緩慢,將使整个国民經济停滯不前,所以毛主席指出,“我国經濟建設以重工業为中心,这是不可动搖的”。但是为了加速农业的發展,重工業內部必須进行适当的調整,化学肥料,农业机械等部門,應該發展得更快一些,以便大力支援农业。在重工業优先增長的同时,也要注意輕工業的發展,所以,整个工業發展速度仍是很快的。第二,把發展农业提高到一个很突出的地位,不仅着重进行对發展农业的宣傳工作,而且在国家对农业的投資方面,將有較大增加,国家对农业的領導將大大加强,国家將通过各个方面鼓舞和促进农业的發展。同时發动农民,充分利用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优越性,充分利用我国农业生产的潛力,發动整个社会力量来支援农业,从而使农业的發展大大加快起来。第三,这个方針充分体现了工業和农业必須互相協調,互相支援

<sup>①</sup> 見 1958 年 2 月 1 日人民日报第二版圖表。

和互相促進的關係，以避免彼此脫節的現象產生。第四，工業和農業是國民經濟中兩個最主要的，起主導作用的部門，工、農業迅速發展了，其它經濟部門勢必相應地加快發展，從而形成整個國民經濟的共同高漲。我們從這個方針的內容裡面，可以看出，這個方針的最大特點是它充分體現了工業和農業兩大部門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重大地位和作用；充分體現了我們對工業和農業的相互關係的認識，對工農業和其它經濟部門的相互關係的認識，從而在經濟工作中緊緊地抓住主要環節。這裡必須指出，發展工業和發展農業同時並舉，並不否定工業對農業的領導作用，相反，正是為了充分發揮和利用這一領導作用。另一方面，工農業同時並舉，也不意味着農業可以和工業分庭抗禮，在人力，財力，物力的各个方面都要平分秋色，在發展速度上也要和工業并駕齊驅。這是不對的。重點建設的方針我們必須堅持。農業不僅不能同工業以同樣速度前進，在我國目前條件下，還應保持較大的距離。工、農業同時並舉，是為了更好地利用農業對工業發展的作用，利用農業在我國經濟發展中的特殊重要性，加快農業的發展，促進工業更迅速發展。工、農業迅速發展了，交通運輸業、商業、及其它經濟事業必須相應發展，整個國民經濟必然走向共同高漲。這個方針的重大實踐意義就表現在這裡。這是第一。

其次，在1956年初達到高潮的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三大改造運動，標誌着我國經濟戰綫上（在生產資料所有制方面）的社會主義革命取得了決定性勝利，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在這方面的矛盾基本上解決了。但是，社會主義革命是經濟上、政治上、思想上最徹底、最深刻、最廣泛的革命；所有制的基本改變，不但還沒有完全解決經濟戰綫上的問題（所有制還沒有完全改變，社會主義的物質基礎即現代工業和現代農業的發展還很不充分），尤其還沒有完全解決政治戰綫和思想戰綫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問題。因此，階級鬥爭還沒有結束，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誰戰勝誰的問題還沒有完全解決。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在整個過渡時期，仍然是國內的主要矛盾<sup>①</sup>。“目前我國社會主義的物質基礎還很不充分，這是右派還敢於進攻和中間派還在動搖的一個客觀原因。只有建立了比較充分的物質基礎，我們的國家，我們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才算充分鞏固。”<sup>②</sup>毫無疑問，工、農業並舉方針之提出，對於解決過渡時期的主要矛盾，對於建立比較充分的社會主義物質基礎，是有重大作用的。單就農村來說，在農業合作化高潮以後，兩條道路的矛盾從生產資料所有制來說已基本解決了。但從思想上、政治上乃至經濟制度上來說，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則仍然相當長期存在着。除了兩條道路鬥爭這個基本矛盾之外，現在農村中又有新的矛盾產生。這就是毛主席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中指出的，國家與合作社，合作社內部，合作社與合作社之間的新矛盾。兩條道路的矛盾就其性質來說是对抗性的矛盾。在這個矛盾鬥爭中除了富農是要當做階級被消滅之外，而面對着的主要改造對象，則是五億勞動農民。農民是勞動者，而不是剝削者，上中農是具有自發資本主義思想的，但大多數沒有剝削行為或者只有輕微的剝削，因此這種矛盾仍然是屬於人民內部矛盾的性質。在實現合作化和消滅階級之後，由於地主、富農、反革命份子仍然存在，兩條道路未完全結束鬥爭，因此農村中相當長期內仍然同時存在着兩類性質的矛盾，但一般說來，農村現存的大量的矛盾，包

① 參看阿慶施，1957年12月25日在中共上海市第一屆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的報告。

② “這是政治戰綫上和思想戰綫上的社會主義革命”，人民日報，1957年9月18日社論。

括国家与合作社之間的矛盾,則主要是人民內部的矛盾。<sup>①</sup> 应認識人民內部矛盾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人与人在經濟上的利害关系不协调則是产生矛盾的主要根源。因此解决矛盾的方針办法虽然有多种多样,但主要关键在于从經濟上大大發展生产,妥善处理人与人之間的利害关系,从而使各方面利益得到适当照顾,使大多数社員生活都有所改善,这是解决人民內部矛盾的基本关键。也只有当生产大大發展了,合作社的生产超过了当地富裕中农的水平;合作社的公共积累和基本建設大大增加,在災害面前能屹立不搖,合作社才能徹底巩固,在誰战胜誰的斗争中取得最終胜利。毛主席教导我們說:“許多人不敢公开承認我国人民內部还存在着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我們的社会向前發展。……不懂得在不断地正确处理和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将会使社会主义社会內部的統一和团结日益巩固。”工、農業同时并举方針就農業方面來說,就是農業大發展的方針,显而易见,它对于当前农村中兩类不同性質矛盾的解决,是有極重大意义的。

再次,毛澤东主席在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报告中指出:重工業、輕工業和農業的發展关系問題,是我国工業化的道路問題。不仅要优先發展重工業,而且要充分注意發展輕工業和農業;不仅要国家建設,也要改善人民生活,把当前利益和長远利益結合起来。这是在优先發展重工業这一方針指导下,最适合于我国具体情况的安排。我們在第一个五年沒有高速發展輕工業和農業,这是由于当时沒有条件这么做。今天,根据已經变化了的情况和已有的經驗,我們有条件以更快的速度去發展輕工業和農業了。也就是說,在我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我們發展工業和發展農業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比例关系,我們的主觀認識和客觀实际的要求更趋于一致了。这就能更好地避免国民經濟發展中互相脫节現象的产生,更符合于国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規律的要求。我們社会的生产,是逐年不断的扩大再生产,馬克思早已指出,在社会扩大再生产中生产資料生产优先增長。我們上面已經說过,工農業同时并举,重工業——工業中的第一部类,仍然优先增長,这是不可怀疑的,但農業迅速發展了,農業中第一部类的發展速度会更快一些,从而工、農業中第一部类在發展速度上的差距,一定会有所縮短,更适应这个規律的要求。此外,这个方針也是根据社会主义基本經濟規律的要求提出的,不难了解,在重工業,輕工業和農業迅速發展之下,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必定得到进一步的滿足。尤其农民生活將有較快的提高(和工人生活水平更为接近,巩固工农联盟)。所以我們說,發展工業和發展農業同时并举方針,是中国共产党把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結合,創造性地發展馬列主义的又一个光輝范例。

在中国共产党整風期間,資产階級右派份子向馬列主义,向党,向社会主义进行惡毒攻击,右派份子葉子正說馬列主义已經过时了,馬列主义在中国对不上号。右派份子陈振汉公然叫囂,說馬列主义已变成敝屣,“是敝屣就要摒棄”,“我們的各項具体工作,……不少是盲目搬用苏联成例,即是[試驗錯誤]碰碰試試,主觀主义,盲目从事,并未遵循什么客觀經濟規律,也不知道有什么規律可資遵循”。<sup>②</sup> 这完全是誣蔑,和客觀事实毫無共同之点,除了說明他們的反动本質之外,是沒有任何价值的。

<sup>①</sup> 參看邓子恢:“論农村人民內部矛盾和正确处理矛盾的方針和办法”。

<sup>②</sup> 摘自,“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資料选輯”,中国人民大学1957年版,第280,318,300頁。

最后,工农业并举方针,还有巨大的国际意义。中国共产党向来认为;中国革命是伟大十月革命的继续;中国共产党的一切活动,都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指导下进行的,尽管我国的革命有自己的许多特点。<sup>①</sup>工农业同时并举方针正是根据中国的特点提出来的,同时也是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下,吸收了各兄弟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来的,这一事实在反对国际修正主义的斗争中,无疑有重大意义。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经验,对于以后在摆脱了资本主义,进入社会主义建设的国家,特别是经济落后人口众多的亚洲国家,是有很大大参考意义的。另一方面,苏联已经提出在十五年内主要产品按人口平均赶上或超过美国的任务,我国也提出了在十五年内主要工业产品产量赶上或超过英国的任务。这是一场艰巨的斗争。工业、农业同时并举方针之提出,提供了我们能够胜利完成这一战斗任务的途径。我国经济的大发展,不仅增强我国的经济威力,且将大大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吸引更多的人站到保卫和平的队伍中来,使腐朽没落的帝国主义更加孤立,在和平竞赛中被彻底击溃。

以上四个方面,是我对这一方针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粗浅认识。今天,全国人民在这个方针的指导下,已经行动起来。让敌人在我们的面前发抖吧!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将永远从胜利走向胜利。

1958年2月3日于北京大学。

<sup>①</sup> 参看人民日报编辑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 記兩次法律工作者的国际會議

我今年9月19日出国，12月4日回到北京，先后出席兩次关于法律工作者的国际會議。一次是11月7日至11日在大馬士革举行的亞非法律工作者會議；一次是11月16日至20日在莫斯科举行的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的理事會議。因为要参加亞非法律工作者會議的筹备會議，所以我在9月底便赶到大馬士革。

亞非法律工作者會議，早在1955年亞洲法律工作者會議上(在印度的加尔各答举行的)和1956年国际民主法协第六屆大会上(在比利时的布魯塞尔举行的)兩次有人倡議过。后来經過阿拉伯各国的法律工作者特別叙利亞大馬士革律师工会主席阿庫瓦特利等的努力，国际民主法协总書記諾尔曼(法国)的帮助，今秋又經阿拉伯律师联合会大会的通过，才决定召开的。會議的性質，是亞非地区的帶有学术性質的民間會議，除国际民主法协和巴西、祕魯等南美国家派有观察員参加外，計到亞非卅五个国家和地方的代表，共一百余人。代表成份包括教授、法官、律师、政府官員和政治活动家等。苏联、蒙古、朝鮮、越南各兄弟国家均有代表团出席。我国出席代表七人：陶希晋、毛鐸、韓幽桐、何功楷、李浩培、陈汗章和我。

叙利亞政府是很重視与支持这个會議的，開幕时，由总统致詞，总理，各部部長，各国駐叙使节均参加開幕式。会后其总理又亲自以叙利亞国家一級勳章授予与会各代表团团长。

會議的議題有五：

- 一、世界和平
- 二、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
- 三、侵略及其法律后果
- 四、公共自由和自然权利
- 五、从国际法观点論国有化

由于亞非地区的政治特点，會議的中心問題，不能不很自然地反映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特別譴責艾森豪威尔主义、为爭取民族独立、为国际和平而斗争的强烈要求。到会的人，無論在理論观点上政治主張上有什么不同，而在这一

点上，則几乎是完全一致的。

1955年万隆會議肯定的关于和平共处的五項原則，是會議的主导思想。

會議的形式，主要是小組討論，根据五个議題由代表自由選擇編成五个小組，分別进行討論。我們在世界和平問題的討論会上做报告人，是我代表中国代表团做的这个报告。

各組討論都相当热烈，除公共自由、自然权利和国有化兩個小組外，都有不少的爭論。主要爭論有二，即关于以色列問題和侵略定义問題。

以色列是帝国主义多年来制造的侵略基地，也可以說是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具，由此而产生的巴勒斯坦近百万的难民，流离在叙利亞、伊拉克、約旦、黎巴嫩等国家，也确是个十分棘手的問題。同情巴勒斯坦难民，譴責以色列的侵略行为，反对艾森豪威尔主义这都是一致的主張。但是就阿拉伯各国的若干朋友看来，以色列問題不是别的而是这个国家根本不应该存在，也不能同意她的存在，因此便和其他代表存在着在某些見解上的程度不同。至于侵略定义的爭論，是印度有一代表提出要取消苏联制定的侵略定义中有关間接侵略的各项規定，而阿拉伯有的代表則要求扩大侵略行为的概念，把陈兵边境也列为侵略行为之一種等等，因而也引起若干爭論。这两个爭論經過反复討論，都在求同存異原則指导下取得了一致的意見。五个小組分別地制定五个決議草案由大会通过成为正式決議。

在侵略及其法律后果小組开会时，有人提出“艾森豪威尔主义是个学說，不值得这样去批判”，遭到所有代表的反对，經過討論，很快地即取得一致意見。使人深深感到在亞非地区，所謂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艾森豪威尔主义等等，無論怎样改头换面，实际上就是罪惡已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特別是在亞非人民日益醒覺，社会主义陣营日益强大，东風压倒西風的情况下。

关于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和权利問題，經伊拉克、叙利亞等代表提出，全体一致通过

并热烈鼓掌,因而也作出決議。叙利亞代表并表示要組織代表团帶大会決議到联合国去呼吁。

以下再簡單地介紹一下国际民主法协的理事會議。

这次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的理事会,實質上是一次扩大的理事會議,到廿七个国家的代表。會議在11月16日开始,由国际民主法协主席普立特(英国)和总書記諾尔曼分別报告会务,各国理事發言者約廿余人,最后作出四項決議:

- 一、关于裁軍問題的声明
- 二、关于朝鮮、越南問題的声明
- 三、关于本会政策的決議
- 四、关于本会組織活动的決議

會議討論通过了調整組織的一些措施:

一、撤銷原国际民主法协書記科瓦奇(匈牙利)的职务,由匈牙利另外选人担任法协書記;

二、欢迎原国际民主法协書記席尔茲(英国)恢复法协書記的职务(席尔茲曾因事辞职);

三、补选平野义太郎(日本)和巴道維(埃及)

为国际民主法协付主席;

四、补选比斯特里斯基(捷克斯洛伐克)和貝尔林格(意大利)为国际民主法协書記;

五、希望南斯拉夫的法律工作者仍回到国际民主法协組織中来并恢复其在領導機構中的地位。

會議还决定明年在开罗召开执行局會議,1959年召开国际民主法协第七屆大会。委托英国分会于明年秋季組織一次关于劳动法(重点討論生产安全問題)的討論会,邀請各国派有关人員参加。

此外,在理事會議閉幕后,又举行了兩天关于行政監督問題的学术性圓桌討論会。由各报告人分別报告各国关于行政監督的实际情况存在的問題和自己的观点等,未展开爭論,基本上是百家爭鳴,各說各的,沒有結論也不必要作出什么結論。

会后,我們又接受苏联的邀請,作了十日左右的參觀和訪問,并且到列宁格勒去了一趟。

(陈守一) 1957年12月26日

## 新聞學專業開設“文学艺术講座”

北京大学中文系新聞學專業于1957年下半年開設了“文学艺术講座”,到目前为止已进行了三講。分別由中宣部文艺处处长林默涵同志,文化部电影事業管理局副局长陈荒煤同志,北大西語系主任馮至同志主講。

林默涵同志的“当前文艺界思想斗争”的講演,全面、深刻地叙述和分析了文艺界当前思想斗争的情况。講演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講文艺界反右派斗争的情况。在这部分,林默涵同志分析了文艺界出現許多右派分子的原因,并指出文艺界反右派斗争中有三点值得特別注意。一、文艺界右派分子中,老党员、老干部和解放后由党培养起来的青年作者佔了相当大的比重。这就反映了思想改造多么不容易,資产階級个人主义有多么可怕,和我們在培养青年作家工作中的毛病。二、另一点是許多右派分子站在領導崗位,他們又很注意夺取思想陣地,尤其注意夺取刊物。他們

一方面在一些刊物的內部夺取領導权;一方面又企圖办同人刊物,来向党进攻。林默涵同志在講到这里时着重指出刊物是重要的思想武器,必須掌握在忠誠可靠的人手里,必須受党的领导和監督。同人刊物在我們国家里实际上是不可能有的。社会主义社会,商店尚且公有,思想陣地怎能私有?我們的社会不容許有反社会主义的刊物,也不允許有貌似中立的自由主义刊物。三、民主党派右派分子在文艺界非常活躍,并与文艺界一些党内右派勾結起来,里应外合向党进攻。

講演的第二部分是談我們和文艺界右派分子的思想分歧。他說,我們和文艺界右派分子的思想分歧是兩条路綫的斗争,即革命的文艺界思想与資产階級文艺思想的斗争。这场斗争由来已久,今后,这个斗争还将以种种不同的形式在一个長时期以內繼續进行。接着林默涵同志就提出了文艺界一切反党分子、右派分子的共同思想基础:一、是共同的世界觀、人生觀——資产階級个人主



义；二、是共同的文艺思想，就是修正主义的思想；三、在組織上右派分子与修正主义者共同地反对党的领导。对以上三点林默涵同志都作了很詳尽的分析，而对修正主义文艺思想，林默涵同志更特別着重地进行了批判和分析。他把修正主义文艺思想归納为这几个方面：（一）否定社会主义文艺的成就。（二）反对文艺为政治服务。（在談到这点时，林默涵同志特別批駁了社会主义文艺不真实，文学的主要任务是写陰暗面等錯誤論点）。（三）社会主义国家作家沒有創作自由。（四）否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批判这些錯誤思想观点的同时，林默涵同志还闡述了一些精辟的正面見解。

第三部分是講建立和發展我們工人階級文艺队伍的問題。林默涵同志說，建立社会主义文艺的關鍵就在于此。怎样建立呢？他在闡述了陆定一同志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可以培养工人階級文艺家，改造資產階級文艺家，但也可以培养有資產階級思想的作家等論点之后，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办法。

最后，林默涵同志作結論說，文艺界的思想斗争的根本問題就是：（1）文艺是为滿足少数人的要求呢，还是为了滿足人民的要求？（2）文艺是为个人謀取名利的工具呢，还是党的事業的一部分？我們無疑是站在后者立場上的。

第二講的題目是“电影界的思想斗争”，由陈荒煤同志主講。講演圍繞着对电影界右派头子鍾惦棐的反动文艺思想的揭露与批判，叙述了电影界思想斗争的状况，批駁了右派的一些主要論点。陈荒煤同志指出电影生产的基本問題是方向問題，也就是电影制片为谁服务的問題。在这个問題上，我們和資產階級根本对立。我們的方向是为工农兵服务，电影界的右派分子首先是鍾惦棐主要的也就是反对这一点。他們以我們現在电影題材狹窄为根据来攻击工农兵方向。陈荒煤同志說，从劳动人民的观点看，現在的題材要比过去广

泛，因为过去劳动人民的生活，在电影中从未得到表現。从資產階級观点看，則題材是狹窄了，因为我們的电影已不再表現洋場惡少、太太、小姐的生活了。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就人民的要求看，我們电影的題材是还狹窄了些，但这决不是由于表現了工农兵的原故。陈荒煤同志認為真正的原因是：（1）我們的社會处于空前大变动的时期，許多作家对旧社会熟悉，虽願表現新生活，但在短期內未能很好的掌握这一变化。而且这中間还有作家的思想改造問題。因而作品就表現得不深刻不生动。（2）作家脫离政治，脫离羣众。这就使作品流于表面，容易一般化和雷同。（3）文艺理論和文艺批評方面的教条主义的影响。在这里，陈荒煤同志着重談了关于在电影界長期爭論的“要表現重大題材”的問題。他說，我們过去对“重大題材”的理解片面，而且是脫离艺术特点的。不一定非是历史意义重大或規模巨大的事件或斗争，才是“重大題材”，相反，只要是反映当前生活的主要問題，那怕是写青年恋爱，写好了也是重大題材。同时，也不能要求一切作品都來表現大运动和有重大意义的政治事件。接着，陈荒煤同志推开一層說，將來就只有工农兵，不表現工农就沒有可写的了。鍾惦棐的要題材广便只有不写工农的論調，实际上是要引导作者脫离现实。

在講演的后半部，陈荒煤同志对鍾惦棐的一些主要的反动文艺观点，逐一进行了批判。

第三講是由馮至同志講“如何正确对待西欧資產階級文学遺產問題”，也是紧紧結合着反右派斗争的。講演分兩部分：第一部分講資產階級文学的一般情况；第二部分就是談如何正确对待西欧資產階級文学遺產。此講演現經馮至同志修改后，以“略論欧洲資產階級文学里的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为題，在本期学报上發表，因此不再詳細报导。

（張步洲）

1957年第4期“切韵韵目次第考源”文中刊誤

頁	行	誤	正
73頁	24行	……並明	……不並明
73頁	末行	“廢”字原在“並”字行	“廢”字应在“不”字行。
74頁	倒9行	……並明	……不並明
75頁	26行	……並明	……不並明
75頁	31行	“廢 <sup>20</sup> ”字原在“並”字行。	“廢 <sup>20</sup> ”字应在“不”字行。
81頁	4行	並 明	不 並 明
81頁	32行	“廢 <sup>20</sup> ”字原在“並”字行。	“廢 <sup>20</sup> ”字应在“不”字行。

## СОДЕРЖАНИЕ

О предисловии тов. Шан Юэ к книге "Изучение об общественно-хозяйственной формации в династии Мин и Цин" .....	Лю Да-нянь ( 1 )
Коротко о гуманизме и индивидуализме в Буржуаз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Европы. Вскрыть .....	Фун Чжи. ( 15 )
Христианство и культура Запада—опыт их переоценки .....	Чжу Гуан-Цянь ( 27 )
Значение борьбы между материализмом и идеализмом в истории развития логики на Западе .....	Хэ Чжао-Цин ( 41 )
Главные пункты комментариев к тексту 13-ти глав "Сунь-Цзы". .....	Ян Бин-Ань ( 55 )
О характере А-Кью .....	Цай Цзянь ( 73 )
О противоречиях в развитии нашего народного хозяйства и о принципе параллель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и сельского хозяйства в Китае .....	Му Цзя-инь ( 87 )

## Научная Жизнь

Выступление члена постоянного комитета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комиссии по делам реформы китайской письменности тов. Вэй Цюэ в ПГУ о реформе письменности .....	Хэ Нянь ( 14 )
Критика товарищем Хэ Ци-фаном Правых Элементов на основе учения партии о литературе .....	Цзин Чжи ( 26 )
Научная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кафедры всемирной истории нового и новейшего времени за прошлый год .....	Информация кафедры всемирной истории нового и новейшего времени ( 72 )
О двух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совещаниях юристов .....	Чэнь Шоу-и ( 109 )
Лекции о литературе и искусстве на отделении журналистики .....	Чжан Бу-чжу ( 110 )

## CONTENTS

A Critique of Shang Yueh's Preface for "Studies of the Social Structure During the Ming and Ching Dynasties" .....	Liu Ta-nien ( 1 )
Some Critical Remarks on Humanism and Individualism in European Bourgeois Literature .....	Feng Chi ( 15 )
The Influence of Christianity on Western Culture an Attempt at Re-estimation .....	Chu Kwang-t sien ( 27 )
The Struggle between Materialism and idealism in the History of Western Logic .....	Ho Chao-ch'ing ( 41 )
Textual Criticism of the Thirteen Chapters of "Sun Tze" .....	Yang Ping-an ( 55 )
The Character of Ah Q .....	Tsai Chian ( 73 )
The Contradic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our National Economy and the Finding Principle of Simultaneous Development of both Industry and Agriculture .....	Mou Chia-yin ( 87 )

## Academic Activities

Comrade Wei Ch'ueh of the Central Language Reform Committee Addressing Teachers and Students of Peking University on "Some Problems in Language Reform" .....	He Nian ( 14 )
Comrade He Chi-fang's Refutation of the Right-Wing Writes from the Party's Principle of Art and Literature .....	Ching Chih ( 26 )
Scientific Activities in the Department of Modern World History during the Past Year .....	Correspondent ( 72 )
Two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of Jurists .....	Chen Shou-yi ( 109 )
Lecture on Literature and Art "for the Department Special Training Course of Journalism" .....	Chang Pu-chou ( 110 )

## 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編輯委员会

翦伯贊（主編）

朱光潛            郑 昕            楊 晦            （副主編）

向 达            季 羨 林            陈 守 一            馮 友 蘭

馮 至            游 国 恩            樊 弘            蔡 仪

魏 建 功（以姓氏笔划为序）

# 北京大学学报

人文科学(季刊)

1958年第1期(总11期)

---

編輯者 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  
編輯委员会

出版者 北 京 大 学  
北京西郊海淀

印刷者 北京市印刷一厂

总發行处 邮电部北京邮局

訂 購 处 全 国 各 地 邮 局

代訂代銷处 全 国 各 地 新 华 書 店

---

(京) 道: 1-1,800  
报: 1-3,000

1958年2月出版  
(延至3月中旬出版)

本期定价: 道林本 1.20 元  
报纸本 0.70 元

本刊代号: 道2-87  
报2-88